

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

513

解密文件

柯嘉逊/著

杨培根/译



.6262

3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300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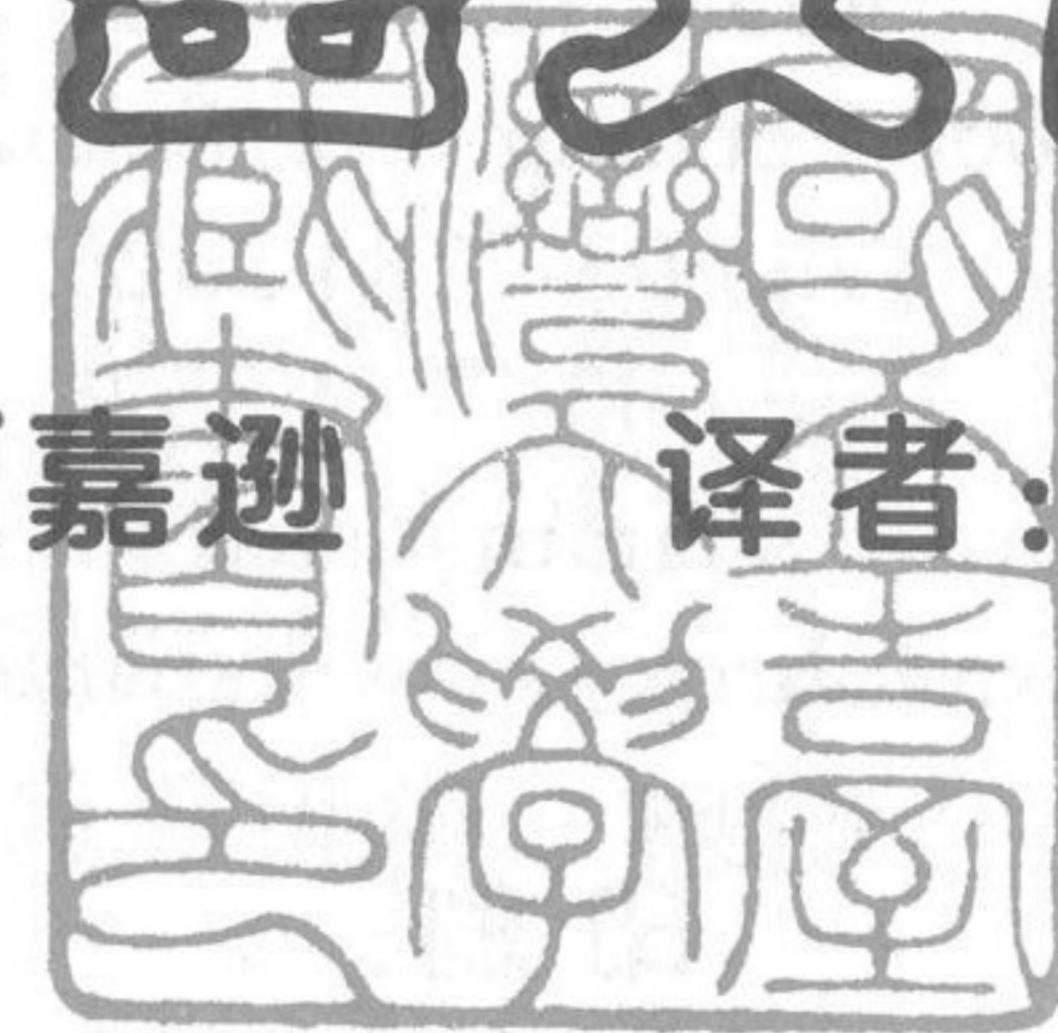
b 32848936

1969年大写的种族暴乱

# 513

## 解密文件

作者：柯嘉逊 译者：杨培根



*Handwritten signature*  
定于2007年10月27日  
*Handwritten signature*

人民之声出版

3300631

1969年大馬種族暴亂

**513**

解密文件

作者：柯嘉遜 译者：杨培根

出版：

**SUARAM KOMUNIKASI**

433A, Jalan 5/46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 603-7784 3525

Fax: 603-7784 3526

Email: [suaram@suaram.net](mailto:suaram@suaram.net)

Website: <http://www.suaram.net>

印刷：

**POLAR VISTA SDN BHD** (318716-P)

15, Jalan 6/118C,

Desa Tun Razak,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Tel: 603-9173 1434, 9173 1436

Fax: 603-9173 1412

Email: [ogmsia@yahoo.com](mailto:ogmsia@yahoo.com)

发行：

**GERAKBUDAYA ENTERPRIZE SDN BHD**

11, 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7957 8342, 7957 8343

Fax: 603-7954 9202

ISBN: 978-983-41367-8-9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作者简介

柯嘉遜博士是新纪元学院院长。新纪元学院是董教总创办的一所非营利高等教育学府。董教总是与大马华文教育运动有密切关连的两大民间组织。1983年，柯博士参与华教运动，并担任教育顾问一职。1985年，15华团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后，他曾担任中心主任。

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柯博士曾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接着在无审讯的情况下，被扣留了445天。1989年，他获释放后，协助成立“人民之声”。“人民之声”是当今大马非政府组织中，促进人权的领导机构。柯博士目前是“人民之声”主任。

1990年，柯博士和其他民权运动人士加入反对党阵线，中选为1990 - 1995年八打灵国会议员。1996年，他和其他活跃分子，因主办第二届东帝汶亚太会议而第二次被捕，度过了六天的牢房生活。

柯博士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975年，考获经济系文学士；1976年，经济系硕士；1981年，社会学博士学位。70年代，柯博士曾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新加坡大学担任过讲师。

## 作者的其它著作：

- \* *New Era Education* 《新纪元教育：柯嘉逊教育文选》(NEC/SIRD Kajang 2005)
- \* *Policing the Malaysian Police* (editor, Suaram, Petaling Jaya 2005)
- \* *The Malaysi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马来西亚民权运动》(SIRD Petaling Jaya 2005)
- \* *Malaysian Critical Issues* (SIRD Petaling Jaya 2002)
- \* *K. Das & The Tunku Tapes* 《最后的访谈：东姑与达斯对话录》(editor, SIRD Petaling Jaya 2002)
- \* *People Before Profits: The Rights of Malaysian Communities in Development* (editor, Suaram Petaling Jaya 2001)
- \* *445 Days Under Operation Lalang: An Account of the 1987 ISA Detentions* 《445天扣留营岁月》(Oriengroup, Kuala Lumpur 1999)
- \* *A Protean Saga: 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DJZ Higher Learning Centre, Kajang 1999)
- \*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of Malaysian Ethnic Minorities* 《马来西亚少数民族母语教育》(editor, DJZ Higher Learning Centre, Kajang 1998)
- \* *Mob Rule: The East Timor Conference in Malaysia 1996* (editor, Suaram, Petaling Jaya 1998)
- \* *Malaysia's Energy Crisis: The Real Issues* (Oriengroup, Kuala Lumpur 1996)
- \* *Inside the DAP 1990-95*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1990-1995》(Oriengroup, Kuala Lumpur 1996)
- \* *Reforming Malaysia* 《改革马来西亚》(Oriengroup, Kuala Lumpur 1993)
- \* *Malaysian Political Realities* (Oriengroup, Kuala Lumpur 1992)
- \* *Malaysian Political Myths* 《马来西亚的政治神话》(Huazi, Kuala Lumpur 1990)
- \* *Medianwatch: Use & Abuse of the Malaysian Media* (editor, Huazi, Kuala Lumpur 1990)
- \* *Malaysian Cultural Policy and Democracy* 《国家文化与民主》(editor, Huazi, Kuala Lumpur 1990)
- \* *Polarisation in Malaysia: The Root causes* 《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的根源》(editor, Huazi, Kuala Lumpur 1987)
- \* *Defining Malaysian Culture* 《国家文化理念》(editor, Huazi, Kuala Lumpur 1987)
- \*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 Hua Wu Yin, Zed Press, London 1983)

作者  
新纪元学院  
董教总教育中心  
华研(华资)  
人民之声  
东方出版社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Tel: 603-87392770, Email – kiasoong.kua@newera.edu.my  
Tel: 603-87392770, Email – nec@newera.edu.my  
Tel: 603-87392770, Email – nec@djz.edu.my  
Tel: 603-22734035, Email – huayan@huayan.net.my  
Tel: 603-77843525, Email – suaram@suaram.org  
Tel: 603-91731434, Email – ogmsia@yahoo.com  
Tel: 603-79578342, Email – sird@streamyx.com

## 鸣谢

感谢伦敦国家档案馆的管理层和员工精诚服务的精神，使我有机会参阅这些文件，也感谢《远东经济评论》提供过去出版过的期刊的储存光盘。还得感谢赛·扎哈利允许我采用他的一首诗：〈隐藏的黑手〉。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杨培根律师\*（注），他在极短时间内将全书译成中文，并多次修订，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注）杨培根是资深律师，也是华社熟悉的法律文章健笔；他从1985年开始在中文报章撰文，以深入浅出的笔调介绍法律知识，深受欢迎，杨培根也是活跃的民权运动工作者，曾担任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权协会(HAKAM)署理主席、执委，也是董教总法律顾问。杨培根出版一系列《法律常识》丛书，范围包括宪法、人权与法治、房地产法、商业法、家庭法、教育法及诽谤法等。杨培根的其他著作包括：《故事另一面》(1996)、《自学仓颉输入法》(1990)，以及译作《马来西亚民权运动》(2006, 柯嘉逊著)。

“首相（马哈迪医生）重提“513事件”说，如果政府不采取适当行动，就可能发生事情。这个警告，好像对我们的儿童讲鬼故事那样，是为了阻止他们变得顽皮… 这类故事不应再重提，因为再重提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不成熟。”

（东姑谈1987年“茅草行动”）

## 关于这本书——他们说了些什么？

“国安部已查阅了这本书，并已决定不会以《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来查禁这本著作。首相兼国家安全部部长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指出，这本书未含有足以威胁国家安全的元素。警方并没有没收书籍或发出任何警告。”

• 《太阳报》(The Sun), 19.6.2007

“柯嘉逊博士的新书看起来好像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论文，其实，其行文舒畅。毫无疑问，以大马社会和政治来说，它是至今发表过的最重要的一本书。“513事件”塑造了这个国家。说得更准确些，它糟蹋了这个国家。这是一本必须撰写的书。”

“我们了解你的论文的主要点，可是有点模糊不清。幸好，你这本著作，把主要点系统化了，并且也能令人信服，因为你摘录了那些外交官和记者的报告。看了你的书，使我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国家和国家机构。”

“用容易理解的文字来改述福斯塔夫(Falstaff)的话：你自己不但有洞察力，而且还能鼓舞他人具有洞察力。”(注：福斯塔夫(Falstaff)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他是个友善的老人，喜欢饮酒作乐，有时不太诚实。)

• 苏林特兰律师(N. Surendran), 17.5.2007

“‘513事件’推介礼：这本书的推介礼，让我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星期天早上。我心中丝毫没有疑问的是：柯博士撰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认为，他确实是在做“公开历史事实”这一类工作。参加推介礼过后，对推介礼上所进行的交流，感觉到只是得到部分满足，同时，对未来又有些悲观。不过，柯博士这本著作，对我在了解大马当代史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加上当天，特邀

推介人经过认真思考而饶有趣味的谈话，令我对这本书的赏识，未曾减低。”

• 罗斯坦·山尼 (Rustam A. Sani)  
[见《人民呼声》- 13.5.2007]

“林博士认为，这本书是重要的。他把这本书形容为关于“513事件”“丝毫没有偏袒的资讯”。政府必须承认这一点。”

• 林德宜博士 [见《今日大马》电子邮报 - 15.5.2007]

“这本书中的指控可能引起种族情绪 … 我听说（柯博士）曾提到某些领袖必须对暴乱事件负责。这当然可能导致各种各样预想不到的反应，因为他所提到的领袖显然不是华人，而是马来人。它将给这个脆弱的社会制造困难局面 … 邱氏说，当局理应在早些时候，就监督这本书的出版进程，而不该等到这本书出版后，才来作出反应 … 但是，这么做，有人会不高兴，因为这类行动将抑制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项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东西。人们在处理这些事时，必须谨慎小心。”

• 邱家金教授 [见《今日大马》电子邮报-15.5.2007]

“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阅读政治部和外国外交使馆情报，两方的解密文件，然后加以比较，以便取得更完整和更准确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必须只想到“这个或者那个”，而不想到“这个和那个”？（教授，你应该去上Edward de Bono《横向思维》的讲课！）如果当时政治部真的是那么有知识，为什么当局不能阻止暴乱的发生？”

• 黄永安 [见Online Friday电子邮报 - 18.5.2007]

“查禁一本关于“513暴乱事件”的具有争议性的书，违反了《联邦宪法》保障下的言论自由 … 在一个资讯传播自由的时代，宪法下的基本自由权利必须受到尊重，而不应该破坏它。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援引那些旨在授权政府查禁出版物的法律和条规 … 也许这本书的确具有争议性，但是，如果政府不同意书中所提出的课题，政府应以公开与透明的方式加以反驳 … 意义更加深长的是：查禁这本书，只能加强它的论点，那就是，“513暴乱事件”的确是某些领袖阴谋推翻东姑·阿都拉曼（当时的首相）的一场政变。”

• 安华·依布拉欣 (Anwar Ibrahim)  
[《今日大马》电子邮报 - 17.5.2007]

“这个行动，肯定是不符合我国首相所要促进的公开与透明的社会。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如果大马要取得发展国家的地位，就必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不论是关于什么课题、事情和事件。柯博士关于‘513暴乱事件’的书，是根据现在已解密但原本是机密的记录和资讯。所以，它不是一本虚构编造的书，而是一本以历史记录为根据的书。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分析和观点。但是，这本书不应该被充公，而剥夺公众人士获取这本书的权利。”

• 杜乾煥博士 - 18.5.2007

“如果政府执意查禁这本书，那就完全确认了书中所说的，“513暴乱事件”是一场推翻东姑的政变。如果39年后的今天，大马公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意味着，这39年来，政府没能领导国家走向进步和融合。”

• 雪隆民权委员会及独立媒体写作者联盟 (WAMI) - 17.5.2007

“柯嘉逊博士这本书，给我们人民提供了对“513事件”认真调查的一个途径，这一点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民主讨论。这本书也成了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柯博士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为了把大马改造成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他勇气可嘉。

• Youth For Change (Y4C), 16.5.2007

“跟柯博士之前的著作一样，这本书也以一种充满热情的笔调来书写，通过一种紧迫感来驾驭整个叙述。这一特点使得阅读这本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觉得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它提出了很多议题和问号，挑战官方对暴乱事件的说法。它也同时提供了很多新的资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需要真实地了解我们历史中的那段恐怖时期，而这些新资讯就显得至关重要。”

• 阿兹米·沙荣 (Azmi Sharom)  
[《星报》(The Star) - 31.5.2007]

“柯嘉逊博士在他的新书发表会上的声明让我大吃一惊。他的这本新书根据英国大使馆人员向英国外交部门提呈的报告来撰写，内容指出：1969年‘513事件’是由巫统成员发动，以推翻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他要求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查寻真相。尤为令人震惊的是，据说他还提到，除非相关委员会展开侦查，或真相已经出炉，否则绝不可能达成民族团结，或达致团结的效果。都已经38年了，我觉得今天还要容许这种仇恨挟持民族团结来逼迫政府让步，那是太古老了。难道我们要容许过去的旧事来摧毁我们的未来？”

• 敦韩聂夫·奥玛 (Tun Hanif Omar)  
[《星报》(Sunday Star) - 3.6.2007]

“山苏说，纯粹根据这个事情的新闻报道，从技术角度来看，他不认为这本书是学术作品…学术材料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必须要有两名推荐人；这本书的出版必须由受承认的学术作品出版商负责。”

• 国民大学山苏教授 (Prof Shamsul Amri Baharuddin)  
[《今日大马》电子邮报-15.5.2007]

“好好干下去。别理会那些学究们…要记得，“学术”的定义是：“…由少过两人所能理解的任何作品。”

•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保罗博士 (Dr. Paul Kelemen),  
19.5.2007

“谢谢你，将你有关大马1969年暴乱事件的文章寄给我们。这篇文章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记录，确实需要出版。我们很乐意将它刊布在《种族与阶级》(Race & Class)学报。我们将于2008年一月份，将你的文章发表在学报上。祝福你。”

• 英国伦敦种族关系研究所《种族与阶级》学报副主编，  
阿伦·坤纳尼 (Arun Kundnani)

献给

那些在1969年暴乱中失去生命的人，

以及我们的儿女们。



---

## 隐藏的黑手

---

赛·扎哈利

[注：这是前新加坡政扣者赛·扎哈利，对513种族暴乱事件有感，而在1969年5月间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流露了当时他对513事件的真实感想，准确地说明了暴乱事件发生的因由。作者柯嘉逊博士感谢赛·扎哈利，允许他把这首诗当作这本书的代序。]

在文明世纪  
历史又一次演出  
野蛮行径

隐藏的黑手  
再次出现  
寻觅那  
穷人与不幸者的血

肤色和种族  
语言与宗族  
再次变成  
屠夫们的利刃

世界的每个角落  
不断发生着  
少数人吃面包  
多数人咽泥沙

不断发生着  
少数人穿天鹅绒 住宫殿  
多数人衣不蔽体 挤破寮

不断发生着  
隐藏的黑手然后重现  
使穷人溅血以保政权

取自赛·扎哈利 著：《万千梦魇》（华文版）

---

## 目录

---

前言 ◀◀ 官方历史记载 令人质疑 ▶▶ 1

第1章 ◀◀ 联盟的种族方案 ▶▶ 11

第2章 ◀◀ 1969年大选 ▶▶ 28

第3章 ◀◀ 关于暴乱事件的公共档案 ▶▶ 37

第4章 ◀◀ 外国对大马政权更换的评价 ▶▶ 78

第5章 ◀◀ 新兴的马来统治阶级 ▶▶ 95

第6章 ◀◀ 完结篇：朝向民族和谐 ▶▶ 113

◀◀ 附言 ▶▶ 123

## 前言

# 官方历史记载 令人质疑

即使到了2006年7月，马来西亚公众还得遭受1969年“513事件”官方历史争议的震撼。这次争议，是《种族关系》的大专教学课本所引起的。它暴露了一个事实：许多大马人都不相信官方历史对这个黑暗事件的说法。根据官方说法，煽动1969年大选后的种族暴乱的责任，应由反对党来承担。

这段“官方历史”也意味着，如果我国的现状（status quo）一旦无法维持，这类种族暴乱就会油然“自发”。这本书说明，我国既存的状态如何从1969年演变到今天这种情景。1957年，我国独立时，《宪法》第153条（关于“马来人的特殊地位”的条文）主要涉及获取土地；加入公共服务领域；分发某类商业准证和执照；获取奖学金、贷学金、以及其它形式的教育援助等。

但是，自从1969年“国家行动理事会”成立至今，我国却出现了“马来人具有主导地位”的现状。这是不符合《联邦宪法》精神的一个种族主义理念。它使到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合法化。<sup>1</sup>

难怪，当有人提出应“重写大马历史”<sup>2</sup>时，立刻就引起开明知识分子的共鸣。其实，大马几个历史重大事件的官方说法，例如：对二战后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紧急状态、尤其是1969年发生的“513种族暴乱事件”等的官方说法，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1983年，本书作者在他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已研究和论述过我国紧急状态的发展。<sup>3</sup>他现在把至今还未发表过的1969年“513事件”的分析和记录，汇集成这本书。我国民众至今都不明了，引起大马历史上这场最糟糕的种族暴乱的真正前因后果。官方说法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说词，并且有纰漏和不足之处，因此，难以令人相信。<sup>4</sup>

自从这次种族暴乱事件发生过后，统治者就不鼓励人们讨论我国这段黑暗的历史。可是，每当大选来临，我国现状受到威胁时，如：1990年大选，或者，每当非马来族群提出维护民权课题的时候（如：1999年大选），我国执政党就会召唤出这个“513幽灵”来。

最近，巫统所召开的2006年党员大会，也不例外。巫统青年团团团长为了讨好听众，煞有介事地亲吻拔出鞘的马来短刀，并且对那些胆敢提出民权课题者，进行恫吓。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有人警告大马人民不准质疑我国的现状，“不然…‘513’事件”可能会再发生！”巫统代表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我国非马来族提出种族性的、明显具有煽动性的恫吓。<sup>5</sup>

## 阶级与种族主义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本书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透视历史。根据他的分析，大马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决不是多元族群社会中自发的种族暴乱。有关的解密文件清楚表明，发动这场种族暴乱是有计划的行动。这次种族暴乱事件也不能说明，不同族群一同生活在一起时，就会发生冲突（那是多元论者的说法）。换句话说，必须分析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sup>6</sup>

本书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513事件”是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推翻落后的马来贵族的政变。那是关键性的政变：它改变了大马政治史。它确保新兴马来资产阶级的崛起。他们通过“新经济政策”，巩固其政治势力。东姑本身责难说：

“你知道吗，哈仑是其中一个（指哈仑、马哈迪、加查利·沙菲）跟拉萨通力合作，把我撵下台的人，以便取代我…”<sup>7</sup>

1977年，有一名新闻工作者，苏吉·拉迪夫，写道：

“‘513事件’并不是自发的。它是经过迅速精心策划的。策划者的身份，至今还无法准确地说出来。不论“513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它是针对东姑·阿都·拉曼的一项政变。虽然他继续担任首相兼巫统主席，但是他仅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实际上，东姑从此大权旁落。”<sup>8</sup>

本书作者所挖掘的文件，显然应证了苏吉·拉迪夫在1977年所作的论述。

本书第1章论述了种族性的“联盟方案”中的矛盾现象。“联盟方案”是新殖民主义的政治解决方案，是英殖民势力所策划和支持的。

这篇章谈论了马来官僚资产阶级，如何在1969年激烈地争夺政权。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把“513种族暴乱”归咎于“温和派”政治的失败。其实，他们忽略了马来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并以“马来中心主义”作为他们的思想动力。

他们争取经济权力的载体是国家代理机构，尤其是那些为马来农民提供市场、信贷、和加工设备的国家代理机构，还有，提供城市商业和银行设施的代理机构。只要以东姑为首的没落贵族阶层仍政权在握，这对野心勃勃的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来说——那是个绊脚石。

到了1969年，后殖民主义的发展，引起工人和农民、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在求职与受教育、获取奖学金和执照方面，国家所采取的歧视性政策，令他们感到不满。

原本在大马政治前景中占优势的联盟，在1969年大选中，表现显得黯然失色。为此，巫统认为，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已受到威胁。这一切等于给官僚资产阶级发出讯号：应以“马来人具主导地位”的名堂，计划进行夺取政权。

第2章仔细研究了1969年大选中，反对党所达致的竞选协议。联盟遭到自独立以来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他们甚至还可能失去一些州立法议会的控制权。这点，早在大选前就已昭然若揭。观察家指出，大选成绩揭晓后，反对党的喜悦欢腾和大事庆祝，并不可能成为暴徒们行凶的足够借口。

## 解密文件

在第3章，作者利用从伦敦国家档案馆挖掘出来的资料，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出了1969年大选过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英国国家档案馆设在伦敦西郊国家植物园（Kew Gardens）。档案馆内的档案，30年保密期已满。这就提供了挖掘原属保密文件的一个良机。至于在大马，鉴于存在着官方机密审查制度，所以缺乏可供参考的本国文件或资料。英国和外国使馆之间的来往通讯的档案，包括机密情报等，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契机，方便正确地观察当时的现状。

这些文件包括：当时身在吉隆坡的外国通讯记者所作的事态发展报道；英国最高专员署人员的公文急报（他们时刻留意可能发生的事件，并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还有，外国与英联邦办事处关于西南太平洋国家（如：澳洲、纽西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所发出的快讯。大马红十字会的新闻报道，叙述了避难情况与伤亡人数的严重程度。

第4章进一步研究当时的机密备忘录。这些机密备忘录说明，东西马和这个区域的英国最高专员署以及国防部，对“大马的国内动乱”如何反应和评价。备忘录中有：各个外交会议中所搜集到的资讯；外交使节人员所搜集的秘密情报；世界各国（即：曼谷、新加坡、椰加达、北京）的英国外交使馆人员

所作的报告；1969年种族暴乱的媒体报道；以及当时居住在吉隆坡的英国人的看法。

从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人和其它外国官员的想法。他们如何为他们所谓“一切照常行事”的政策辩解。他们售卖军火给他们明知是一个对国内动乱难逃其咎的政权。这个政权还援引紧急状态权力，以不民主方式把权力集中在他们自己手中。尽管有人极力反对英国官员进行这项军火交易，但是，英国官员仍然我行我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我国保安部队，在应对这场暴乱中，对非马来族公开采取歧视性的措施，还表示感到震惊。

第5章注意到，种族暴乱发生后，政权更换一事是那么迅速和细致：国家行动理事会开始操作；新兴马来统治阶级权力直线上升，完全控制了整副国家机器，包括警察和武装部队。从这些文件，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种族暴乱刚发生不久，新政权就紧锣密鼓地策划70年代和80年代具争议性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并冠以新“马来议程”的名堂。

这本书也研究了外国通讯记者的新闻报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远东经济评论》关于1969年种族暴乱的新闻报道，都被当时的大马当局所查禁。当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新闻报道的大马公民，毫无疑问将第一次阅读到这些报告。

## 警方和军人所扮演的角色令人置疑

这些文件明显表明，警察和军队在处理1969年暴乱的参与者时，态度和手法有所偏袒。从那时候起，还有其它事件显示，国家机器（即：警察和国防部队等）不寻常的惰性或迟钝，令人感到他们有犯了过失之嫌。近年来，真正拥有实权的执政党巫统，他们的青年团悍然扮演起纳粹式冲锋队的角色，向那些争取民权的人士进行恐吓。

下面是这类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一些重要例子。这些不法行为，对我国的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1987年，巫统领袖针对不合格（即不谙华语）的行政主任到华小任职，一手制造了种族紧张局势。巫统青年团组织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出现了书写煽动种族情绪口号的标语，如：“513已开始了”，“让华人的鲜血浸湿马来短刀”。<sup>9</sup>在讲台上煽起种族主义火焰的巫统领袖中，有巫统青年团团长，即当今的副首相。<sup>10</sup>

另一个比较近期发生的事件是：1996年，在吉隆坡亚洲酒店举行的第2届东帝汶亚太会议，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遭受骚扰。600多名巫青团团员引发暴乱。警方在这起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确实令人置疑不已。首先，警察花了2小时才赶到现场。那时，暴民已把会议厅的厢门强行拆下，继而干扰大会的参与者。事后，警方竟然不逮捕使用暴力而犯下罪行的暴民，反而拘捕了59名参与大会者。这些与会者都是无辜的受害人。<sup>11</sup>

这类诉诸于法西斯手段，破坏公开民主讨论会的事件，至今都还在发生。2000年8月18日，大约300名巫青团团员在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门前，进行粗暴的示威行动。他们的借口是，华人社团于1999年大选期间提出诉求，争取民权。他们甚至恫言，要烧毁大会堂。<sup>12</sup>

最新近的种族事件，发生在八打灵甘榜美丹（Kampung Medan），时间是从2001年3月8日到23日。这次种族事件的受害人，来自大马印度社群。总共有6人死亡（包括1名印尼人），100多人严重受伤。有一小股武装暴徒在横冲直撞地肆虐。但是，大马皇家警察却花了15天的时间，才能恢复社会秩序。<sup>13</sup>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专门描述这起种族暴乱事件的书，已被当局宣布为禁书。<sup>14</sup>

警方这种令人惊讶的缓慢、不称职的举动，和1998年安华被扣留后，警方驱散上万名“烈火莫熄”示威者的神速行动，这两者相比之下，则暴露了他们一再采取纵容放任一方的偏袒态度。直到今天，甘榜美丹种族事件，仍然被视为国家机密。政府或“国家人权委员会”从未进行公开调查。

2006年3月15日，晚上9点半，大约有50名巫青团员，到格拉那再也（Kelana Jaya）区国会议员卢诚国（Loh Seng Kok）的服务中心，传递了一份“爱的美顿书”（最后通牒）。这名国会议员曾在国会发言，指出我国非穆斯林所得到的不公平待遇，其中包括：历史课本抹煞了非土著的贡献，只强调伊斯兰教文明。卢议员建议，成立一个宗教部门，协助消除各宗教之间的误解。这个建议在国会中并没引起任何争议。但是，这些巫青团员却恫言，如果卢议员在几天期限内，不回应他们的信，他们将采取行动对付他。<sup>15</sup>

2006年5月14日，“宪法第11条联盟”在槟城举办一项以“《联邦宪法》保障全民？”为题的讲座会。警方竟然指示举办单位，放弃举办讲座会，只因一些目无法纪的暴民拟对讲座会采取破坏行动。这群暴民声称，这项讲座会是“反伊斯兰教”的。

2006年7月22日，当这个非政治组织的联盟，在新山举办另一类似的座谈会的时候，另一群暴民也试图采取破坏行动，使讲座会不能顺利进行。<sup>16</sup>

2006年11月巫统大会现场广播显示，一些代表们进行种族性的、法西斯式的各种辱骂，引起许多人极大的震惊，尽管在过去所召开的巫统大会上，这些辱骂是司空见惯的把戏。

每当巫统领袖所垄断的政治经济特权被人提出质询的时候，他们一贯都会进行恫吓。这种趋势至少证明了一点，那就是：1969年“513种族暴乱”决不是普通市民自发的暴力行动。同时，这也令人怀疑，自1969年以来，维持法律和社会秩序的警察和武装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是不是在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 真理与民族和谐

官方数据显示，1969年5月13日，国内发生骚乱事件期间，有196人丧命，180人受枪伤，另外259人被其它武器所致

伤。根据“国家行动理事会”的报告，9,143人被逮捕，其中有5,561人被控上法庭。<sup>17</sup> 在发生暴乱过程中，6千人无家可归，至少有211部车辆被毁坏或损坏，753所建筑物被大火烧毁或损坏。<sup>18</sup>

当时，国际通讯记者所计算的死伤人数，远远超过上述数据。这可以从所发掘的文件内容看得出来。当局刻意把受害者的种族成分掩盖起来。但是，众所周知，大部分的受害人属于华族。

这本书致力于通过挖掘事实真相承认伤亡情况，并指出修复民族和谐的方向。撰写历史，不应带有偏见。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挖掘出1969年种族暴乱的真相。只有这样，才能达致真正的种族和谐。

## 参考资料

- 1 Kua Kia Soong, "Racism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Malaysia," *Malaysian Critical Issues*, Petaling Jaya: SIRD, 2002, pp.13-24. 本文曾于2001年9月3日提呈给在南非德班（Durban）市召开的“世界反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大会”。
- 2 *News Strait Times*, 15.10.2006.
- 3 Hua Wu Yin (aka Kua Kia Soong),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London: Zed Press, 1983. (本书即将再版，预期2007年面市。)
- 4 Tunku Abdul Rahman, *The May 13 Tragedy*, 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 1969.
- 5 *News Strait Times*, 11.6.2006. 马六甲代表 - 哈斯奴·西当·胡先说：“为了保卫种族与宗教，巫统愿意冒生命危险，进行血浴”；玻璃市代表-哈欣·苏姆说：“希沙慕丁·胡先已把马来短刀拔出鞘，挥舞和亲吻了马来短刀。我们要问，他什么时候要动用它”；丁加奴巫统青年团宣传主任 - 拉萨·伊利斯警告，说：“不可挑战马来人的权利，否则马来人会发狂乱砍人。“513 事件”又将在吉隆坡重演。”（*Malaysiakini*《今日大

马》电子报, 16.11.2006)

- 6 见Hua Wu Yin,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作者在这本1983年的著作中，评论多元论者的错误分析。
- 7 Kua Kia Soong (ed.), *K. Das & The Tunku Tapes*, Petaling Jaya: SIRD, 2002, p.112.
- 8 Subky Latif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Singapore, 1977; quoted in K. Das & SUARAM, *The White Paper on the October 1987 Affair and the Why? Papers*, Petaling Jaya: SUARAM, 1989, p.6.
- 9 Government White Paper, "Towards Preserving National Unity", 1988.
- 10 Kamaruddin Raja Petra, "UMNO's relevance lies in Ketuanan Melayu", *Malaysia Today*, 1.8.2005.
- 11 Kua Kia Soong (ed.), *Mob Rule: The East Timor Conference in Malaysia 1996*, Petaling Jaya: SUARAM, 1998.
- 12 Kua Kia Soong, *The Malaysi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etaling Jaya: SIRD, 2005, p.108.
- 13 Kua Kia Soong (ed.), *Policing the Malaysian Police*, Petaling Jaya: SUARAM, 2005, p.13.
- 14 K. Arumugam, *March 8*, Kuala Lumpur: Separuthi Publications Sdn. Bhd., 2006.
- 15 SUARAM, *Human Rights Report 2006*, Petaling Jaya: SUARAM, 2007.
- 16 *News Strait Times*, 23.7.2006.
- 17 Tunku Abdul Rahman, opcit..
- 18 *Straits Times*, 19.5.1969.

## 第 1 章

# 联盟的种族方案

为了了解1969年大选前种族紧张的局势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有必要追溯联盟种族方案及其内部矛盾的历史根源。我们也需要了解后殖民地经济的性质，以及促进官僚资产阶级兴起的条件。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马来中心主义”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来争取支持，以反对没落的贵族阶级。

1948-1960年紧急状态时期，殖民政府确定将政权移交给本土马来统治阶级。传统的马来统治者容易被吸收，因为他们是从殖民主义初期由英国人培养出来的。不过，英国人认为有必要包容非马来资产阶级，因为非马来资产阶级曾在马来亚经济受帝国主义剥削的环节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联系。

殖民政府早就注意到，华族和印族社会上层之间不稳定的联盟基础，因而毫不犹豫地委任这个联盟的一些代表进入立法议会或其它咨询团体。在紧急状态时期的战争中，马来亚共产党一向来对非马来社群的传统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了。

随着《紧急法令》的实施以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富裕的华族领袖在殖民当局的协助下，开始对华族社群领导层中所出现的真空加以充分利用。早在1948年，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作为巫统伙伴的概念，已经在英国最高专员亨利·葛尼（Henry Gurney）的脑海中出现。<sup>1</sup>

1949年2月27日，由16名华族商人发起成立“马华公会”。他们也是联邦立法议会的成员，故死心塌地为亲英政策服务。英国最高专员本身公开说过，他希望马华公会“比马共更强



大，为华人提供取代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选择标准。”<sup>2</sup> 马华公会党章甚至规定立法议会和行政理事会的华裔成员可自动成为马华公会的理事。

在紧急状态最后的年月里，殖民政府得到马华公会的协助，进行大搬迁行动，把农村的华裔村民迁入“新村”。马华公会也协助招收华人加入警察和武装部队，并且为政府进行反共宣传。过了一些时候，马华公会利用种族情绪，呼吁“在政府内部争取华人的权利”。<sup>3</sup> 结果，马华公会得以把一部分华裔中产阶级争取过去。

马华公会的一项明显的特征，就是利用他们所获得的权力，在华人社群中建立他们的群众基础。50年代，政府允许他们举办数百万元的“社会福利”彩票。彩票可提供经济援助，从而增强他们的影响力。除了举办福利彩票以外，这些上层的华商阶级利用雄厚的资金，在华人社群中赞助各类活动，如：协助人们求职、举办慈善事业、提供社会与文化服务等。

殖民政府进一步的政治策略，就是成立“族群联络委员会”（CLC）。1949年1月，“族群联络委员会”以“华巫亲善委员会”的名堂粉墨登场。这是3个族群的上层阶级所进行的一种非正式闭门会议。各族群通过“族群联络委员会”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这些交易在“联盟国家理事会”成立之前就有了。这些秘密协商所达致的协议，则以“非种族性”的解决方案，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针对马来亚所面对的问题，理事会从来没详细阐述过一个真正的非种族性处理方法。不过，它却表明，各族群领导层之间半公开的非官方协商，不向外部发表，比较能达致重要的族群之间的互相妥协。”<sup>4</sup>

通过这些协商，“联盟方案”的架构开始形成。但是，“联盟方案”产生以后，其内部出现重重矛盾。英国人说服拿督翁接受他们的看法，那就是，必须容纳非马来族的上层阶级，尤其是因为紧急状态不单单是一个“肃清”行动而已。显然，大多数的非马来族群众，是站在游击队那一边。

拿督翁接受了英国人的看法。紧急状态所带来的教训，使那些占主导地位的马来政治人物领悟到——继续推行原有的计划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政权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种族手中，应让人口不相上下的另一个种族享受到显然较少的政治权力。<sup>5</sup>

当时，非马来人所面对的重要议题，涉及公民权的课题。拿督翁尽其所能想说服巫统的保守分子，在公民权问题上采取较宽容的态度，接受“族群联络委员会”的建议，把非马来族申请公民权的居留条件，从15年减为10年。

大家记忆犹新，拿督翁最先领导反对英国人在1946年提出的马来亚联邦计划（Malayan Union）。在这项计划下，非马来族将获得公民权。但这一次，他辞掉巫统主席职，轰动一时。经过这次突如其来的辞呈，拿督翁才说服巫统接受“族群联络委员会”的建议。

在马来社群中，有人指责拿督翁是“马来人的叛徒”。<sup>6</sup> 与此同时，一个极端种族主义的“半岛马来同盟”（Peninsula Malay Union）成立了。它反对拿督翁的政策。同样的，“星加坡马来同盟”也成立了。随后，代表着传统马来统治者主流势力的吉打州王子东姑·阿都拉曼成了巫统的新任主席。

拿督翁退出巫统后，组织了一个新政党——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简称IMP）。一直到那一刻，甚至一直到马来亚独立党明显成了没有影响力的一股政治势力时，英国人仍然毫无疑问地想培养拿督翁，使他成为比较具有开明倾向的代表。这一直是英国人在已建立的新殖民地中所希望看到的事。

### 殖民政府的种族主义策略

50年代伊始，英殖民政府逐步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抵消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力。首先，他们允许采用慎重筛选过的部长制度。这就产生一种假象，以为本地管理人已接管了殖民地政权。<sup>7</sup>

其次，殖民政府不得不作些让步，把公民权赐给非马来族。这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1950年，只有50万华人和23万印度人取得公民权。<sup>8</sup>这是土生土长的马来亚华族总人口的1/5，印度族总人口的一半。<sup>9</sup>

于是，殖民当局在1952年对《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法令》作了一些修改。原来的规定是：想要取得公民权的非马来族，必须在马来亚居住至少15年，同时其双亲必须在马来亚出生。这类条件都被修改了，相关的修正使获取公民权的条件变得稍为宽松些：<sup>10</sup>

“由此可见，英殖民政府是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种族主义策略的。这些修正条文并不符合出生地主义公民权的要求，即：只要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人，都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所施加的这些条件，比起1946年“马来亚联邦计划”的条件更为严峻。然而，这却符合保守的马来统治者的要求。他们不接受基本的民主原则，尤其不愿意赐给非马来族平等的政治权利。”

毫无疑问，这些修正条文确实使到更多华人和印度人取得公民权。根据巴素（V.Purcell）估计，大约有50%到60%的华人，和30%的印度人有资格获得公民权。<sup>11</sup>

到了1953年底，总共有1,157,000华人和255,000印度人成为公民。这意味着，比起在以往条例下的情况来说，非马来族公民的总人口，稍为有所增加。<sup>12</sup>

1952年，那些反对赐予非马来族公民权的大部分巫统领袖，以不同方法，加入了行政部门，并且被委任为部长或立法议员、首席部长、州议员，或各类咨询局的成员。除此以外，只要《紧急法令》还存在，就不准进行抗议或示威游行。

### 地方议会与市议会选举

殖民政府所推行的另一项“安全”改革，就是举行地方议

会和市议会的选举。然而，即使在这类选举中，也并没实行真正的民主：如果英国最高专员认为适当，他有权取消选举。由最高专员所委任的首席部长，有权委任最多1/3的议员。这些议员的任期没有保障，因为只要统治者认为适合，就可以解散议会。最后一点，地方议会本身不是独立自主的，因为所有的政策和条例都必须得到最高专员或州政府的批准。

1952年2月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基本上决定了将要独立的马来亚政治组织的结构。巫统和马华，两个看来不可能结盟的种族主义政党，竟然在选举的12席中赢得了9席，而马来亚独立党只赢得2席。

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告诉殖民政府，马来亚究竟有哪一些政治势力。马来亚独立党，因选举中表现差强人意，而失去了可信度。不久，由于我国其它地区因采用“联盟方案”而旗开得胜，所以，这种政治安排就被制度化了。

紧急状态期间，巫统党内的马来统治者和马华党内的华裔大商家都有充分的理由达致协议组成联盟，以便维护现状，进而挫败工人的造反。与此同时，联盟也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作为种族主义政党，巫统和马华两党的领袖，实际上都必须不时安抚各自在中产阶级里的群众基础。

联盟党内，在处理移民、教育机会、商业注册与执照的立法等课题上，继续实行种族政治。<sup>13</sup> 尽管如此，两党在往后的所有选举中，一直都在维持着共同的竞选阵线。同时，在处理课题时，则尽可能采取模糊和概括性的立场。

当时，在政府部门，巫统和马华部长人数仍嫌不足，这是因为英国人对马来亚独立党仍然情有独钟。因此，巫统和马华要求在1954年举行联邦立法议会选举。但是，英国人不答应，“因为英国人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法律与秩序”。所以，“只有等到紧急状态结束后，才可以考虑自治的问题。”<sup>14</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巫统和马华从来没有和英殖民当局发生过公开冲突。

当联邦大选活动进行得热火朝天时，我国真正尝到了种族主义政治的苦果。在往后的岁月里，种族主义政治成了特色。此时，印度国大党也加入了联盟党，参与种族主义的“联盟方案”。联盟最大的压力来自大选时的席位分配。在3个成员党中，各自只要认为是在让步，就会向对方抗议。最常听到的指责是，他们的领袖“出卖了他们的民族”。

为了确保竞选阵线完好无损，联盟领袖不得不在内部施加严峻的纪律。但是，同时各自又必须争取到以种族为根基的群众支持。这就是“联盟方案”的内在矛盾。比方说，东姑一方面向马来人讲述，非马来族移民所带来的“外来危险”是如何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维护联盟《竞选宣言》所达致的谅解，那就是：必须满足非马来人对公民权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时候，对申请公民权所施加的限制，已稍为减少。理由是，“忠诚的”马华和国大党党员不会构成外来威胁。

联盟在其成员党之间，尽量使争论性的种族课题显得含糊不清，同时为自己制造一个反殖民政府的假象，以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联盟利用人民对殖民政府的一切疑虑，当作政治资本，但是，他们却无法为选民提供另一种明确的选择。他们甚至自编自导了一些抗议和杯葛事件，如：1955年5月，在立法议会内，联盟的3名主要领袖提出辞职的事件。<sup>15</sup>

联盟提出特赦游击队的问题（联盟大选宣言中提起过这问题），目的是为了平息对战争已感到厌倦的人民。联盟的大选宣言却没提到，最终要争取新马统一的事。当中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新加坡强大的左翼劳工运动。他们也害怕，一旦新加坡成为联合邦的一部分，它会威胁到马来族人口比例上的优势。

1955年的大选，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联盟在52个国会议席中斩获了51席。仅存一席败在泛马回教党手中。那个选区是霹靂州出产稻米的吉辇（Krian）县，选民主要是马来稻农。拿督翁的国民党（Party Negara）已没有什么作为。只有联盟这一个政党，值得英殖民统治者的扶持。东姑因而当上了首

相。过后，联盟宣布，他们预定4年后争取到国家独立，并誓言要进行特赦游击队的谈判。

但是，除非英国人能得到保证：联盟有能力对付马共和反叛的群众，否则他们还不准备交出政权。只要紧急状态还存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就必须要有保障。1955年12月，联盟和马共领袖的华玲谈判失败，而联盟未兑现特赦的建议后，英国人才把联盟当作他们可靠的新殖民主义管理人。不久，英国政府、联盟、马来统治者三方面开始进行谈判。谈判结果已是预料中的事。<sup>16</sup>

三方所达致的《独立协议》承认，“为了公共秩序的利益，使公众具有信心，以及为了成立良好的联合邦政府，在这些大前提下，英国最高专员认为适当的话，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sup>17</sup>反游击战争主动权仍旧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保留了在我国维持一支英国军队的权利。《独立协议》也保证，不可把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国有化，也不可阻挠他们把资本和利润自由汇回本国。在新兴的马来亚独立国，外资得到保障。

### “默迪卡”：巩固种族方案

“默迪卡”（马来文“独立”的意思）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战斗口号。它也成了帝国主义培养起来的“联盟党”在马来亚所采用的口号。独立代表团启程前往伦敦以前，马来统治者已经取得联盟领袖的保证：马来统治者作为宪制国家首长的地位，必须受到保护。这是马来统治者支持联盟争取自治的交换条件。1956年1-2月的独立谈判，没引起什么争议，这是不寻常的事。他们只是在议论：过渡到独立的那段时期，行政上出现的技术问题应如何解决。主要的问题涉及国防、内安、公共服务、金融、经济状况等。

“李特宪制委员会”的研究事项，其中包括“保护马来人的特殊地位”的宪法条文。<sup>18</sup>这个宪制委员会是在“独立大会”中成立的，其任务是起草一份《关于独立建议的报告

书》。委员会基本上依赖联盟所提出的建议。

下列是联盟的主要建议：<sup>19</sup>

- ✓ (一) 马来人在公共服务、商业与贸易准证和执照、政府教育奖学金等方面享有特权；
- ✓ (二) 英文和马来文应成为官方语文；
- ✓ (三) 所有在1957年后出生的人，都享有出生地主义的公民权。凡是超过18岁，只要在本国出生的人，在之前的7年内，曾在马来亚居住过至少5年，并拥有简单的马来语知识，就可取得公民权。在外国出生者，他们必须在之前的12年内，曾在马来亚居住过8年，才有资格申请公民权。不得拥有双重公民权。

宪制委员会几乎“照单全收”了联盟的所有建议。不过，为了缓和来自国内要求民主权利的压力，委员会建议：15年后，马来人特权应加以检讨。<sup>20</sup>这个建议一宣布，巫统党内的种族主义分子开始攻击这项限制马来特权的建议。与此同时，这项宪法条文也在华裔族群中产生了疑虑。最后，还是巫统内部的压力占上风。敏斯（Means）是这么说的：

“关于马来人针对《报告书》所提出的批评，联盟还是较为敏感，尤其是因为，马来选民人数超过其它族群的选民人数。”<sup>21</sup>

这是为了确保，在后殖民地时代，对其它伙伴而言，巫统能在政治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马来特权的存在，变成没有期限的了，只由马来国家首长定期进行检讨。在语言和宗教课题上，联盟对马来人也作出了很大的让步：1957年8月31日，伊斯兰教被宣布为官方宗教。

管理穆斯林事务的任务，由统治者掌玺大臣承担。不过，他必须向“统治者会议”负责。在每个州，那些约束马来人的伊斯兰宗教禁忌，则由苏丹管辖下的“伊斯兰宗教与马来习俗理事会”来执行。宪法规定，马来文为官方语文。这点为巫统

提供了机会，在往后的日子里，把马来文诠释为主要语文。

1957年，当《拉萨教育报告书》转化为法律时，华裔族群中大部分人认为，这是试图抑制华校母语教育的法律。在檳城、怡保、吉隆坡、芙蓉等地的许多华文学校都发生了动乱。1957年11月，华文教育就成了怡保-万里望（Menglembu）补选的主要课题。马华竟采取和政府一致的立场，这对华文教育不利。

华人社团把选票都投给了人民进步党的候选人D.R.辛尼华沙甘。他在两年前的1955年大选中，对垒联盟候选人时，连按柜金都被没收了。这次，他却以可观的多数票，打败他的联盟对手。其实，这全托福于华裔社群给他的支持。

独立时制定的《宪法》有效地使种族主义制度化，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也反映了各势力之间的对比，对联盟有利。对于刚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条文被妥协了，只因马来统治者极力反对这项条文。

另一方面，联盟必须包容非马来资产阶级的上等阶层，因为他们是我国后殖民经济统治阶级的重要联系。联盟的三个种族主义政党之间，不但存在如何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问题，同时，党内的领导层也还得满足他们各自的群众基础的要求，尤其是中产阶级的要求。

毫无疑问，种族主义政治加剧了这些斗争。各派系在建立他们的阶级根基时，决不放弃诉诸于种族情绪。他们所用的、可以预见的形式，就是指责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各党的领袖“出卖他们的民族”。

马来亚联合邦采用“立宪君主制”，由9位苏丹选出一名国家元首。直到独立日，紧急状态时期的法令和条例仍然在实施。大部分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有“制约均衡”的制度，但是，我国独立时制定的《宪法》却通过两项条文回避了这样的制度。这两项条文就是：第149条（授权国会以特别权力对付颠覆活动）和第150条（授权行政机构以特别权力实施紧急状态）。

“自由”的选举制基本上掩盖了农民对封建贵族领袖的封建效忠和职责。这些是束缚农民的传统意识。除了农村机构所熟悉的经济纽带以外，拥有土地的贵族，对农民的政治和思想意识具有主导作用。苏丹享有特别权力：他们以保卫者的身份管理马来人的宗教和习俗。伊斯兰教被制度化，成为国家宗教。这点更加强了封建贵族的主导权，每个马来人都得接受。

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并不因为国家已独立而减少。有人继续从种族的角度来诠释这些不平等现象。三大民族的群众仍然在同样的种族分工中，互相隔离。只有在白领阶级的职业(如：教师行业、民事服务等)方面，种族分工稍为减少一些。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之间的自由社交，似乎只局限于上等阶层——在联盟“三头政治”内部。这就是多元论者所指的“水平线的团结”。种族通婚仍然不普遍。在马来法律体系中，宗教与法律是分不开的。因此，非马来人必须先皈依伊斯兰教，才能考虑和马来人结婚。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民族所组成的联盟党，其特征之一就是，自创党以来，巫统绝对是具有主导地位的伙伴。这种现象跟殖民结构中马来人的特殊地位、马来人在选民中占多数、以及国家的政治策略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往后制定的国家政策中，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它也促成马来官僚资产阶级的崛起。结果，这个联盟不论达致任何妥协方案，在“马来人特别权利”问题上、在限定公民权和制定教育政策问题上，巫统永远是占上风的。

### 官僚资产阶级的崛起

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是“联盟方案”内在矛盾的悲剧性结果。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把“温和派”政治谋略的失败，当作是暴乱的起因。这种观点显然忽略了正在形成的阶级组合，以及联盟所严格执行的政治控制已达到了极限。值得注意的是，当国家的种族主义策略导致人民群众四分五裂时，也

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这些派系都诉诸于种族情绪，以便讨好他们各自的基本群众。

随着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大马，总的来说，大马政治势力的均衡也起了变化。西马的统治阶级几乎可毫无约束地行使其经济和政治权力，这就引起沙巴和砂拉越的不安。

新加坡被开除出大马一事，不只没咨询过沙巴和砂拉越的政治领袖（遑论当地的人民），就连原本预料会由新加坡提供给东马的经济援助，现在也被剥夺了。吉隆坡所具有的主导权，日愈膨胀，更是令人震惊。这是因为在维持大马种族平等关系的政治势力均衡中，“东马”两州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了。

实际上，大马成立前的种族政治，毫无退减的迹象。人民行动党及其套取非马来人选票的机会主义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由民主行动党所继承。由于来自人民行动党方面的挑战已不复存在，具统治地位的联盟本身内部，三个成员党（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所提出的互相敌对的种族诉求，又再次暴露无遗。

在这些课题上，东姑扮演着仲裁人的角色，但他这个角色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新兴的马来官僚资产阶级开始在新的势力均衡中崭露头角。在巫统内部，有人要求对非马来人实施更为严峻的公民权法律，并加速推行马来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文。<sup>22</sup>

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可以从大马计划的内容看得出来。在“第一大马计划”（1966-1970）下，出现更多的联邦和各州的农业机构。这些机构是为了提供农民更多渠道以取得贷款、进行市场活动、延长服务期限等等，以便加速提升在农村地带的商业服务。其中包括：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扩大营业范围；成立国家稻米局（LPN）、大马食品工业（FIMA）、渔业发展局（MAJUIKAN）、畜牧业发展机构（MAJUTERNAK）、橡胶小园主发展局（RISDA）、农民组织局（FOA）、以及各州的农业发展公司，包括大马农业研究机构（MARDI）。

为了负责管理这一切农村计划，政府设立了极其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就为贪污舞弊和权力操纵制造了无限机会，同时也为官僚资本家制造了马来中产阶级根基。

## 绿色革命

60年代下半叶，政府推动“绿色革命”，进一步促进了富裕的马来农民和官僚资本家的利益。绿色革命是世界银行鼓吹的增加农产品产量的计划。为了要生产“奇迹米”，就必须要有水利工程的建设，因为它必须要有理想的条件，才能有好的产量。

因此，吉打州慕达(Muda)计划和吉兰丹州肯木布(Kemubu)计划，主要是依赖世界银行基金。<sup>23</sup> 还有，所需要的营养品、肥料、农药等，都是高产量种类所不可或缺的。这些都是由跨国农业公司所提供的。例如：我国所有的肥料都是由波德申大马化学原料公司(ICI)的子公司所提供的。ICI和农业部以及树胶研究院建立起了长期的联系。氮化肥料厂也和Esso油公司有关连。代理机构(Agency Houses)、哈里申·克罗斯菲、牙直利等，在本地市场参与推销和分销产品。

提供给农民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政府津贴。但是，研究报告表明<sup>24</sup>，主要得利者却是富裕的农民。稻米的保证最低价格由国家稻米局决定，目的是为了鼓励生产和增强生产率。

可是，政府给农民提供津贴，却对消费人不利。其实，这是马来官僚资本家收买马来农民的一种方式，旨在延续他们的种族主义政策。在增强生产率方面，“绿色革命”确曾达致它的目的；从1957年到1972年间，稻米种植的土地面积只增加了28%，而稻米产量则增加了170%。<sup>25</sup>

1971年第二大马计划伊始，我国消费的近乎70%稻米，都是在国内生产的。但是，在消除农村贫穷方面，“绿色革命”实际上反而加剧了阶级分化。

从60年代开始，显而易见，马来统治阶级内部正进行着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贵族阶级“元老派”，另一方则是那些想进一步发展官僚资本的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催生一个纯粹的马来官僚资产阶级。

一场内阁危机，导致1962年阿兹·依沙哈被革职。这次的内阁危机可算是这场马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表现。依沙哈是当时的农业与合作社部长。他倾向于在农村成立推销、贷款、加工等合作社，以便消除非马来商家对马来农民的经济控制。

当时，依沙哈被革职这件事，显示出，以东姑为象征的“元老派”，在马来统治阶级中仍然占优势，他们不愿意改变现状。“元老派”满足于循序渐进的措施，如：提供经济和社会设施和设备，为农村马来人提供零零碎碎的选举期间的酬报。与此同时，则允许非马来资本家在私人领域中自由发挥。因此，在60年代末，马来资本在数量上微不足道。

1959年，农村内部矛盾和农民的不满，导致泛马回教党在马来亚东海岸州选举中，取得胜利。回教党领导层，是由城乡两地的马来中产阶级所形成的。他们对巫统执政期间的表现感到不满意。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们对巫统的主要批评是：巫统领袖及其追随者所过的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非马来人的妥协态度。回教党指责巫统领袖及其追随者是异教徒。

但是，巫统党内的中产阶级成了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根基，因为他们从马来人的优惠政策中得到好处，也希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 土著经济大会

1965年，“第一届土著经济大会”正式举行。在这个大会上，政府的表现受到众多的严厉批评，指责政府没协助马来资本的形成。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宣传种族主义思想；那是预料中的事。

结果，乡村工业发展局（RIDA）设立了人民信托局（MARA），连同其它国家企业，如：土著银行和联邦农业促销局（FAMA），积极培养马来人的商业利益。

到了1968年的“第二届土著经济大会”，巫统党内的同一批分子，更大事叫嚣，要求政府必须尽量发展官僚资本，以协助促进马来人利益的成长。显然，那些仅仅满足于进入非马来公司董事局的传统马来统治阶级，已快速变成了少数。

随着国家加紧干预经济，马来官僚资本家的胃口越来越大。这个阶级源自传统马来统治阶级。国家独立以来，政治势力的重组促进了他们的成长。更重要的是，马来统治阶级利用马来人特殊权利的种族主义策略，促使阶级势力均衡倾向于他们这一边。结果，他们侵入经济领域。这对我国其它阶级势力来说，已成了既成事实。

1965年，印度尼西亚将军政变发生过后，巫统党内的极端种族主义的马来人所提出的要求，更是变本加厉。部分原因是，他们从苏哈多将军那里得到启示：

“我们的意愿是要建立一个更大的“马菲印”国。也就是说，我们要和马来族和其它友好邻近国家团结在一起。”<sup>26</sup>

新加坡被逼退出大马，也确保了马来人在联合邦作为最大族群的地位。巫统在联盟党内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也得到保障。联盟党内种族之间的讨价还价，也必须服从于巫统高层领袖所能接受的条件。那些不能遵守跟巫统合作的条件，如：忽略“马来人的特殊权利”、语言和宗教等“敏感课题”的非马来人，都被排挤出他们的政治体系外。

1967年8月31日，马来语成为国语和唯一的官方语言。在政府部门和教育体系强制使用马来语，也是为了确保马来人的优惠和特殊权利。1957年国家独立时，所设定的是：优惠马来人只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能维持大约10年之久，目的是为了“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以达致非马来人一样的

水平。”<sup>27</sup>然而，这些特殊权利现在已制度化了。这就构成了1969年大选的背景。

## 结语

我国独立时所提出的“联盟的种族方案”隐含着重重矛盾，这就加深了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大选。英殖民政府支持巫统提出的“马来人特权”的要求。反殖的民族主义者不得不采取防卫性的立场，即：提出非马来人的公民权和文化权利。

后殖民主义的经济也提供了条件，促使马来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他们利用“马来中心主义”这个意识形态，以争取马来群众的支持。在这个时期，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一直都存在着，并且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继续以种族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诠释。

## 参考资料

- 1 From Sir H. Gurney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es (亨利·葛尼勋爵致给殖民地大臣的信)，19.12.1948，FO 371/1583，quoted in Hua Wu Yin (aka Kua Kia Soong),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London: Zed Press, 1983, p.98.
- 2 *Malayan Monitor* (《马来亚箴言报》)，12.6.1952. Ibid., p.99.
- 3 Rules of the MCA (mimeo), Rules 4-7; p.42, ibid, p.99.
- 4 G.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24.
- 5 M. Osborne, *Region of Revolt: Focus on Southeast Asia*, Pelican, 1970, p.97.
- 6 *Straits Times*, 12.6.1950.
- 7 *Straits Times*, 9.10.1950.
- 8 Federation of Malaya, *Annual Report 1950* (《1950年马来亚联合邦常年报告》)，p.24.

- 9 M.V. de Tufo, *A Report of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1947年人口普查报告书》)。
- 10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 (Amendment) Ordinance, 1952* (《1952年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修正)法令》)。
- 11 V. Purcell, *Malaya: communist or fre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54, p.196.
- 12 K. J. Ratnam,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Kuala Lumpur: Pub. for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y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p.92.
- 13 Federal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s, November 1952; cited in K. H. Khong, "British Rule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in Malaya, 1945-1957", PhD Pittsburgh, 1975.
- 14 *Straits Times*, 11.2.1952.
- 15 Singapore Standard, 23.1.1955, cited in G.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p.161.
- 16 J. M. Gullick, *Indigenous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Malay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9, p.135.
- 17 Malayan Monitor, 1.1.1956, quoted in K. H. Khong, op. cit., p.186.
- 18 Federation of Malaya Information Services, Bulletin No.6072/56, p.1.
- 19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马来亚联合邦宪制委员会报告书》), KL, 1957, p.183.
- 20 同上。
- 21 G. Means, op. cit., p.174.
- 22 *Singapore Times*, 18.8.1965, p.7.
- 23 慕达计划1 (Muda I Scheme) 花了马币2.28亿元 (US\$105m)。慕达区域大约生产本地稻米产量的一半。
- 24 K. P. Ho,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3 June 1980, p.104.
- 25 Hua Wu Yin,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p.146, Table 6.1.
- 26 *Newsweek*, 5.9.1966, p.43.
- 27 R. K. Vasil, *Politics in a Plural Society: A Study of Noncommunal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 Malaysia*, 197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4.

## 第 2 章

### 1969年大选

根据官方说法，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应归罪于：在1969年普选中取得可观成绩的反对党的挑衅。但是，据根通讯记者的报道，我们很难找到证据来支持这项指责。也没有证据显示，普选成绩揭晓后，一般的马来人和华人“自发地”发动暴乱。

到了60年代末，种族主义者的争论不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独立后的事态发展，导致工人和农民以及一部分非马来中产阶级的不满。

入息所得分配的数据表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实际的家庭收入也绝对在下降。<sup>1</sup> 非马来族工人和中产阶级更加不满，因为国家歧视性的土著政策不仅在职业方面实施，也在教育、奖学金、发出执照等方面实施。

1969年大选期间，各阶层人民都对联盟表示不满。1968年，大事逮捕左派领袖，几乎把左派政党都封禁了。<sup>2</sup> 因此，在大选中，参选的主要反对党都在玩弄种族情绪，利用群众对联盟的不满。

劳工党决定不参与宪制的政治活动。人民党是硕果仅存、拒绝诉诸于种族主义的政党，而把精神专注于“阶级团结”。人民党的竞选纲领指出：

“在联盟党内的马来封建主义者，和华族与印族的大资本家，在国际资本家的支持下，经常一直在剥削我



国各民族的农民、工人、渔民、小商、低级公务员等。”<sup>3</sup>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继承者——民主行动党，为城市非马来族的利益而斗争。泛马回教党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宪制手段，为马来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sup>4</sup> 农村的马来教师和宗教司狂热地宣扬，要把马来族群的意识形态施加于全国人民。

泛马回教党党员的献身精神和巫统党员的成了强烈的对比，并威胁到巫统的乡村组织和权力根基。这种对立现象目前还存在。人民进步党则以两名律师西尼华沙甘兄弟为主。他们主要吸引了霹雳州的非马来人选票。民政党在1968年成立，是以槟城为堡垒的数个反对党的领袖和知识分子所组成的。

### 反对党达致竞选协议

尽管这些反对党各自的种族性宣传是南辕北辙的，他们还是达致了一项竞选协议：避免分散选票。

大选结果动摇了现状。自国家独立以来，从来未受过挑战的联盟殿堂完全被摧毁了。巫统失去17个国会议席，主要是给泛马回教党夺去了。巫统只获得51个国会议席。马华公会只赢得了13席；原有的另外20席也给反对党夺走了。印度国大党虽然分配到3席，却只赢得了2席。<sup>5</sup>

州议席竞选结果，更是令人惊讶：联盟在吉兰丹再次输给了泛马回教党。在槟城和霹雳州，联盟被击败。在雪兰莪州（首都所在地），联盟和反对党平分秋色。丁加奴州总共有24个州议席，联盟只获得了13席。

1969年大选来临的时候，毫无疑问的是，执政党联盟将无法再享有自独立以来所享有的无上权力。这是大马自1957年独立以来的第三次大选。

10年前的1959年，新加坡、沙巴、砂拉越还未加入大马联合邦以前，联盟在马来亚联合邦大选中，取得了三分之二多数

席位。1964年，大马（包括新加坡）成立一年后，和印度尼西亚对抗危机期间，联盟联合政府甚至以更大的多数票取得政权。

然而，1969年竞选运动期间，联盟却处于挨打的地位。反对党为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则招惹了执政党巫统带有种族色彩的愤慨。巫统已习惯取得三分二多数票，以便统治国家和随意修改宪法。但是，这次联盟担心的是，在这一届大选中，他们所获得的支持削减了。

专家们预测，联盟将失守砂拉越州立法议会，败给砂拉越国民党（SNAP）和人民联合党（SUPP）。民政党可能在槟城取胜，玻璃市败给泛马回教党。专家们也担心，巫统在丁加奴和吉打州的影响，将逐步消失。

我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马华在华人选民中受欢迎的程度，大大降低。不过，联盟实质上的执政党巫统，在吉打、玻璃市、北霹雳，受到泛马回教党的挑战。这就动摇了巫统一向来主导马来人和伊斯兰卫教者的地位。泛马回教党正在一步步争取北马的稻米区农民的支持。这些马来农民崇尚传统。因此，要他们和吉隆坡政府内部的富裕又“洋化”的马来人打成一片，确实有困难。

1964年，马华面对人民行动党的竞争，还表现不错。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仰赖于马来选票，主要是因为慑于印度尼西亚对抗所产生的局势。1969年，马华在争夺西海岸的议席时，必须面对泛马回教党进行分裂马来选票。马来选票起决定性的作用。马华还必须面对民主行动党在森美兰的激烈竞争。

3个州立法议会可能落入反对党手中。面对这种形势，联盟不得不对许多政策进行反思。这次大选也是对民政党的一次严峻考验。民政党试图在槟州立法议会确立其地位，并有意夺取一些国会议席。马华与行动党之间的尖锐斗争迫使巫统反思：应如何维持“联盟方案”。

因此，1969年大选前夕，一边厢，回教党指责巫统把马来人的利益“出卖”给华人，并背叛了伊斯兰教；另一边厢，行动党则指责马华，把非马来人的权利出卖给巫统。

财政部长，也是马华领袖的陈修信，指责行动党和回教党结下了“邪恶的联盟”，因为两党达致竞选谅解：回教党在霹雳州分裂马来人选票；而行动党则在马来人占多数票的地区，分裂华人选票。

大选前夕，对马华是否有能力保住华人选票，巫统已显得不乐观。马华在竞选运动中，表现差强人意。在八打灵再也和十五碑（Brickfields）两个地区，孟沙（Bangsar）81,000名选民中的“捣乱者”，向当众演说的陈修信提出诘问，使他感到极为难堪。当时，马华的刘集汉对垒行动党秘书长吴福源。

行动党在森美兰和霹雳州，派出有份量的候选人参选，希望至少能斩获5个国会议席。教育部长佐哈里宣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泰南的马共已派人潜入大马境内，为民主行动党和泛马回教党助选。

马华诉诸种族论调警告说，马华是唯一能和巫统合作的华人政党。如果华族社群响应和接受行动党的竞选号召，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多元民族方案将就此告终。陈修信呼吁华人不要分裂华人选票，并强调，在治理国家方面，马华是唯一有能力照顾华人利益的政党。

1969年大选中，行动党和马华的争论是最为激烈的。马华指责行动党领取新加坡的助选金，而行动党则指责联盟向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取美金作为竞选基金。<sup>6</sup>

虽然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进步党三党达致了某种竞选安排，但是，他们无法在基本政治纲领上达致协议。如：在《内安法令》课题上，民政党无法认同其它盟友的看法，也无法在语文课题上，达致统一的政策。

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留下了真空。民主行动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即刻填补了这个真空。劳工党是社阵的主

要成员党。在前一届1964年大选中，社阵赢得了选票总数的14%。社阵很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非种族性政党，进而取代联盟。

那时，社阵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已经瘫痪了。不过，有许多支部还在全国进行活动。1967年，社阵曾讨论过是否还要参加选举。但是，在槟城发生暴动期间，他们许多领袖都被扣留了。过后，在1969年11月，社阵有更多的党员被逮捕。

1967年尾，社阵领袖陈志勤医生和职工会领袖V大卫退党，转而加入民政党。民政党是由林苍佑医生和阿拉达斯兄弟于1968年4月成立的。它无法争取到群众的支持，但全靠陈志勤和林苍佑两人的魅力支撑着。

劳工党为杯葛大选的行动辩解时，所提出的理由是：联合邦政府决不能容忍一个非种族主义的左倾反对党存在。另外，劳工党如果参加大选，就等于姑息种族主义政治。那年杯葛大选造成怎样的后果？到了今天，这问题还在没完没了地争论不休。

大选中，联盟警告选民说，把选票投给反对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陈修信在孟沙选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说，投票选出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吴福源，其代价是“选区将被忽略”。他说：

“一般选民必须切记，在理论上，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反对党，那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实践上，它意味着，选出反对党作为代议士的那些选民，将受苦受难，而且是遭受可怕的苦难，只因为他们渴望，有人能代表他们在国会怒骂政府。”<sup>7</sup>

槟城的选民受到警告，除非他们投票选出联盟当政府，否则他们在经济上将会有难。在古晋，交通部长丹斯里沙顿强调，中央政府很难和一个砂拉越反对党州政党相处。另一名联盟领袖甚至公开宣称，除非泛马回教党先夺取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不然就没有机会发展吉兰丹。

针对联盟这样的行为，有一个解释：他们感到四面楚歌，那是大马的政治风格使然。他们警告选民，如果联盟不能胜出，大屠杀事件将会发生。<sup>8</sup>

关于东姑仍然在主导着政治局面的疑问开始流传。大选前，东姑宣布，这是他最后一次参选。敦拉萨借机立即要求全民，在大选中让联盟重掌政权，以便向东姑多年来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致以最后敬礼。根据美国《时代》杂志的报道，东姑在早些时候已指定敦拉萨为他的接班人，陈修信完全同意这项安排。不过，东姑并没清楚表示，副首相什么时候才能接班。

当时东姑66岁，并不算老。他在处理政治事务时，仍然精明得很。但是，他是否已作好准备，应对即将发生的政变？《远东经济评论》通讯记者波比·里斯（Bob Reece）这么说：

“东姑仍抓住一个信念：他是一种镇定剂，可以保住马来西亚的和平与繁荣。可是，当他越这么想，敦拉萨就更难到达最高的巅峰。权力并没使东姑腐化。但是，权力使他能尽情享受生活。没有迹象表明，他有意放弃这种生活。”<sup>9</sup>

1959年和1964年两次大选，对联盟和反对党获取支持的竞选方式作个比较，分析一下这次国会大选，就能洞察西马仍未解决的紧张局势和其它问题。东马两州也有类似的紧张局势，但是，没有足够时间可采取补救对策。

为了理解竞选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矛盾，有必要简述一下西马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特征。1966年，马来人占西马人口的50%，其余的人口则由华人（37%）、印度人（11%）和其它族群（2%）所组成。大马独特的多元民族情况是复杂的：马来群众，传统上都聚居在农村地区，比起主要居住在城市的华人（63%）较为贫穷、较少受教育。总的来说，华人的经济条件比较好。

其次，在选区分配方面，确保马来乡村选区占优势，而不利华族人口密集的城市选区。从这原有的选区划分开始，国会选区的分界线已经历了几次变更。可是，这种最基本的平等现象并没有纠正过来。

例如：1969年民主行动党所赢得的孟沙选区，城市选民的合格选票有46,698张。相比之下，联盟在下霹雳（Hilir Perak）选区所赢得的合格选票，只有12,221张。<sup>10</sup>

自从1957年独立以来，由乡村向城市移民的趋势日愈严重。1947-1957年间，城市在加速发展，尤其是首都吉隆坡，已经历了快速成长。许多移居城市的是来自农村的马来人。他们在甘榜无法找到就业机会。除此以外，由于缺乏足够的住屋，他们不得不移居到非法木屋区，如：拥挤不堪的甘榜峇鲁（Kampong Baru）。甘榜峇鲁就是1969年发生最严重的种族冲突的地点。

在马来半岛其它地区，华人和印度人也面对同样的失业问题；尤其是槟城乔治市、马六甲、霹雳州怡保市、森美兰州芙蓉市等。这些都是非马来人对联盟政府不满的地区。

在最后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联盟如何试图采取一种政策，即：政府在乡村地区投资，只为了提高马来人口的生活水平；同时，为了发展城市的工业区，提供奖励，刺激私人企业在各城市投资。

政府也力图提供政府部门职位和工业领域的就业机会，方便马来人逐渐融入城市社会。尽管在这方面有些成绩，但是，速度显然不足以为城市工人制造劳工就业机会。因此，两个社群越来越显露出不满情绪。

华人社群把联盟党的政策，看作是太过偏袒马来人；马来社群则认为联盟党的政策，为达致成果的速度还不够快。所以，必须以种族两极化日愈严重的情况作为背景，来分析1969年大选的成绩。

显而易见，早在1959年，联盟党已盘据了柔佛、彭亨、吉打、以及西海岸各州，如：檳城、霹靂、雪兰莪、森美兰州的马来选区。泛马回教党控制了吉兰丹和丁加奴两州。社阵和人民进步党则在西海岸各州的城市地区占尽优势。

10年后，联盟从泛马回教党手中夺回丁加奴。泛马回教党则在吉打州有重大的斩获。那是一个马来人占多数的联盟堡垒区。尽管起了这些变化，选民对这两党的支持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

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只是继承了社阵遗留下来的势力范围，即：混合区和华人占多数的檳城、森美兰、雪兰莪的城市地区。人民进步党仍保留它在怡保城市堡垒区及其周遭地区。

前几届的大选，分外鲜明地显露了大马社会种族结构的影响。比方说，联盟一般上所采取的政策是，在三党联盟的每个选区内，必然是由人口占多数的种族社群委任候选人。泛马回教党几乎都是在马来选区获得支持。不过，它在混合选区所得的选票在增加，其选票主要来自西海岸的雪兰莪和霹靂州的马来人。

60年代社阵在混合区和华人选区的影响力，对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有利。其它政党在华人地区的影响力似乎在衰退，尽管这些政党中的主要政党，即人民进步党，在1969年大选中，赢得了4个席位。总的来说，人民进步党所获得的支持，看来仍然是反映了1959年那种以种族为根基的支持。

1969年大选结果显示两极化越来越严重。这表明，联盟的政策并不能说服西马大多数人民，应继续支持执政党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选成绩如此，完全没有理由硬指大选引起自发的种族暴乱。以下是《远东经济评论》通讯记者TG麦基（McGee）所作的观察：

“显然，1969年大选结果，不应该是后来发生种族暴乱的催化剂。其实，马华失去了大多数华人的支持。同样地，巫统也失去了一些马来人的支持。但是，这

些趋势只是一种信号，表明：联盟建立多元种族社会所采取的政策有不足之处，这不应诠释为人民对联盟已完全失望；也不应解释为：另一个政党（或数个政党）所采取的手段，足以推翻现有政府。”<sup>11</sup>

## 结语

在1969年大选中，联盟党遭到反对党的严重挫败。这是因为，反对党在这次大选中，达致竞选协议。根据“513事件”的官方说法，暴乱事件的发生，应归罪于反对党的挑衅行为。可是，从当时通讯记者的报道，我们很难找到证据以证明这项指责。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及城市开拓者之中，普遍存在着不满的情绪。国家所实施的种族歧视政策，只能进一步加剧人民之间的分裂。1969年大选的成绩明显地反映了日益严重的种族两极化现象。

## 参考资料

- 1 *The Treasury Economic Report, 1974* (《1974年财政部经济报告》)。
- 2 Anne Munro-Kua,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 Malaysia*, London: Macmillan, 1996, p.5.
- 3 “Parti Rakyat Manifesto”, R. K. Vasil, *Politics in a Plural Society: A Study of Noncommunal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79.
- 4 *Malay Mail*, Kuala Lumpur, 13.4.1969.
- 5 Ismail Kassim, *Race, Politics and Moderation: A Study of the Malaysian Electoral Proces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79, p.9.
- 6 Bob Reece, “The Tunku’s Last Elec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4/10.5.1969.
- 7 同上。

- 8 同上。
- 9 同上。
- 10 Kua Kia Soong, "Constituency delineation and democracy", *Reforming Malaysia*, Kuala Lumpur: Oriengroup, 1993, p.41.
- 11 T. G. McGee, "Down -- but not Ou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23, 1/7.6.1969, p.566.

### 第 3 章

## 关于暴乱事件的公共档案

伦敦国家档案局和外国通讯记者报道的解密文件揭露，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中。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从整个雪兰莪州把马来流氓纠集到雪兰莪州务大臣官邸。阴谋正在酝酿中。暴乱一开始，保安部队并没公正地维持秩序，只是袖手旁观，任由暴徒们随意烧杀干案。军队也胡乱向华人商店开枪。他们进行逮捕时，表现得不公平。结果，死伤的大多数是华人。

这些文件也表明，暴乱一开始，控制权全都掌握在拉萨手中。紧急状态颁布以后，他一手策划1969年后的政治结构，并获得了武装部队的支持。

5月13日傍晚，吉隆坡发生了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暴乱。根据官方报道，几天内，有13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数百家房屋被烧毁，几十辆车辆被焚烧。

确实的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一向来都在争论不休。不过，从伦敦国家档案局的文件所收集到的各种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官方数据与事实不符，相差太远了，而伤亡人数的种族数据也被掩饰了。

### 事件发生前后

1969年大选成绩公布后，显而易见，当权的联盟遭到严重挫折，虽说联盟还能保住国会里的简单多数席位。他们失去檳城，由民政党夺得。吉兰丹州由泛马回教党斩获。霹雳和雪兰

莪州也几乎落入反对党手中。

联盟几乎肯定会失去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票。自从独立以来，三分之二多数票使联盟有权随意修改《宪法》。联盟3名部长，两名政治秘书失去席位。它所获得的合格选票，比1964年大选少了9%，只剩下49%。自独立以来，联盟在联邦国会第一次得面对喧嚣的反对党。

星期日和星期一两晚，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兴高采烈的支持者，摇着党旗的车辆所组成的队伍，走遍首都吉隆坡的街道。对大选成绩的即刻反应是：反对党欢欣鼓舞；联盟则大惊失色。选举活动起着煽动种族紧张局势的作用。一名劳工党年轻党员在几天前，被警员开枪击毙，所以投票前夕，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游行穿过市中心。

5月11日和12日两晚，反对党为他们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而欢庆。尤其是民政党的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欢迎民政党左翼领袖V大卫凯旋归来，因为他赢得了檳城国会议席。

观察大选的驻吉隆坡外国通讯记者发送新闻报道，赞美大马民主程序，预测大马将享有5年的和平与繁荣，并且有一个效率更好的政府。东姑对大选结果初步的反应，自然表示失望。但是，他承认，人民应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人民已实现了这个愿望。

第二天所发生的事件显示，巫统党内的一些分子已策划，要教训那些想挑战巫统主导地位的人士。看来他们这次的行动，得到警察和军人的默许。

### 5月13日：巫青团员聚集在州务大臣官邸

马华在大选中惨败，因而在星期二宣布退出内阁，不过，仍留在联盟党内。大选前，敦拉萨曾经警告过华裔选民，除非他们投票给马华，不然他们将失去政府体制内的一切华人代表权。

在峇都路巫统总部，普遍的感觉是，民主的发展已超过限度。换句话说，马来人的政治霸权正面临真正的危境。雪兰莪和霹雳两州很可能选出非马来州务大臣。

从《远东经济评论》通讯记者波比·里斯（Bob Reece）当时所作的报道看来，有证据显示，巫统党内一些分子，在计划动员青年人到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Datuk Harun Idris）官邸集合。接着，在甘榜峇鲁和峇都路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很快就传遍吉隆坡各个角落。所实施的戒严令，并未公平地实施用于所有族群；有人指责军人随意朝华人店屋开枪。

“星期二（5月13日）傍晚，来自整个雪兰莪州的年轻马来人，开始聚集在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官邸外。巫青团计划举行报复性的游行示威。示威游行到峇都路的苏里曼法院（Suleiman Court）结束，接着就举行群众大会。但是，警方不发给准证。当这些人正在集合准备游行时，甘榜峇鲁马来区附近，爆发了骚乱事件；两辆华人的罗哩车被烧毁。”

“到了傍晚6点半，一大群人从Jalan Raja Muda一直沿路肆虐到峇都路。另外一群人从甘榜峇鲁冲向Jalan Hale，这是马来区进入华人区的出口。

“傍晚7点15分，我可以看见暴民像一窝蜂那样，群集在Jalan Raja Muda和峇都路的十字路口。有更多车辆被捣毁，华人商店被焚烧。

“峇都路的华人商家和印度人商家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地区防卫队’，用任何能找到的东西，如：巴冷刀、木棍、铁枝、玻璃瓶等当作武器。我看到一个可怜的老人，手中紧握着一枝铁铲。罗哩车在马路上来回行驶。有些男人站在罗哩车的车身里，呼吁大家团结起来。

“一名16岁的少年，把一块布撕成布条子，用来作为辨认的记号。当前来侵犯的马来人队伍，有如前来时

那样快速撤退以后，居民开始采取报复行动。那些被怀疑是马来人的店面和汽车，被砸坏或烧毁。有人几次想火烧附近的巫统总部。巫统总部用来作宣传工作的三辆吉普车，大早就被焚烧了。一辆巴士的马来司机被攻击，据说是因为他撞倒了骑脚车的两名华人。

“大约到了晚上9点，警察才赶到现场。但是，他们并没久留在那个地区。过后，数辆载满后备队（暴动队）和皇家马来军团的罗哩，在这里经过。一看到军警车队出现，街上的华人即刻跑回店屋去。但是，车队经过后，他们很快又出现在街头。到了子夜，我发觉到整条街几乎没有人。不过，远处传来枪声，并看到火光。这说明其它地区也在发生骚乱。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星期二晚上，戒严令不是在所有地区一视同仁地加以实施。在Jalan Hale的一些横街，我看到成群的马来青年，集合在一起，手中拿着巴冷刀，或持着削尖成矛的竹支当武器。派驻在路口的军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但他们却袖手旁观。与此同时，在峇都路，一批外国通讯记者看到皇家马来军团成员，无缘无故地向华人商店开枪。整条街道是冷清清的。根据通讯记者的观察，居民们并没狙击或其它暴力行为。”<sup>1</sup>

东姑说，大选成绩揭晓后，反对党支持者的行为引发了暴力事件。他还说，这暴力事件提供了，共产党经常想要制造的局势。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星期五晚上，政府宣布，在峇都路逮捕了“93名死硬派恐怖分子”。他们拥有自制武器。据说，他们还承认有意图要攻击无辜的平民百姓。同时也宣布，在那周末，另60名“武装共产党”被监禁。

拉萨也同样地把事情归罪于共产党。那是为了避嫌，避免巫统受怀疑曾在这暴乱事件中扮演角色。他说：

“为了回应澳洲最高专员署的追问，拉萨否认：巫统有意在5月13日傍晚，组织大规模的游行队伍，穿过市

中心。他们只是在雪兰莪州务大臣的家门前集合，表示支持。当两辆载满年轻华人的罗哩车经过那里向他们挑衅时，才引发了骚乱事件。后来，这个局势被共产党分子充分利用了。他们必须对这些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负责。”<sup>2</sup>

### 5月14日：伤亡者大部分是华人

第二天，暴乱继续发生。不过，规模比起前一天的较小。戒严令解禁，只是为了方便人们购买食物。英国最高专员署的报道表明，伤亡者主要是华人：

根据目击者和官方报道，暴力事件在整个晚上都在发生。不过，较为零星，也很快被扑灭，蔓延的范围也比较小。保安部队更完善地组织起来，以限制和阻止暴力事件。希望今天早上，最严重的种族暴乱事件得加以制止。在城市各地区，解除戒严时间不同，为了方便人们购买食物。今天下午，戒严令将严格执行。”<sup>3</sup>

在另一个报道中，我们看到军队被召，以扮演更大的角色：

“警方动员了所有能调动的后备队，并把市区北部交由军队负责。根据警方报导，昨晚死伤人数是：44人被杀害，约150人受伤。”<sup>4</sup>

伤亡人数中，华人始终占多数，那是明显不过的了：

“… 5月14日，中央医院停尸房里的77具尸体，至少有66具是华人。”<sup>5</sup>

东姑说，暴乱的起因，是不效忠国家分子企图用武力推翻政府。在第二篇演词中，他说，共产党代理人在我国注入了大量的金钱。他还说，早些时候，共产党力图阻止大选的进行。一名青年据说是因警察为了自卫而被杀害。当时，有人发现他

在张贴反竞选的标语。他的出殡队伍，被共产党利用来举行示威游行。

然而，外国记者对游行队伍观察所得的印象，则是另一番情景：

“诚然，在游行队伍中，出现一些毛派口号和旗帜。但是，为数1万4千多人的群众，长达8里的队伍，其严谨的纪律不是由于共产党组织的存在，而是因为大家真正都能克制自己的结果。”<sup>6</sup>

### 归罪共产党，人们不卖账

大马政府企图把暴乱事件的发生，归罪于共产党，但英国最高专员署并不认真对待这种说法。他们看得出，东姑不愿意把暴乱事件归罪于自己的人民。他也不愿意把责任推到整个华族身上。

“我唯一的评语是……东姑或许故意选择把责任归罪于‘共产党’，因为出于政治理由，他不愿意责怪自己人（马来人），但又要避免公开责怪华人，不然，肯定会挑起种族情绪。”

“如果这是可令人信服的说法（但我不信服），这个花招的效应已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东姑的几个同僚，并没认真避免公开地或隐蔽地怪罪华人。

他们发表的几篇声明，指骚乱是‘不良分子’和私会党所引起的。这些声明只能被人认为是在指华人。更甚的是，因为发言者自认为了避免种族误解，所以进一步声称，当然不是所有的华人都是不良分子。”<sup>7</sup>

下面是一份寄给“外国和英联邦办事处”的秘密报道，打破了种族暴乱应由共产党负责的神话。到了5月尾，伊斯迈医生，接着是东姑，最后是加查里·沙菲都相继承认，他们早些时候把种族暴乱事件怪罪于共产党的作法，是不正确的：

“已有三个星期了，我和安全委员会（SCO）一直都在核定共产党卷入由5月13日开始的种族暴乱的程度有多深。简短的答案是：完全没有。

“这‘共产党神话’，是东姑本身于5月15日，在极其激动的广播谈话中，开始讲述的。他把整个事件的发生怪罪于‘共产党恐怖分子’，并且还谈到他们有计划‘要挟和恐吓’，要推翻联盟政府，夺取政权。”敦拉萨和伊斯迈医生（被召回续任的内政部长）过后在好多个日子里，三番数次重复了这项指责。

“……虽然在5月17日，东姑在另一次广播谈话中，承认‘不良分子’和‘雇佣破坏分子’也参与此事。但是，有证据显示，即使迟至5月29日，他还一直喋喋不休地谈论说，他相信共产党是发动暴乱事件的幕后人。当天，他是这样告诉美国大使的。

“可是，就在同一天，敦伊斯迈医生承认，他把暴乱事件怪罪于共产党。5月30-31日，纽西兰国防部长到访期间，东姑承认，早些时候所作的指责是不正确的。3天后，丹斯里加查里也这么承认。自此以后，大马人在私下谈论时，都采用了这个论点。不过，加查里只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中，公开承认这点。

“在大逮捕和扣留期间，有两大组人，被形容为‘共产党恐怖分子’。警方现已承认，他们只是普通的华裔暴徒。没有任何文件显示，他们事先有什么计划，或涉及暴动事件。心理作战组主任负责提呈证据，以证明他们事先早已预谋。可是，他并不能提出什么证据，只能交出一份1968年1月发出的传单。”<sup>8</sup>

一些问题的发生，曾归罪于砂拉越共产党。但是，真相也已大白了。有几宗纵火案件，据说是共产党所为。但是，被扣留的嫌犯原来是马来人：



“警察总监暗地里告诉我，从安全委员会（SCO）内部秘密资料来源所获取的证据看来，他现在已能肯定，纵火事件不是共产党干的，而是马来人干的。他也知道滋事的马来人名单。警察总监也告诉我，敦拉萨曾批评他说，他从6月7日开始处理内安局势的手法，以及他未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如：施行戒严令等，可能使局势恶化。”<sup>9</sup>

### 5月15日：颁布紧急状态

5月15日，星期日，最高元首援引《宪法》第150条颁布紧急状态。这项条文（有如1964年印度尼西亚对抗时期那样）授予政府这项权力。1959年5月15日《政府宪报》印发了下列文件：

- 一、援引《宪法》第150条，颁布紧急状态。
- 二、《紧急（必要权力）法令》，中止所有还未完成的选举。
- 三、援引《联邦宪法》第150（4）条发出指示，中止所有州立法议会，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 四、《1960年内安法令》下根据《法令》第二部分，宣布整个联邦为“保安区”。

当天下午，本地报章暂停发行，直到拟好新闻审查条例为止。不过，外国通讯记者所寄出的报道，不必受监督。但是，星期六，一些外国记者的戒严令通行证，被武装部队没收。

《海峡时报》主编，丹斯里何夫曼（Hoffman）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很有说服力的要求，希望当局解除这些官方举措。他这项要求特别重要，并起了作用，那是因为《海峡时报》的地位高而何夫曼的声望良好。他怪罪新闻部长寒沙，专门阻止大马公民，进行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寒沙回答时，解释说，本地报章被禁，那是因为本地报章在大选前和大选期间发表具有煽动性的文章。何夫曼抗议说：

“究竟什么是煽动性，什么不是煽动性，公务员能告诉我吗？”<sup>10</sup>

敦拉萨透露说，以他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成员包括：新闻部长、内政部长、警方代表和武装部队代表。同时，将成立一个微型内阁，其成员包括陈修信和许启谟。但是，这个微型内阁和国家行动理事会之间有什么关系，则不清楚。

敦拉萨仍然得向东姑负责。可是，《紧急条例》下的一切权力归于敦拉萨。国家行动理事会负责恢复法律和秩序，并在每个州和县建立起各级理事会。

在槟城，林苍佑医生宣誓就职为首席部长。在吉兰丹，泛马回教党拿督阿斯里在大选成绩揭晓后，即刻宣布，在州内的所有民族都被视为“吉兰丹”人。

拉萨说，当天，在吉隆坡的戒严令暂时解除。可是，局势急转直下，发生了更多殴斗事件。所以，他又再次实施戒严。两三天内，他完全不打算解除戒严令。不幸的是，粮食缺乏。

在这个时期，大马红十字会所发表的新闻稿，充分暴露了当时的情况，尤其透露了伤亡的程度：

“自从1969年5月13日晚上8时，戒严令在雪兰莪开始实施后，三辆红十字救护车和红十字人员24小时不停地工作。被送到中央医院的伤员无数，包括重伤者和有身怀六甲的妇女。

“中央医院设立的流动厨房，一直都在操作，提供热饮品给受伤病号、被疏散者、和自愿者。为了响应红十字会号召捐血者前来捐血的紧急呼吁，血库获得了300品特的血液。预约的捐血者名单上，有200多名人士。

“红十字会联盟常驻代表，莫琳·淮特小姐（Maureen White），和澳洲红十字会的全国青年红十字会秘书阿伦·文纳（Alan Werner）先生，一直不断地在支持大马红十字会……”<sup>11</sup>

### 5月16日：军队对华人有偏见

种族暴乱一发生，军队就奉召维持秩序。但是，他们对华裔大马人采取歧视的态度。这可以从英国最高专员署电报得到证明。

到了5月16日星期五，雪兰莪州的局势仍然紧张，车辆和房屋被焚烧，死伤人数在直线上升。檳城和霹靂州的局势已缓和，虽说戒严仍未解除。这可以清楚地从当天的英国最高专员署电报，看得出来：

“根据英文和中文报章报道，雪兰莪的局势是紧张的，但已受到控制。今晨，在吉隆坡有更多车辆和房屋被烧毁。死亡人数增加到89人，伤者超过300人。雪兰莪仍实施24小时戒严令，马六甲州也在实施。檳城夜晚没有骚乱事件再发生，戒严令已进一步放松。霹靂州的局势已和缓，今晨戒严令解除了3个半小时。马来报章还未见出版。”<sup>12</sup>

晚上10点，东姑作了广播谈话。他宣布成立一个国防部队，由自愿者所组成。他呼吁青年人踊跃参加，以表效忠。新上任的新闻部长寒沙·阿布·沙马和敦拉萨两人举行记者招待会，把种族暴乱的罪责归咎于：共产党已渗透反对党。副首相拉萨说，劳工党杯葛大选，那只是一个障眼法。共产党的真正策略是“恫吓”人民，逼他们投票给反对党。

当天，英国最高专员署另一封电报报道说，大部分抢劫案是马来军队所干的，也报道了马来军队如何对华裔大马人存有偏见。我们也看到了避难者的人数日渐增加：

“吉隆坡有数宗关于抢劫案的报道，包括一些军队所干的抢劫事件。我们也有其它目击证人，报道马来军队对华人的偏见。例如：军队对参与暴乱的马来人的无法无天的行径，视若无睹。军队在逮捕人时也采取偏袒的态度。这些报道来自英国贷款服务部的官员。他们所得到的印象是，马来人是骚乱的肇事者。

“显然，当局正在面对日愈严重的避难者问题，那是因为，两大族群的成员房屋被焚烧，或被赶出家园，而不得不寻求住所。其中一些人聚集在警察局和体育场。”<sup>13</sup>

马六甲也曾发生过至少一起种族冲突的事件：

“丹斯里加查里告诉我说，他们眼下相当关注马六甲的局势。今天早晨，在马六甲，有一名马来人力车夫被华人所杀害。东姑今天飞到马六甲去评估那边的局势。加查里强调，雪兰莪的食物问题，是政府所面对的最严重问题。”<sup>14</sup>

大部分的西海岸城市，一直到马六甲，都实施戒严令。警方和军队已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

“到了星期五，马六甲、森美兰、霹靂州的一部分、吉打南部、檳城和雪兰莪都实施戒严了。6个营的皇家马来军团，以及联邦后备队和警察，散布到广大的地区。所有的军队和警察都被动员了。

“民防部队也宣布成立。‘效忠国家’的青年人响应号召自愿入伍。有些人因恐慌而逃离现场，使数百间房屋无人居住。有人放火烧掉这些房屋。

“不过，到了星期四，消防队似乎在开始工作，尽管政府不理睬反对党领袖较早时，曾提出愿意合作，以抑制暴乱事件的发生，到了星期六早上，警察和军队在现场维持秩序，人们恢复了一定的信心。”<sup>15</sup>

## 5月17日：保安队伍的专业性受到质疑

如果从一开始，保安部队就以专业水平处理工作，暴乱事件早已受到控制。应注意的是，到了1969年，大马警察和武装部队在控制国内骚乱事件方面，已久经考验并经过严格训练。他们曾经历过紧急状态时期（1948-1960）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英国最高专员署5月17日星期六的电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官员对官方伤亡人数数据，持着怀疑的态度。死亡人数中，华人占多数。关于大马海军在柔佛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行动，有以下报道：

“昨晚显得较为宁静，尽管还有零星的焚烧事件发生和听得到枪声。警方估计死亡人数已达到100人。真正的死亡人数显然比这数字更高……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华人伤亡人数在比例上，要比马来人的高得很多。两者之间的比例大约是85对15（这是英国官员的估计）。

“我们获得大马海军行动的报道。两艘大船一直在新加坡海峡巡逻，那是为了阻止渗透者入侵。一支海军分遣队也正向着吧生驶去。”<sup>16</sup>

报章审查，不只遭受本地报章的批评，同时也遭到外交界的抨击。更甚的是，官方报道不清不楚，令人难以相信：

“《海峡时报》社论欢迎政府作出保证，吉隆坡报章明天将重新出版。压制报章是一个大错误。更糟的是，官方资讯媒体报道又不足。

“英文报章今天报道说，联盟将成立包括马华在内的临时内阁。

“东姑昨晚的声明……提到昨天逮捕了一群为数93人的恐怖分子。这次逮捕事件，究竟是发生在马六甲，还是在吉隆坡，报章似乎搞得稀里糊涂。”<sup>17</sup>

英国最高专员署写给国外与英联邦办事处（FCO）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承认（大马）曾发生政变，政权不仅已转移到“马来人手中”，同时，也转移给保安队伍。后者的专业水平受到质疑。这项悲剧的严重性，令人感到沮丧。显而易见，由于实施军事统治，警察部队面临危机：

“随着政权转移到马来人手中，政权也跟着转让给武装部队，而武装部队在最后4天的恐怖日子里，表现不很出色。在迅速应付紧急状态方面，其组织能力差强人意……在许多事件中，它的回应迟钝而毫无效率。在头24小时内，暴力事件迅速蔓延，警察部队几乎完全招架不来而失去斗志。正规警察部队原本是维持国家范围广阔的保安事宜。早些时候，马来保安部队表现偏袒，例子不胜枚举……我国一些军队领导层，其决策能力，显得很差劲。

“但是，这次的悲剧太惨了。在过去的几天，我们从窗口看到了到处焚烧，大事破坏；尸体在河中漂；互相格斗，用机关枪扫射群众；更甚的是，到处弥漫着恐惧感（就在一个星期前，这里还是一个较为安乐的城市）；孩子们被杀害；医院有人满之患；血库供应不足；社会秩序不复存在。一个政治试验被破坏了。当这国家稍微恢复正常操作时，一切将从头来过，而这个国家的人民也得重新开始学习如何和谐共处。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sup>18</sup>

从英国最高专员署这份电报，我们了解到联邦后备队（当时其组成是多元民族的）比保安部队更为中立。马来军团在执行戒严令时，则带有种族歧视性：

“我们在思考：他们强调‘共产党恐怖分子’的活动，是不是想把我们也卷进去，如果不是现在，就可能是在较久远的将来。我们排除了这可能性，而相信有其它较为可信的原因（我将在另一些电报中提出意见）。

“毫无疑问，有些保安部队带有歧视性地偏袒马来人。例如：马来部队犯了这种过失，但联邦后备队(也就是暴动队)则不然。种族歧视的形式是：他们在吉隆坡最有暴力倾向的马来地区(甘榜峇鲁)，不执行戒严令。在这些地区，用巴冷刀等武装起来的马来人仍可自由活动。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群群的马来人溜出那个地区的封锁线，去攻击封锁线外的华人。反观华人区，则严格执行戒严令。”<sup>19</sup>

### 5月18日：并非共产党，而是一群混杂的不良分子

我们无法知道，东姑对暴乱事件幕后“看不见的手”，究竟懂得多少。<sup>20</sup> 但是，当暴乱事件爆发时，政府不接受这个事实，却未加思索地作出反应，归罪于共产党。东姑后来澄清了他先前说过的话(指骚乱事件是共产党引起的)，转而归罪于一群龙蛇混杂的“不良分子”。他还宣布，展延砂拉越选举，并继续限制外国记者的自由行动。

到了5月18日星期六，首都一些地区局势仍不明朗。这点，可以从英国最高专员署所发出的电报看得出来：

“关于局势的报告

(时间：由5月17日中午12点，到5月18日下午六点)

“我们昨天所作的侦察显示，动乱事件集中在吉隆坡市区北部，但仍有事件在市区西部发生。昨天解除戒严3小时后，今天从早上7点到上午10点，作了一些安排。

“昨晚10点半，东姑再次广播讲话。在某个程度上，他澄清了早些时候对“共产党”的抨击。他怪罪于一群龙蛇混杂的“不良分子”、由共产党、恐怖分子、破坏者、和私会党党员等所组成。

“东姑宣称，有人力图把骚乱事件扩大到沙巴和砂拉越。不幸的是，他以这些地区人民的“落后”为理由，展延选举。

“东姑也批评外国通讯记者的报道，因为这些报道据说是言过其实的。他说，他们能为大马所作出的最佳服务，就是跑回老家去… 昨晚敦拉萨也向外国通讯记者作了新闻发布会。他向他们交代清楚，他们的自由行动将继续受到限制…

“今天，一些本地报章已重新出版了。

“昨晚，陈修信宣布食物供应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安排以批发方式供应食物给商店。”<sup>21</sup>

《海峡时报》“挺身而出”为紧急状态辩护，称之为“人民自己的紧急状态”！

“颁布紧急状态的目的，是为了从速恢复所失去的一切。没有其它目的。没有其它企图。这是人民自己的紧急状态：只有在人民帮助下，政府才能结束它… 大马不应该害怕“紧急状态”。它不是这个国家人民生活的新因素。”<sup>22</sup>

的确，紧急状态不是国家人民生活的新因素。过后所发生的事件表明，这不是“人民自己的紧急状态”，而是新兴官僚资本家自己的紧急状态。时至今日，紧急状态都还没废除。

### 5月19日：拉萨完全掌控国家政权

暴乱事件发生后不到一星期，统治国家的权力实际上已转移到当时的副首相拉萨手中。这显示，发动政变是早有阴谋的。

到了5月19日，星期一，避难者问题严重的程度，可以从下面的报道看得出来。本地报章在受审查后准予出版；外国通讯记者的戒严通行证被收回；一些反对党政治人物被逮捕。仍然

有人对东姑日渐式微的权力，进行预测：

“据报道，有大约1万名避难者。本地报章暂停出版，后来又准予恢复出版，不过得受到审查。外国通讯记者的戒严通行证被令收回，他们被指责报道有所偏袒。有证据表明，军人在执行戒严令时，带有歧视的态度偏袒马来人。据说，有些反对党领袖也被逮捕。

“敦拉萨和东姑两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则不清楚。在公开场合，敦拉萨说，他向东姑负责。但是，私下他交代清楚，这个国家已完全由他控制。这可能意味着，东姑已正式开始经历失去实权首相的过程了。”<sup>23</sup>

### 5月20日：反对党不得扮演任何角色

政府强调，我国迫切需要亲善和睦与民族团结。果真如此，人们都期望政府，能要求反对党领袖，一同联手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和互相合作。

下面的报道显示：5月20日，在加查里·沙菲的跟前，澳洲最高专员和敦拉萨进行了一场饶有兴趣的互相交流。这也透露了一个事实：当时，外国外交官仍然可以自由向大马领袖们提出意见。前者建议，应让反对党领袖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然而，拉萨和加查里不接受这项建议：

“5月20日，澳洲最高专员和敦拉萨的谈话摘要：

加查里在场。伊斯曼（Eastman）指出，政府发言人企图把明显是种族冲突事件，说成是共产党暴力革命，但几乎各国首府都不相信。其结果是，大马很可能失去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信任和同情。”

“伊斯曼建议，应发表谨慎和全面的声明，才能从符合现实与平实的视角，呈现整个情况。拉萨和加查里表示有意接受这个说法。但是，他们不作出准备发表声明的承诺。伊斯曼建议，让反对党领袖呼吁其支持

者保持冷静和克制。但是，拉萨和加查里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反对党会特地利用这个机会，宣扬他们的政治观点。”<sup>24</sup>

1969年5月20日，种族暴乱的避难者的处境，可以从大马红十字会发布的新闻，得知一二：

“大马红十字会，联同社会福利当局、市议会官员、民防部队人员和其它自愿团体等，继续推行他们供养避难者的计划，地点在：独立广场、维多利亚学院、邵路、精武体育馆等地。

“疏散中心，除了继续供养避难者以外，还让5千多人领取食物供应。”<sup>25</sup>

### 5月21日：官方对伤亡人数的估计

众所周知，从解密的文件来看，真实的伤亡人数，比起官方的数据要高得多。即使官方资料也显示，非马来人的伤亡人数占多数。

5月21日，吉隆坡、瑞天咸港、新加坡有限度地恢复了铁路客车服务；新马航空公司恢复正常操作，但国际班机仍然飞越西马。官方的伤亡人数统计数字如下：

“137人死亡—18名是马来人

342人受伤

109部车辆被焚烧

118栋建筑物被毁坏

2,912人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触犯戒严令者”<sup>26</sup>

### 5月22日：新的《新闻审查条例》

1969年颁布的紧急状态是1948-1960年共产党起义发生后

的第二个紧急状态。在这次紧急状态中，刚独立的我国，作了匆忙草率的政治安排。1969年，政变使国会中止活动，同时也带来了严厉的新闻审查条例。这些条例确保条例得以遵守。

《海峡时报》报道说，昨夜大马政府颁布的新闻审查条例，涉及新闻报道、评论、出版事业和邮政服务。在《1969年紧急（主要权力）法令》下通过的这项条例，是由国家行动理事会主席敦拉萨所签署的。不遵守这项新条例的人士，可罚款一万元，或监禁3个月，或两者兼施。<sup>27</sup>

大马广播电台报道说，在昨天国家行动理事会的会议中，敦拉萨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以研究如何重组政府新闻部和大众媒体。委员会的成员是：敦山班丹、寒沙·阿布·沙马、许启谟、和丹斯里·加查里·沙菲。<sup>28</sup>

缺乏食物和疏散中心的情况如下：

“红十字会仍继续为家庭提供所需要的饭盒。所涉及的地区如下：怡保、秋杰路、峇都路、洗都、巴生路（第1到第10碑）、甘榜峇鲁、文良港、吉冷结、热水湖、甘榜班丹、增江、十五碑、蕉赖路、斑苔谷及其它偏僻地区。今天，分发了饭盒给1,436家，合计约7,500个居民。每天仍提供食物给5个疏散中心，而今天约4,500名被疏散者接收了饮料和其它副食品。”<sup>29</sup>

### 5月23日：动辄开枪的皇家马来军团

解密文件揭露，马来军队不但和马来暴徒称兄道弟，而且还在他们穿过城市时，随意向华人店屋开枪扫射。

5月23日，另一名外国记者，即：伦敦《每日邮报》的伊安·华特（Ian Ward）所提供的报告，特别强调，军队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和靠政令施政的马来统治。这项报告指出：

“政府初步阶段的镇压，造成了华人公然被歧视，结果产生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戒严。在华人区，人们因恐

惧而躲在家里，因为皇家马来军团的马来士兵动辄开枪，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走来走去，间发性地向一些住家开枪。在甘榜，情况则完全不同，马来士兵和持有武器的马来暴徒有说有笑。

“随着时间的过去，座落在首都马来区边缘的华人商店，在熊熊大火中被烧毁。同时，华人的车辆被火焚烧，原为马来军队所保护的建筑物，却遭到洗劫。

“反对党领袖请求保安当局，把皇家马来军团撤出华人区，转由后备队取代。那是因为，后备队比较具有多元民族的特征。华裔反对党领袖要求上电视讲话，以缓和公众的恐惧心理，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

“当副首相面对外国通讯记者所提出的、关于种族歧视的报道时，他矢口否认。接着，发给外国通讯记者的戒严通行证被收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们被令留在屋内，不可外出。”<sup>30</sup>

### 马来同胞也不齿流氓行为

1969年的暴乱，是搞政变的政客所指使的马来暴徒们的杰作。这暴力事件，并非官方历史所力图描绘地那样，自发地在“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发生的。在同一份报告中，伊安·华特报道说，这些马来流氓的行径，甘榜峇鲁奉公守法的马来人也看不顺眼。伊安·华特也说得很明白：以拉萨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利用紧急状态，建立了实质上的马来统治。还有，中止东马选举，则被视为掌握绝对控制权的举措：

“到了周末，暴动者的声势已逐渐消失，只剩下甘榜峇鲁区一股马来极端分子，自称为“阿拉突击队”，设立了他们的总部。在那里，这些极端分子甚至威吓自己的马来同胞。这个时候，马来同胞已公开敌视这些流氓。

“然而，就像华人所担心的那样，在紧急状态下，国家行动理事会通过政令施政，建立了马来统治。国家行动理事会以副首相敦拉萨为首，他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最高统帅。

“沙巴和砂拉越那边厢的大选被中止，其结果是，整个民主程序被冻结了。这个举措毫无疑问产生了强烈的反政府情绪……这一切显示，统治集团决心掌握绝对控制权。”<sup>31</sup>

在这个时期，新政权已经考虑到要修改《内安法令》，方便他们进行无审讯扣留，尽管扣留者没涉及共产党活动：

“内政部长敦伊斯迈医生今天表示，将修改《内安法令》，以‘反击时常变化的共产党策略’。他透露，被逮捕的3,699人中，有952人是私会党徒。他也宣布了世界银行给予大马教育的贷款。这项8百80万的贷款是为了实施“技职教育”，为期25年。贷款有10年宽限期，利率为6.5%。”<sup>32</sup>

### 5月24日：政府拒不承认

5月24日，吉隆坡已恢复法律与秩序。市区内气氛已有所改善。人们已（在非戒严期间）返回工作岗位。政府部门也准备进行正常操作。戒严令还在实施（戒严时间：从下午3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可是，政府还是不承认，是那些持有武器的马来青年，在制造骚乱：

“政府指责共产党应负引起骚乱的责任。不过，所发表的声明，变得较为理智些。可是，这些声明只能起负面作用，而不能起积极作用。没有迹象显示：政府愿意公开承认，所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是种族问题，而骚乱事件是由有武器配备的马来人所引起的。

“被逮捕的人数将近4000人，其中看来一半以上是‘散播谣言者，和触犯戒严令者’。”<sup>33</sup>

### 5月27日：东姑被迫辞职

1969年的政变，不像其它国家那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行。然而，从掌握实权的意义来说，东姑不得不接受这个对他不利的新形势。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暴动事件爆发后的两个星期，受害者避难的情况仍然严重：

“4个疏散中心（即：默迪卡体育馆，维多利亚学院，邵路学校，和精武体育馆）每天都在供养约3千名疏散者。”<sup>34</sup>

5月27日，对东姑日渐式微的地位，外国记者所进行的猜测，显然触怒了东姑。他命令他的私人秘书，写了一份抗议书给英国最高专员：

“首相署致给达夫先生的信

日期：1969年5月27日

“我和首相已阅读了5月16日《每日邮报》外国通讯记者伊安·华特的一份报道，题为《暴力事件震撼大马东姑宣布紧急状态》。

在此，我要引述其中一段令人不悦的文字：‘在东姑发表广播谈话以前，西方外交官认为，政府圈内正增加施压要他辞职。东姑似乎必须最迟在这周末，设法营造一个无暴乱事件的局势，不然，他得面对指控，说已脱离了政治现实。’

“可以理解，一名记者有权为读者报道事态的发展。但是，就像现在一样，制造故事，令人从负面角度看待他人，那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我能获知他如何获取这类资讯，我将不胜欣慰。它对政府公务员所起的效应，令人感到烦恼。有鉴于此，我被授意把这件事转告于你。”<sup>35</sup>

英国人的反应是典型的沉着，不动声色。他们的回应是：

“我也不知道华特先生如何会想出这份不正确的资讯。既然他引述“西方外交官”的言谈，或许我应该说，我从来没见过华特先生，他也不曾和我联络过。我向我的职员询问过，显然，仅仅根据他最近两个半星期的一两次到访，或摇电话给这最高专员署，他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报道的。”<sup>36</sup>

### 种族歧视现象——英国侨民投诉

有关档案记录透露，英国侨民对暴乱具有种族性，以及保安队伍表现偏袒一方，表示极端反感。在伦敦国家档案局的文件中，有英国国会议员在国会提出的询问，因为他们非常希望，能解答他们选区选民所提出的关于种族歧视的投诉。

“塔格夫人 (Mrs April Thacker) 致给国会议员，麦尔康 (Malcolm Stoddart-Scott) 的信

日期：1969年5月24日

“我本人知道，有位华人商店老板，在枪尖下被迫打开店门，让4名武装（马来）警察进入店里，取去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但没付钱就离开。有一天晚上，我们本身曾让15名华裔农民，在我们的车房避过风险，因为有几帮马来人，到处放火焚烧华人财产，并且用马来巴冷刀砍人。”

“曾与新马航空公司主席杨邦孝交谈。杨氏说，当天，有人把吉隆坡范围内被毁坏房屋的官方记录，交给他看。被烧毁的房屋总数是678间，远远超过已发表过的任何数字。”<sup>37</sup>

### 5月28日：力图为掌握专制权力辩解

这是1969年5月28日，英国最高专员署发给“外国与英联邦办事处”的一份机密报告。报告书提供了大马国内骚乱事件的概述，谈到东马与西马人士在肇事现场的感受。它确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这份报告书所作的观察深入。政府力图把骚乱事件归罪于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为他们刚刚获取的专制权力辩解：

“目前还不能肯定，5月13日傍晚反示威游行的进展程度。这次反示威游行是巫统某些领导人所组织的。但是，我们所得知的是，他们已取得了当晚举行胜利游行的警方准证。有证据显示，当天，有一群群的马来人从相当遥远的地区，赶到吉隆坡来，其中一些人还持有武器。白天，紧张局势在加剧。一到了傍晚，就爆发了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到了第二天黎明，市中心与围绕在吉隆坡以北和东边的甘榜，死了许多人。好多房屋和车辆被烧毁。

“官方所发表的伤亡人数是173和337人。据说，有116辆车被捣毁，约200间房屋被烧毁，有5,000个避难者和无家可归者。目前，所公开的被逮捕人数是5,680人，其中半数以上是触犯戒严令者和造谣者。许多人相信，但没有人承认，刚刚中选的国会议员和其它政治人物也被逮捕了。所有的数据肯定是低估了。逮捕行动还在进行中。

“军队和警察之间肯定存在着忌妒现象。在处理骚乱的许多事件中，前者认为后者手段不够狠。许多可靠的报告显示，发生了个别马来军人和警方人员对华人采取种族歧视态度的事件。

“把骚乱事件一味归罪于共产党恐怖分子，使当权者掌握专制权力显得更加合理化。但是，这也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骚乱事件基本上是种族



冲突。更甚的是，政府在掩盖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在这个问题上，马来人是主要的挑衅者。当局并没提供种族分类的伤亡人数。不过，从我们在医院和其它地方联系所得的信息，显而易见，华人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马来人的死亡人数，两者之间的比率高达85对15。

“巫统领袖也不愿意承认，民政党对稳定局势所作出的、意义深长的贡献：在霹雳和雪兰莪两州，民政党拒绝和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进步党组成反对党政府。

“虽说问题集中发生在首都，但这并不意味着，联邦当局和各州之间的关系不会产生困难。突出的例子是：联邦当局和新成立的吉兰丹州泛马回教党政府相处，可能会有困难。这个州的情况，不能纯粹视为个别地区已发生了马来极端种族情绪。它实际上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有利于亲马来政策的发展根基。

“檳城将是另一个难题。民政党从联盟手中夺过了州政权。迄今为止，新的首席部长，林苍佑医生，明显地和联盟进行合作。”<sup>38</sup>

### 吉隆坡的直接统治引起东马不满情绪

同一份报告书也指出，吉隆坡所实施的直接统治，加深了东马华人和原住民的不满情绪：

“东马两州在暴乱期间，保持平静。长远来说，华人和卡达山族推翻敦慕斯达化独裁统治的愿望，受到鼓励。

“在砂拉越，如果竞选得以继续举行，两个反对党看来有良好的远景。吉隆坡所实施的直接统治，不但将进一步加深华裔族群的不满情绪，而且将恶化普遍存在的种族问题。这类直接统治，除非小心翼翼地实

施，不然，假以时日，它也可能会导致伊班原住民疏远而去。

“政府的官方传单仍然强调，某些地区的紧张局势还存在。尤其是5月31日傍晚，在瓜拉古楼、吉辇县、以及在霹雳北部特地实施了24小时戒严令。

“至于吉隆坡，紧张局势继续存在的程度大小，究竟是戒严令继续存在的‘因’，还是戒严令所产生的‘果’，这点令人感到有些不肯定。政府利用白天戒严的时间，进行搜查和扫荡行动。一方面，政府在进行这类严厉措施；另一方面政府则强调民族和谐正在恢复中、大气候令人放心等说法。如果要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那将引起相当大的心理问题。

“政府继续实施戒严令，也肯定将在经济领域制造困难。这么一来，委实很难平息华人对他们经济生活遭受中断的怨恨。”<sup>39</sup>

### 对投资者信心不利

外国资本对大马1969年的暴乱事件所持有的态度，暴露了他们采取的是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表示不同意对华人采取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态度；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选择“照常营业”，而不是对犯罪的政权施以制裁。

因此，尽管外国记者所作的一切客观报道，1969年5月25-31日《远东经济评论》的社论，所关心的是投资者的信心，以及我国作为资本获取丰厚利润的安全区的形象，而不是关心专制统治的实施与种族歧视的现象：

“委任马华公会成员为内阁成员，是一项重大妥协，以便给政府一个喘息的空间。虽然，马华在大选中败北后，迫不得已放弃作为华人社群喉舌的角色，但是，陈修信等人被纳入内阁，能暂时减缓华人对马来

人独霸政权的恐惧心理。

“可是，妥协只是一种暂时的措施；长远来说，联盟政府必须解决合理关注所有种族社群的要求，同时，避免基本上华基反对党和一个马来政府之间的对抗的危机。为了取得喘息的空间，在一段紧急状态时期，政府不得不继续进行不以国会为根基的统治。

“以政令治国的专制统治，不是一劳永逸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案。联盟必须和反对党达致妥协。当时，大部分反对党领袖看来更热中于进行合作，以调和种族关系，而不想给联盟政府制造极端困难。

“可是，如果当局不公开表示有决心，从压制暴力转而致力于恢复国家的民族和谐，那么，所出现的危机不只将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前途。

“初期，暴乱事件对国家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尽管私人财产遭受破坏。大马中央银行拥有必要的、足够的武器，来应付严重的资金外流。但是，政府无法以政令或军法应付的唯一危机就是：对商业信心所构成的威胁。

“暴乱事件产生了一个未知数，这是潜在的投资者，在估计他们在大马的前途中，所必须考虑在内的因素。但是，即使大马已掀起了种族仇恨的浪潮，比起亚洲其它国家来，大马仍然是一个受欢迎的经济体系，可提供另一轮的投资。

“然而，如果种族仇恨可能成为大马生活的永久特征，投资者必然会感到惶恐。在一场种族拉锯战中，主要的华人商业界的巨头将岌岌可危。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善于利用有才能的企业家，很少投资者会鲁莽到把他们的金钱投入这发展中国家。

“这种焦虑并不只局限于外国商家。如果大马华人的前景看来是暗淡的话，他们也不愿意把他们的基金紧锁在新的发展工程上。

“幸好，这个危机还没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大马以往的记录显示，在处理种族问题上，它采取了合理妥协的态度，同时也采取了合理的财政和商业政策。这点值得赞扬。

“不过，除非在短期内，浓厚的种族氛围能显著降温，不然，这个国家的形象（即：能为资本赚取丰厚利润的优良安全区的形象）将迅速消失。吉隆坡是不能忽略经济这个问题的：万一农业或工业领域严重衰退的话，互相仇恨和互相指责将会发展到无法忍受的程度。”<sup>40</sup>

### 新加坡政府采取行动遏止骚乱

在吉隆坡发生的1969年暴乱，显然影响了近邻的新加坡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情绪。新加坡当局当机立断，即刻处理了这个问题：警察进行扫荡，移民厅加紧管制，并冷静、沉着地对待一切：

“新加坡讯：自从星期六晚上，正式发生华人和马来人冲突事件过后，政府采取了预期的迅速行动。到了周末，共逮捕或扣留了700多人。根据官方报道，4人死亡，另41人住进医院。这个数字可能更大，但差不了多少。在骚乱期间，政府在处理新闻报道方面，非常严谨，采用最简朴的文字，确认24小时内发生的事件真相。外国通讯记者在发生骚乱地区所作的独立观察，都无法损害到政府的可信度。

“自从华马两族暴乱在吉隆坡造成巨大破坏，并造成大马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后，新加坡就做好准备，应对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即：暴乱越过新

马长堤所产生的回响。

“新马两地之间的联系不仅限于那座长堤而已，许多家庭都分散居住在两国，友谊、商业活动、以及在这次种族骚乱中最重要的电话线，也分跨两国。

“吉隆坡大选后的暴乱，始自5月13日起，导致至少200人死亡。它严重地影响了世界这一角落的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层关系一路来就不稳定。在大马被杀害的，大多数是华裔公民。这个事实很快就传遍新加坡。华裔在新加坡，占了约人口的75%。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新加坡华人想通过暴力，寻求机会报私仇，那是不会令人感到惊奇的。这动乱的局面正好迎合了私会党、罪犯集团、流氓、不良分子、更不用提左派煽动者了。毫无疑问，左派煽动者正在利用这个非他们所制造的情况（但也不是他们所乐意看到的情况）。华人私会党组织，原本的目的之一，毕竟是防身自卫。”<sup>41</sup>

### 保安队伍内部种族比例平衡——至关重要

吉隆坡发生暴乱的新闻一传开后，新加坡也发生了几宗因种族问题而引发的事件。但是，那里的政府得以控制局势。在新加坡保安队伍中，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欧亚混种人之间的种族比例平衡，在说服新加坡人不偏袒地执行法律，显得至为重要：

“吉隆坡暴乱一开始，新加坡警察就全面戒备。自此以后，他们都保持着这个状态。他们还局部动员军人给予支援。吉隆坡暴力事件一发生，就有几宗事件爆发。这些可能是因种族问题而引发的事件，其中包括一名马来摩哆骑士被一个华人流氓集团所枪杀。不过，真正的冲突则由5月31日开始。

“两国之间的电话系统一直在超时工作，而谣言则以闪电般的速度和几何积数传开去，真是到了满天飞的境地。吉隆坡马来暴徒屠杀华裔学童的谣言，在新加坡到处流传。三个星期前，一名大马吉隆坡新闻部的司机，提醒一名外国通讯记者，不要走近联邦酒店（即：这名外国通讯记者下榻的酒店），因为“华族避难者从二楼窗口打冷枪”。

“新加坡政府完全相信，每天一次宣布官方新闻，有助于预防恐慌和平息那里的紧张局势。但是，有人认为，官方这么简短的宣布，将让人有机可乘，可大事传播煽动性的谣言，因此，无助于减缓紧张气氛和种族仇恨。

“尽管谣言满天飞，上个星期，政府得以阻止暴乱事件发生。进行大事宣传的警方，在闪电扫荡中，逮捕了一批潜在的制造麻烦者，其中包括数目不详的大马华人和马来人。这些人无法满意地解释，为何他们当时身在新加坡。其中一些非法偷渡进入新加坡，而另一些则身怀武器。官方证实：只有4人死亡，一些暴力事件受到控制。对许多独立的观察者来说，这一切完全证明，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政府政策，对阻止重演吉隆坡的悲剧，至少是有效的。

“最重要的是，在新加坡保安部队中，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欧亚混种人官员，看来有公平的种族比例平衡。这似乎令新加坡公民折服，保安部队将不论种族出身，毫无偏袒地执行法律……

“虽说，有些马来家庭，到皇家空军实里达军事基地避难，但是，证据表明，新加坡马来公民不会怀疑政府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决心，使他们不受华人的报复，不论这些华人来自何方。（马来家庭到实里达英国军事基地避难，可为难了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只想同情他们自己的本地员工，而不想被指责在偏袒任何一

方。)

“仅仅在一天内，政府宣布：已逮捕了53名华人和38名马来人——为了把这一点交代得一清二楚，一名外交官说：‘任何华人如果在此时此地对谋杀马来人得负起责任，政府将毫不迟疑地吊死他。’

“对政府来说，那是不容易办到的事。不过，为了建立起他们对种族问题的绝对不偏袒的清誉，他们会这么做。

“对外而言，新马关系是正常的。但是，最近几个星期，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亲密。上星期，两国政府互相交换了措词严厉的外交照会，因为有一名大马人投诉，新加坡坚持，有些华人到共和国来制造麻烦。新加坡方面则宣称，他们从来没直接指出，制造麻烦者来自于大马。这就是他们给吉隆坡回信的内容。长堤两岸实施了严格的移民管制。两国的一些公民被令原路返回。”<sup>42</sup>

## 大马军事接管政权——新加坡的看法

尽管有些人在否认1969年5月事件是一场政变，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看得出，这是一项军事接管的行动。李总理对一个军事政权推翻民主政府，表示关注。显然，他指的是大马国会民主的死亡。这点可以从下面的通讯记者的报道看出来：

“总理李光耀，最近在发表公开评论时，一直明显表现低调。上星期四晚上，他向新加坡大学学生发表了重要和直率的演讲。他对大马的种族骚乱突然爆发，承认表示惊讶。

“他说：‘过去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把时间像六角手风琴一样被挤压了。’他还说，他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事态，现在竟然会发生。总的来说，新加坡总理对

大马恢复正常的展望，是不乐观的。

“他花了一段时间，长谈世界各国军人政权的性质，并指出，一旦民主政府被推翻或罢黜，它将不再恢复。这看来显然是指大马目前中止国会民主一事，因为国家正在紧急状态下以政令施政。

“对大马军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角色，表示关注这一点，李氏并不是唯一的人士。他还特地提起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军人政府。在好几个观察家眼中看来，他向学生作出这样的谈话，似乎是对大马正在发生的事表示认命了。

“新加坡和吉隆坡政府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合，而暴乱后大马所追随的政策，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歧见。尽管如此，新加坡高级官员理解到，他们必须和大马达致妥协。新加坡显然希望，和英国、澳洲、纽西兰、和美国通力合作，大马政府能受到影响，而采取政策修补大马国内种族严重分离的现象。”<sup>43</sup>

## 1969年6月：零星突发的暴力事件

到了1969年6月，暴乱被控制了。6月10日，在和马新社所作的访谈中，敦拉萨谈到当前局势的方方面面：

“（一）局势正逐渐恢复正常。一时还无法肯定，紧急状态将延续多久。在一段时间内，肯定有必要实施夜间戒严。

（二）政府将“倾全力”促进各民族间的亲善和睦。

（三）政府也将把制造麻烦者绳之以法。那些非公民将遣送回国。如果有足够证据的话，公民则将被剥夺公民权。”<sup>44</sup>

尽管如此，民间仍然有零星突发的骚乱事件发生：

“1969年6月28日，下午5时55分，吉隆坡秋杰路，两人酒后殴斗。这就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严重的骚乱有一触即发之势。

“散播谣言者和不负责任者利用了这个局势。6时40分，在拉惹慕打路，有人被一群流氓攻击。受害人受伤，被送入中央医院。接着，洗都巴刹一间房屋遭不知名人士放火焚烧。

“晚上8时25分，一名男士严重受伤。后来，他在医院去世。有人报火警，负责洗都区的警察前往洗都巴刹，发觉到一大群人在殴斗。警察向空开枪驱散人群，众人立刻作鸟兽散。在现场，警方发现两名死者，4人受伤。

“与此同时，在洗都巴刹内地，有一排住家被人纵火焚烧。有人召来一辆救火车进行灭火抢救工作。纵火现场附近，有些受伤者。他们过后被送往医院，其中两人死亡，其余的则住院养伤。

“洗都事件发生的同时，在这地区边缘，甘榜拿督克拉末附近，有两栋房屋遭不知名人士放火焚烧。”<sup>45</sup>

下面是1969年6月尾，英国最高专员署所作的一份关于当时局势的机密报告：

“5月流血事件发生过后，被逮捕的约7500人中，大约有900人还在受调查。逮捕行动还在进行……根据判断，被逮捕的大多数是华人，虽说目前有迹象显示，政府也正把注意力转向马来人和印度人……”

6月28/29日晚，吉隆坡的某个部分又发生了暴乱。一些房屋被焚毁。根据官方报道，伤亡人数是5人死亡，25人受伤。

“6月30日-7月1日晚间，马六甲也发生类似的暴乱事件。4人被杀害。

“东马情况——一般而言，情况已受到控制，虽说在6月初，古晋有三起纵火事件发生。起初，这些事件都归罪于持不同政见的华人或共产党。不过，现在本地警察认为，那是马来人干的。如果紧急状态不合理地加以延长，又只因西马的罪过（人们都这么认为）而使沙巴和砂拉越遭到池鱼之殃，这两州的分离主义倾向将加剧，因而使到保安局势更加复杂化。”<sup>46</sup>

### 针对印裔的骚乱事件

虽说暴徒（这些暴徒是搞政变者怂恿出来闹事的）对付的主要对象是华裔，但是，到了1969年6月近尾声时，有些骚乱事件确实是针对印裔的：

“6月28日到30日之间，又有暴乱事件再次发生，吉隆坡和马六甲有更多伤亡人数。它表明，政府普遍不受信任。没有人相信官方的数据，即：吉隆坡只死了5人，而马六甲死了4人。

“直接产生的结果是，公众对保安措施的信心，遭受严重挫折。到了傍晚，街道是冷清清的，虽然，到了傍晚时分，当局不想在吉隆坡地区，再次实施戒严。直接受戒严令影响的地区则另当别论。

“显得重要但又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两州，印度社区是被对付的主要对象。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事件究竟是由罪犯集团还是由共产党所挑起的，进而蓄意把印度人牵涉在内。但是，最终结果是，印度人被迫更紧密地和华人结合在一起，以对付马来人。

“在西海岸的5个州，解除戒严时间，延长到6月21日午夜，6月29日则延长到清晨1点。泰国边界的霹雳地区，照旧实施24小时戒严令，那是为了方便进行保安扫荡行动。”<sup>47</sup>

大马印度人遭受种族主义祸害事件，有日愈增加之势。其中最严重的是2001年发生在雪兰莪，甘榜美丹的“3月8日事件”。在这事件中，5名印裔大马公民和1名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其它100多人受到严重伤害。<sup>48</sup>

### 1969年7月：保安部队扮演其正当角色

上面已强调过，大马保安队伍在1948-1960年间，对付共产党起义的战争中，是经过锻炼和考验的。其实，大马的政治部和保安队伍早已赢得了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队伍之一的声誉。因此，如果保安队伍和1969年发动政变者之间不是同谋，那么，进行种族屠杀的暴徒们，是可以被阻止和即刻被逮捕的。

在1969年7月初发生的最后几宗事件中，警方采取了人们对他们所期望的行动（在5月间，他们就应该这么做）：

“昨晚，吉隆坡又再发生骚乱，一名警察被杀害。不过，骚乱很快就被平息，不再蔓延。警方采取了积极行动。这是许多观察家所期望的。但是，5月13和14日，没见过这类积极行动。

“上星期的最后几天，吉隆坡谣言满天飞，指华人采取报复行动，或者，指马来人又再出击。昨天傍晚，一名来自沙巴的马来便衣警察在秋杰（Chow Kit）华人区被刺杀身亡。秋杰区就是早些时候发生5月暴乱的主要地点。

“不久，那地区无限期实施戒严。警察逐户进行保安扫荡。昨晚，约有300名年轻华人，从他们住家被带到警察局受盘问。其中49人被逮捕，其它人大部分都获释返家。

“今天，戒严令继续在这地区实施，镇暴队再次进行扫荡。20人被捕。多架直升机在秋杰区，和附近的甘榜峇鲁马来区上空盘旋，进行视察巡逻。在檳城和新

加坡，这类扫荡行动是警方长期活动的特征之一。可信赖的观察家指出，如果以往都进行这类扫荡行动的话，情况早就得以改善了。

“除了一两宗小的纵火事件以外，昨晚没发生其它事件或暴乱。不过，局势仍然紧张。杀害警员的事件，丝毫也无法抑制种族情绪。”<sup>49</sup>

敦依斯迈的坚定立场，和东姑宣布成立由各政党领导人所组成的“国家亲善委员会”，多少消减了人们的恐惧心理：

“与此同时，昨晚，内政与国安部长敦依斯迈，在电台和电视广播节目中，作了具有说服力的谈话。他一而再强调，他已下令保安队伍采取坚决行动“毫不偏袒或歧视”任何族群。敦依斯迈透露，上周末进行最新逮捕行动过后，自5月以来，总逮捕人数是8,114人，其中包括“来自我国各大族群”的人士。”

“其中4,192人被控上法庭，675人被保释，1,552人无条件释放，另1,695人遭到预防性扣留。

敦依斯迈改变了政府对5月暴乱所提出的解释。他把“513事件”的发生，基本上归罪于种族性竞选活动的结果。

“‘暴乱事件的爆发是自发性的，大家都感到措手不及’。不过，最近发生的事件，是社会不良分子所预谋的行为，是可以‘坚决地加以镇压’的。

“敦依斯迈的坚定立场，加上东姑表明，“国家亲善委员会”将包含各政党领导人，这些举措都是受到政治观察家所欢迎的。6月初，东姑刚动过手术，正在康复中。他表示，他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作全国亲善之旅。”<sup>50</sup>

到了1969年7月，西马局势已大幅度改善了。不过，国内还有一些地方，局势仍然紧张：

“西马情况——局势已改善，没有重大事件发生。雪兰莪、霹雳、马六甲等敏感地区，局势仍然紧张。

“吉隆坡华裔商人继续杯葛马来农民的产品，这一点令人关注。在国内其它地区，有某社群杯葛其它社群活动的迹象。

“各地戒严时间如下：

丁加奴、彭亨、柔佛：没有戒严

其它州：凌晨1点到5点。

檳城：凌晨1点到4点

洗都巴刹：傍晚6点到早上6点

宜力和高乌：晚上9点到早上6点

其它森林地带：24小时戒严”<sup>51</sup>

## 巫统开除马哈迪

东姑退出政治舞台，行动进展缓慢。巫统党内开始营造新一轮的紧张气氛。这导致其中一个主要角色，马哈迪医生，被开除出党。这又导致马来中产阶级内部一阵骚动。中产阶级是发动政变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它显示，大马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所谓“种族冲突”源自于巫统党内的统治阶级斗争：

“马来西亚内政——大选后发生国内骚乱

“紧张局势已开始缓解，直到上个周末。但是，由于东姑恢复其势力地位，马哈迪于7月12日，被开除出巫统中央理事会，这就引发了马来人的骚动，使情势又紧张起来。

“马来大学生在大学校园内请愿示威，要东姑辞职。大学里的马来讲师协助散发许多传单。这使到

甘榜峇鲁又紧张起来。甘榜峇鲁是吉隆坡马来保留地。“513骚乱事件”就是由这里开始的。马来人的受挫感，可能再次引起各种族之间的骚动。

“不过，当局已意识到这个风险，所以，自从上周末开始，已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这应足以控制任何制造动乱的企图。”<sup>52</sup>

## 结语

伦敦国家档案记录无可置疑地表明，1969年5月的暴乱，是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的。暴乱事件成了方便新政权宣布紧急状态、进行政权更替的借口。保安部队行动缺乏专业水准，行事不公正，任由暴徒们四处滥杀华人。

这些文件也表明，当时的副首相拉萨从暴乱事件一开始发生，就完全掌控了大权。在实施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他实现了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的议程，即：主导1969年后大马的政治和经济。在这计划中，他们获得了警察和军队的全力支持。

## 参考资料

- 1 Bob Reece, "MALAYSIA: Requiem for Democra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21, 18/24.5.1969, p.437.
- 2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491, 15.5.1969.
- 3 Despatch by Shortliffe, REF OURTEL 681, 14.5.1969.
- 4 FCO Telegram, No. 483, 14.5.1969.
- 5 S. A. Budd,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17.6.1969.
- 6 Bob Reece, "MALAYSIA: Requiem for Democra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21, 18/24.5.1969, p.437.
- 7 D. F. B. Le Breton,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KL to Mr. W.A. Ward, SW Pacific Dept, 22.6.1969.

- 8 J. G. McMinnies,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t, FCO, 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 Dept: South-West Pacific, File No: FWM1/9 (Part C, "Malaysia – Civil Disturbances following General Election) FCO 24/486/1".
- 9 Mr Kennedy, FCO Telegram, No. 74, From Kuching to FCO, 24.6.1969.
- 10 Bob Reece, "MALAYSIA: Requiem for Democra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21, 18/24.5.1969, p.437.
- 11 Mrs. D. K. K. Lee, Setia Usaha Kebangsaan, MRC Society, Press Release 15.5.1969.
- 12 FCO Telegram, No. 436, 16.5.1969.
- 13 Mr. Freeman, FCO Telegram, No. 498, 16.5.1969.
- 14 FCO Telegram, No. 501, 16.5.1969.
- 15 Bob Reece, "MALAYSIA: Requiem for Democra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21, 18/24.5.1969, p.437.
- 16 FCO Telegram, No. 504, 17.5.1969.
- 17 Sir A. de la Mare, FCO Telegram, No. 442, 17.5.1969.
- 18 Confidential to FCO, 17.5.1969.
- 19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511, 17.5.1969.
- 20 K. Das为撰写东姑传记而专访东姑。当时,他正要走访东姑,询问东姑关于“513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很不幸地,他还没来得及有这么个机会,东姑就过早去世了。见Kua Kia Soong (ed.), *K. Das & The Tunku Tapes*, Petaling Jaya: SIRD, 2002。
- 21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513, 18.5.1969.
- 22 *Sunday Times* editorial, 18.5.1969.
- 23 Despatch by D. P. Aiers, SW Pacific Dept., 19.5.1969.
- 24 Mr. Duff, Confidential FWM 1/9, 22.5.1969.
- 25 大马红十字会副主席Tunku Tan Sri Mohd bin Tunku Besar Burhanuddin发表的新闻稿, 20.5.1969。
- 26 TLM / SEASEC 14 秘件 “Malaysian Disturbances” (大马骚乱), 21.5.1969.
- 27 *Straits Times*, 22.5.1969.
- 28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549, 22.5.1969.
- 29 Mrs. D. K. K. Lee, MRC Press Release, 22.5.1969.
- 30 Ian Ward, "Malaysia's Veils Fall Away", *Daily Telegraph*, 23.5.1969.
- 31 同上。
- 32 *Financial Times*, 23.5.1969.
- 33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574, 24.5.1969.

- 34 Mrs. D. K. K. Lee, MRC Press release, 27.5.1969.
- 35 首相第一私人秘书Nik Hassan bin Abdul Rahman。
- 36 A. A. Duff, FCO 24/485/1.
- 37 Memo by R. D. Clift, 27.5.1969, "Malaysia: Internal Situation – Civil Disturbances following General Elections" (大马国内局势——大选后的国内骚乱), FCO 24/485/1.
- 38 Confidential, A. A. Duff, Acting High Commissioner, 28.5.1969, Confidential to FCO, 2.6.1969, "Malaysia: Internal Situation – Civil Disturbances following General Elections" (大马国内局势——大选后的国内骚乱), FCO 24/485/1, SECRET FCO, Dept. of South-West Pacific File No. FW M 1/9 (Part B).
- 39 同上。
- 40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Editorial, Vol. 64, No. 22, 25/31.5.1969, p.479.
- 41 Anthony Polsky, "Singapore-Malaysia: Hot Cross Lin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24, 8/14.6.1969, p.597.
- 42 同上。
- 43 A. L. Southorn, SW Pacific Dept., Interview by Tun Razak,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11.6.1969.
- 44 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SIARAN AKHBAR, 29.6.69, PEN 6/69/400.
- 45 W/210, 保密, "Note on the Background Situation in Malaysia" (札记——关于大马局势的背景)。
- 46 Telegram No. 14, 4.7.1969.
- 47 *Financial Times*, 6.7.1969.
- 48 见K. Arumugam, March 8, Kuala Lumpur: Separuthi Publications Sdn. Bhd., 2006。
- 49 *Financial Times*, 6.7.1969.
- 50 同上。
- 51 秘件14.7.1969备忘录。
- 52 Mr. Duff, FCO 24/487 SECRET File No. FWM 1/9 (Part D), Telegram No.766, 18.7.1969.



## 第 4 章

# 外国对大马政权更换的评价

伦敦国家档案局30年保密期限满后的解密文件，也包含了机密备忘录。这些机密备忘录是由东西马英国最高专员署、英国内阁办事处、外国与英联邦办事处、以及海外事务部的官员写的。

这些机密备忘录含有来自：外交会议过程中所收集的各方资讯、外交使馆职员秘密情报集会、世界各国首都的英国大使馆人员的报告（尤指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澳洲、纽西兰等国的首都）。还有，经过筛选的1969年大马暴乱的传媒报道。

研究了这些文件，我们不但能够了解，经过严格审查的官方对暴乱事件的说法，同时，也了解到世界各国首都的官员，如何看待大马的暴乱事件。综合起来看，这些文件给人一种印象，本区域和其它外国首都都不敢苟同1969年5月事件中，华人受种族歧视和被杀戮的措施。唯有印度尼西亚例外。其实，我们从档案记录看到，针对1969年5月事件，唯一向大马政府递送贺词的外国领导人，就是苏哈多将军。

吉隆坡英国最高专员署，对中止砂拉越州选举表示遗憾，因为这显然是吉隆坡新政权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控制东马的政治发展。

我们也看到其它文件表明，英国和澳洲的军火买卖游说团辩解说，给一个以政令统治、实施种族歧视的专制国家提供军事配备，是正当的。结果，英国采取务实主义原则，决定：支

持具有大马主导权的马来执政党，较能为英国利益服务。志愿服务组织（VSO）中持有不同意见的英国志愿者，被训斥了一顿，指他们无知，不理解“在种族杂居的社会里，必须偏袒某一个种族”的立场。

泰国报章对大马政权的种族歧视政策看得透彻。他们肯定，1969年的暴动参与者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采取行动。新加坡李光耀总理的看法值得注意。根据档案记录，我们发觉到，他还是寄望东姑，在新政权的结构中，能继续扮演受人尊敬的长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拉萨却扮演着“毁灭人的神魔”的角色，因此而名誉扫地。北京的中国政府比较谨慎，因为自从发生了印度尼西亚1965年事件，他们看来不想在这地区制造更多的反华情绪。

### 砂拉越州选举被中止

显而易见，吉隆坡新政权的计划，是要利用1969年5月暴乱，为彻底改变大马政治和经济辩解。它很快就宣布，人们期望中的砂拉越选举已中止了。砂拉越对这举措的反应，可以从古晋英国最高专员署的报告看得出来：

“作出中止选举的决定，显然没有征询过砂拉越州内的任何人。况且，鉴于国家保安情况，那肯定是不合理的。砂拉越警方认为，这个决定并没使到内安问题得到改善，反而更加严重化……”

“人民联合党的王其辉，迫不及待地想和新的联盟政府组成稳定的合伙关系……上星期的悲剧之一就是，马来政治领袖的行动，令王其辉那样的温和派，在他们自己党内所采取的立场站不住脚。”

“砂拉越各政党的领袖们讨论过，并宣誓支持维护和平与种族和谐。不过，他们同时又说，中止选举不宜拖延太久。从手中的证据看来，不是华人反对党，反而是联盟的马来领袖恫言说，要把革命输入砂拉越。”

在砂拉越，马来人不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伊班人和华人合起来，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他们反对过去的政府，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马来人占据了统治地位。

“他们真希望，1969年的砂拉越州选举，有可能在吉隆坡和华人社群之间建立起崭新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华人社群一直感到不满，也感到不容于我国社会。上个星期发生的事件，看来已摧毁了这种可能性。糟透的是，吉隆坡可能对建立这样的关系，已不再感兴趣。”<sup>1</sup>

### 拉萨把“马来统治权”加以定形

从英国内阁办事处的机密文件，我们注意到，暴乱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星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猜到拉萨所进行的计划，即：修改《宪法》，把马来统治加以定形，使华人边缘化，还要把东姑“束之高阁”：

“今天，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英联邦联络官举办汇报会。在介绍惠真（Adrian van Huizen）将针对这个问题向我们发表讲话时……他表示他们所达致的主要结论如下：

“他说，大马政府要面对两大抉择：第一个选择，他们可以理智行事，要求温和派的华裔人士配合，把华人社群的新生力量吸入政府内部；另一个选择是，他们可继续目前由马来人所主导的紧急状态下的统治（或许能把这种统治方式变得柔和一些），而华人无法改善其政治地位，这很可能逼使他们更加倾向左派势力，并诉诸暴力。惠真认为，以目前来看，大马政府可能会作第二个选择。”

“从拉萨所说的一切看来，他似乎相信，决定和华人配合的任何试图，将使马来人失去对华人的“权力优

势”。马来人一旦失去这个“权力优势”，拉萨看来相信，较有活力的那些华人最终将会夺权。拉萨看来坚决要阻止这种趋势。很可能他会建议修改宪法，把马来统治权加以定形。惠真也说过，东姑的地位至关重要。不过，他认为，东姑很可能会被“束之高阁”，虽说暂时还不至于如此。”<sup>2</sup>

### 大马政府要求英国供应武器

暴乱发生不久，大马政府向英国和澳洲要求提供小型武器、弹药，和通讯配备给自卫团式的部队。这些自卫团是在大选后发生流血种族冲突过后才组成的。英国和大马已签署了联防条约。英国国外与英联邦办事处（FCO）在这课题上，对澳洲处境作了观察，同时，也琢磨了英国人的反应：

“5月21日，澳洲《肯贝拉时报》头版刊登了东南亚通讯记者尼尔·基勒（Neil Jillett）的报道。对澳洲来说，大马要求提供武器配备，产生了诸多严重问题。首要问题是：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他们能不能为提供军事配备给这个国家作出辩解，因为这个国家已中止了国会民主，转由独揽大权的集团所取代？另一点，他们能不能协助扩大保安队伍并提供武装配备，明知这支保安队伍对大马华裔公民已有偏见？

“澳洲总理高登（Gorton）的发言人说，他们只是要求提供配备而已，而无其它要求。大马并没要求澳洲派出军队。如果有这样的要求，那就不能接受。

“5月21日《时代报》（The Age）引述肯贝拉大马最高专员署的拿督唐纳·史蒂芬（Dato Donald Stephens）的谈话。他在前一天说，大马的共产党正从共产中国，获取经济与宣传方面的支持。澳洲外交部长福利斯先生（Mr. Freeth）也说过：‘我想你需要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据。’

“5月21日《时代报》以〈该是说‘不’的时候了〉为题的社论指出，澳洲政府必须客气地、但坚定地拒绝提供武器镇压未来暴乱的要求。”<sup>3</sup>

然而，英国人很快就为改变其立场而辩解。首先，他们争辩说，歧视华人的是马来保安部伍，而不是大马政府；第二点，共产党在威胁着法律与秩序：

“虽然有一些马来保安队伍成员，对华人进行证据确凿的歧视，但是，这显然不是政府政策。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事件，影响我们对提供军事配备要求所作的反应。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些军事配备的传统供应商。所以，以目前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协助当局去维持法律与秩序。

“我们必须考虑到，吉隆坡和其它中心，不只存在法律与秩序的问题，大马人民还必须认真处理共产党恐怖组织的威胁有日益增加之势。因此，他们有必要建立起具有全副配备、符合各种需要的小队，并且能轮流更换，以适应一般的需要。它不单是为了执行国内安全的专门任务…简单地说，我认为，提供这些配备（但这还得偿还）是合理的。可由FARELF存货提供，或必要的话由英国提供。”<sup>4</sup>

《纽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呼吁，大马政府应有公平的种族代表制，并且，不同意给大马政府提供武器的要求。它说，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提供武器给一个警察与保安部队，但这些部队在维持法律与秩序方面，却有所偏袒：

“真正的原因是，大选本身破坏了代表权的势力均衡。这份报章指出，10年来，种族课题一直处在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它对各新闻社关于警察和武装部队，在维持法律与秩序时有所“偏袒”的报道，表示关注。

“除非马来领袖们给华人和印度人‘在当前统治大马的“紧急状态理事会”中，以有效的代表权’（一家报章是这么报道的），不然，希望迅速恢复和平的希望仍然是渺茫的。

“何利约先生（Mr Holyoake）最近的声明获得一致支持。声明指出，不可利用纽西兰军队来解决（大马）内部分争。一家报章宣称，不答应大马政府要求的立场，将得到纽西兰全民的支持。”<sup>5</sup>

英国国务卿的本地私家侦探，在这份机密和私人报告中，完全表露了英国人十足的务实主义。它反映了在我国独立时，英殖民势力把政权移交给马来统治者的原本策略。它刻画了“马来人的傲慢与固执”、“华人的情绪化”、“英国人的脆弱”等，但是，最终保护英国人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排除了选择从新加坡贮备中，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因为还驻扎在大马和新加坡的英国武装部队，可能要面对遭报复的风险。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必然是，扶持唯一能组织政府和发号施令的集团。这需要谨慎处理。我们必须坚定，但要有同情心。马来人性格傲慢和固执。在这个阶段，祈求他们分担罪责，只能得罪他们。这么一来，我们将失去我们所有的影响力。

“我极力建议，所有（注意：所有）配备都必须来自英国。新加坡也许有这些配备，有人认为，从我们新加坡现有的贮备中，供应配备很方便。但是，在我看来，这么做，政治风险是太大了，因为这类供应来源，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

“如果供应来自新加坡，除了李光耀可能要面对困难以外，我们也必须切记，至今种族不和谐只发生在华人和马来人之间。我们必须避免我们自己的人，遭到报复的风险。他们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新马各地，所以非常脆弱，不堪一击。如果跟英国进行武器商业交易，用商用飞机运载，我相信会减少风险。

“我不低估困难。但是，我心里明白，我们必须支持现任的大马政府。如果不这么做，也不能阻止他们向其它来源取得武器，我们将在目前东南亚局势非常危急时刻，失去影响力，也很可能影响我们将来的撤退。”<sup>6</sup>

## 曼谷的看法

1969年5月26日，《曼谷世界》社论很贴切地反映了，大马北方邻国如何看待我国的局势。在大马，种族歧视政策显然是纷争的根源。暴乱是经过策划的，因而是有计划的。大选过后的狂欢，并不是暴乱的根源：

“吉隆坡应汲取教训

“大马新的‘紧急状态政府’指责说，最近的流血暴乱，和纷争持续的导因和责任，应由华人少数民族来承担。这显示，人口占多数的马来人，在寻找代罪羔羊时，无视事态的真相，而继续推行种族歧视政策。这就导致了暴力事件的发生。

“90%的伤亡人数都是华人。这多少显示，马来暴乱者是凶狠的。在行凶时，显然是有一定的目的和倾向的。

“星期天《世界报》发表的现场报道，包括大马最出色的报人，菲力士·阿比西克·那登（Felix Abisheganathan）的报道，表明：华人和印度人大选后表现得兴高采烈，这或许产生了初期的刺激，但是，这不足以唐突到会激起后来发生的大屠杀。

“东姑宣称，华人和印度人举行政治示威游行，冒犯了‘人民’，而‘人民’指的是马来人。这就侧射出，它含有歧视性的语气，连最高阶层的人士也采用了这种语气。”<sup>7</sup>

## 新加坡对大马政权更换的看法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5月暴乱过后事态发展的看法，可以从“外国与英联邦办事处”（FCO）1969年5月28日的电报中见其一斑。他在这份电报中表示相信，东姑并不是个不再有影响力的人。或许，他低估了拉萨。有人说，他掌控了邓普勒将军所拥有的权力。邓普勒将军是50年代，紧急状态时期英国武装部队的统领：

“拉庆（Laking）说，何利约先生从“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会议后的归途中，在新加坡机场和李光耀先生讨论了大马局势。李先生采取了一个从未预想到的较为冷静的观点。他说，大马人民对保安局势反应过敏。他们应该把保安局势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李先生继而说道，他不认为，东姑是个不再有影响力的人。在吉隆坡，东姑具有最佳的政治本能。举个例子来说，拉萨只允许拍摄他访问曾遭破坏的马来区，而东姑却在华人区拍照。虽然拉萨掌控的是邓普勒将军所拥有的权力，但他不是邓普勒将军。他并没拥有邓普勒将军的全体参谋人员。如果他把事件搞乱了，东姑可能重掌政权。”<sup>8</sup>

驻新加坡英国外交官马尔勋爵（Sir A. de la Mare）采用了更加直率的语言。他和李光耀近距离接触，对东姑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仍然是一个笨拙的老人，但……他是个备受尊敬的长者”），不过，他对拉萨的看法是：拉萨是“毁灭人的神魔”，到时军队可能逐渐把他铲除掉。下面或许是他自以为是的看法：

“李氏似乎在改变他对拉萨和东姑的看法。当拉萨看来是联盟体系的接班人时，李氏好像在祈望他掌握政权，也似乎认为，到时有机会改善新马关系。

“一路走来，他把东姑当作是一个愚蠢的老人。但是，就在大选前夕，他好像改变了他的想法：东姑仍是一个愚蠢的老人，但是，他是个备受尊敬的长者。以他这样的身份，或许，这几年，他能暂时避开灾难。对新加坡来说，这几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新加坡需要更长久的时间，来发展经济和政治结构，这么一来，它就更有能力承受大马方面发生的任何灾祸。

“在李氏眼中，拉萨受人尊重的程度，恰恰相反，已低落了许多。他告诉我，我们正在见证着最荒唐的事：拉萨到处把自己公开比喻作邓普勒将军。拉萨所追求的似乎是：在军队的扶持下，建立实质上的独裁政权。

“拉萨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他真的要这种花招的话，军队可能很快就会推翻他，夺取一切权力，据为己有。那就可能导致少数民族公开叛乱……

“在这个过程中，拉萨心中越来越想成为“毁灭人的神魔”。东姑则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作为最后的赌注，虽然希望渺茫，但是，他可能认为，还是值得孤注一掷。”<sup>9</sup>

拉萨新政权想建立多几个营的军队，以应付国内的动乱。李氏对这问题的看法，在马尔勋爵的另一封电报中，毫不客气地表露无遗。他显然没预料到，大马新的军事政府会走上成立“国民阵线”的道路，吸纳非马来人精英，作为1969年后一个崭新的政治安排：

“李氏说，大马政权就是再多建3个营的军队，还是多建30营的军队，都没有什么作用。日本宪兵比起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秘密国家警察）来更为凶恶，更没有人性，都无法使华人屈服。你认为拉萨敢这么做吗？局势隐藏着希腊悲剧的所有原素，正无可挽回地向着不可避免的高潮发展。

“可阻止这个悲剧的，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马来人要同意，在民主制度里，推行一个真正的种族和谐政策。少数民族现在已看穿了马来人的伎俩：他们只是嘴上高唱多元民族主义，而实践的是种族歧视。”<sup>10</sup>

马尔勋爵设想，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抉择：一个是中间路线；而另一个则是英国人（所谓“大马的朋友”）所喜欢见到的路线。时间证明，混合地选择下列（a）、（A）、（B）三项，看来已陷入困境：

“a. ‘马来人至上’的政府，同时，阻止华人在半岛争取他们认为应有的地位。

“b. 实现真正平等的宪制政府。这项平等原则将导致伊斯兰区变节，华人区则向新加坡靠拢……”

“但是，我们认为，除了a和b两项以外，可能还有其它发展机会。如果巧妙地走中间路线的话，可能有助于国家渡过危机……”

A. 继续实施联盟以往的政策，不管有没有华族伙伴：马来人的支持将继续消退。结果，华人可能通过民主手段取得政权，因而吓坏马来极端分子，可能致严重风险，那就是，马来极端分子可能发动政变，和/或者由军队接管政权。

B. 政府可能采取某些政策，挽回马来人的支持。可举出的例子是：把剩下的华校纳入国家系统，进行某些经济管制，旨在惠及马来人……而政府也寻找一个华族伙伴，但这伙伴必须有能力强增强华人的信任和信心。

C. 政府推行重大的亲马来人政策，而不认真帮助华人。其结果是，迅速严格实施对付共产党的紧急状态。

“大马的朋友们要引起大马政府关注的要点是：

A. 必须尽量少推行亲马来人的政策，要听取马来人的意见，但又尽可能不疏远华人。

B. 必须让温和派的华基反对党尽快发挥作用……硬要政府讲出5月13日夜发生的事件真相，或许不切合实际。不过，如果能显现出，政府已采取某些积极行动，对付马来人，也对付华人，这对恢复华人的信心，可能会起巨大的作用。

C. 必须严肃考虑未来的宪制结构，也必须显现出，政府是在跟温和派的反对党讨论这些问题。”<sup>11</sup>

### 种族歧视——吓坏大马英国官员

当时，自愿服务组织（VSO）的英国成员，被他们所任教的学校里的歧视现象吓坏了。当1969年5月国内骚乱发生时，他们流露出他们不愉快的心情。

“如果自愿服务组织问起，他们是否应该继续派送自愿者到西马来，就这么以为他们在作政治判断，那么，我必须纠正你的错误思想。他们是现实的。自愿者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管官方政策如何，他们在工作圈子里，看到和经历的是种族歧视。他们可能把自己这些经历告诉远在家乡的人。这么一来，能征募到的自愿者人数可能会减少，因为青年人是这么判断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含有歧视成分，自愿者就不应该帮助这个国家。这种态度自然会影响一般的征募工作。

“实际上，有一名自愿者刚辞职，理由是，在他学校里，发生了偏袒马来人的不公平现象。他设法找到了一个提出辞职的专业理由。”<sup>12</sup>

这些对大马英国人社群的看法所作的摘录，隐含了一系列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来自商场“老手”，以及各大学新来的

知识分子。各家医院里，华人占多数的伤亡人数，吓坏了他们。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商场老手“以往曾经见过类似的事件”。但是，那些刚移居大马的年轻专业人士，对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和现象，感到极度惊骇。英女皇陛下的政府考虑提供武器，给如此实施种族偏袒的政府，令他们感到震惊。

“麦尔康勋爵（Sir Malcolm Stoddart-Scott）收到朋友写来的一封信。这位朋友住在吉隆坡市郊外的安邦。吉隆坡正是大选后发生暴乱的中心点。来信者严厉批评实施紧急状态的大马政府。她认为，那是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她提到华人被攻击的事件而认为，那是当局蓄意执行的政策。她认为，英国政府不应该提供武器“武装多3个营的军队”。

“总的来说，那些老手，尤其是那些商界的老手，对事物往往采取颇为冷静的态度。他们受到过去道地的经验影响。他们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以往大马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另一个组织，可能规模小些，但是肯定更敢于直言。它是由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这些人大部分曾居留在大马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由于华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感情上受到波动。他们把马来人视为较邪恶的反面人物。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和一些医生（例如在大学医院里的医生）接触频密，因而受到影响。这些医生治疗过暴乱事件的受害者。他们见过华人伤亡人数，占大多数。为此，他们感到极端愤怒。有人在大学里找过我们一两次。他们对英国政府供应武器给大马政府，表示关注。在他们眼中，大马是执行种族偏袒政策的政府。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怀疑，大马政府故意利用暴乱的发生来压制华人。我们发觉到，大学医院里，有一名医生对事态发展，以半官方形式表示关心。他说，‘他代表一批同事’发言。”<sup>13</sup>

尽管大马国民作出诸多这类指责，但是，英国最高专员署即使可能犯错，也决定宁愿以务实主义为依归。针对供应武器给大马新建立的几营军队，有人提呈抗议。下面一封回应这些抗议书的快信，令我们看清，英国其实完全了解，他们在扶持一个纯粹属于马来人的军队：

“我们完全无法肯定，替新部队招募士兵，会产生令人信服的多元民族的组织。诚然，除了112营的马来军团纯粹只有马来人而已，还有5营野战部队。

“根据官方的说法，野战部队是多元民族的。但是，实际上，华人自愿前来参加新步兵团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在步兵团里产生了恶性循环：现有的步兵团（广义来说）都是马来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其它种族觉得没什么意思‘向大海捐献点点滴滴的水’。

“我带头承认，在骚乱期间，经常发生马来部队没有纪律，并对华人不公平的事。还有，现有的军官干部和军士，又得应付新成立的部队，所以，要维持纪律仍然问题多多，尤其是在新部队里，更是如此。我担心，这是一个我们很难解决的问题。”<sup>14</sup>

事态发展的结果是，英国最高专员署决定不杯葛大马政府，反而责怪“自愿服务组织”（VSO）对《大马宪法》中有种族歧视的条文一无所知。他力图为“种族偏袒的现象”辩解。他把大马和尼日利亚作个比较。不过，他没提到，在英国这是否合理：

“我必须承认，自愿服务组织总部对政治思想显然幼稚无知。这种情况，是你5月30日信中所透露的。这点，我感到有点惊奇。

“当然，本地‘种族偏袒’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它也存在于所有种族杂居的社会（你应该记得尼日利亚的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要求改善，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忍受。政府偏袒马

来人，那也是没错的，因为《宪法》允许他们这么做。《宪法》保护马来人的权利（更严格地说，这里指的是原住民）。

“在应对这些事件的发生时，英女皇政府的官方政策，肯定不是为了要排斥大马政府。”<sup>15</sup>

### 印度尼西亚对事态发展兴奋不已

在英国最高专员署的文件中，我们发觉到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顾问，向纽西兰最高专员发表种族主义的观点。他深感兴趣的是“马来主导权”，以及华人“将牢牢地被打压下去”的事。他希望崭新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能向印度尼西亚更加靠拢。

他对大马华人在“513大屠杀”过后的反应作出诠释。他的诠释和英国人在紧急状态时期的反应，有相似的地方。<sup>16</sup> 我们也发现，苏哈多将军是递送贺词给新生的大马政权唯一的外国首长。1965年，苏哈多将军向苏卡诺政府发动军事暴动：

“莫丹尼Moerdani（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顾问）对大马事态发展，毫不隐瞒地表现振奋不已……“马来人主导大马”将很快成为现实，而不是幻想。联盟政府执政多年，已把马来人占主导地位的理念搞模糊了……“国家行动理事会”将追随一种强烈的亲马来人政策，华人将被牢牢地压制下去。

“莫丹尼说，‘马来极端分子高层’（他没说是谁）曾告诉他，崭新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将和印度尼西亚更加靠拢。他提出了一个论调：大马的真正命运是和印度尼西亚联系在一起的……唯一递送贺词和给予鼓励的外国首长就是苏哈多。那不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吗？”

“莫丹尼对华人的看法相当简单，丝毫不出乎意料之外。不论是在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其它地方，华人就是华人。他们尊崇和服从的是权力。目前，中国是亚洲大陆的强国。因此，所有的华人骨子里都是共产党同情分子。

“他接着重复老一套的多米诺定理。大马必须对付华人，那是有必要的。一个共产主义的马来西亚（这种趋势在逐渐形成中），对谁都不利，不论是印度尼西亚、澳洲、或纽西兰。

“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印度尼西亚能相当轻易地对付华人，那是因为，他们的确是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大马的情况则不同。他宣称，他不认为，华人会因“513大屠杀”而进行反击。华人很现实，他们知道枪支掌握在谁的手中。他也不相信，面对“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华人会加强政治压力。一旦他们意识到谁在当家作主，他们就会变得温驯听话，转而关注他们的主要兴趣——赚钱。”<sup>17</sup>

### 中国政府的谨慎反应

从驻北京英国代办所发出的快讯，我们发觉到，中国政府对暴乱事件发表评论时，态度谨慎小心。不过，他们似乎没察觉到“拉赫曼集团”已被新政权所取代了，因而仍在强调阶级斗争：

“尽管第一份报告（5月20日新华社）说，‘拉赫曼集团’……把矛头主要直指华裔大马公民，报告书一再重复提到各民族人民被迫害，指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按照秩序排列）。

“5月20日报告特地反驳了‘拉赫曼集团’试图把‘这尖锐的阶级斗争’定性为民族冲突。中国政府的反应似乎过于缓慢，并且非常谨慎小心。这也许是因为他



们不大肯定，骚乱事件是否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而又因为他们不愿意冒煽动反华情绪的风险。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前车可鉴。”<sup>18</sup>

## 结语

在外交界的人士眼中，吉隆坡新政权看来是想完全控制整个国家，所以中止砂拉越选举。这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作法。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熟知拉萨的计划，即：修改宪法、为“马来主导权”定位、并把东姑边缘化。

谈到大马新政权要求供应军事配备事，澳洲人和纽西兰人坚决反对这个理念。但是，英国官员却迫不及待地为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而辩解。

在这个区域，泰国人和新加坡人严厉抨击大马当局实施种族歧视政策。新加坡李总理对拉萨想当后期邓普勒将军的意愿，加以冷嘲热讽。但是，他错误地判断了东姑的耐力。苏哈多政权是祝贺大马政权实施“马来主导权”以及“把华人打压下去”的唯一外国政府。中国方面，较为谨慎小心，选择不再在这区域进一步煽动反华情绪。

居住在大马的英国官员的观点，和那些英国最高专员署与英国商业利益集团的看法，形成了强烈对比。前者对公然无耻的种族歧视表示厌恶，而后者则责备他们天真无知，缺乏务实主义的观念。

## 参考资料

- 1 F. Kennedy,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Kuching, 19.5.1969.
- 2 Secret: Crisis in Malaysia (大马的危机), B. T. W. Stewart, Cabinet Office, 21.5.1969.

- 3 FCO Telegram, No. 502, 21.5.1969.
- 4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8, 21.5.1969.
- 5 Sir Ian MacLennan, FCO Telegram, No. 3, 21.5.1969.
- 6 Secret and personal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Lord Shepherd, Sir N. Pritchard, Telegram No. 288, 25.5.1969.
- 7 *Bangkok World* editorial, 26.5.1969.
- 8 FCO Telegram, No. 241, 28.5.1969.
- 9 Sir A. de la Mare, FCO Telegram, No. 512, 2.6.1969.
- 10 Sir A. de la Mare, FCO Telegram, No. 511, 2.6.1969.
- 11 KL Telegram to FCO, No. 577, 25.5.1969.
- 12 Letter by C. N. F. Odgers of the Ministry of Overseas Development to W. Turner, BHC, KL, 30.5.1969 (RC 354/106/05 OD 18/1).
- 13 “British community views on West Malaysian disturbances” (英国社群对西马骚乱的看法), 6.6.1969, Signed: R. D. Clift, British HC, Kuala Lumpur.
- 14 Confidential memo from G. C. Duncan of British HC, KL to A. L. Southorn of FCO, 27.6.1969.
- 15 Reply by W. Turner of BHC, KL, 11.7.1969.
- 16 英国最高专员葛尼勋爵 (Sir Henry Gurney) 在紧急状态期间曾说过：“你要知道，华人倾向于较能使他们害怕的一方，这是人所共知的。以目前来说，他们看来较倾向政府。” (FO 371/1583, 19-12-48, quoted in Hua Wu Yin,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London: Zed Press, 1983, p.99.)
- 17 G. C. Duncan, British High Com, 30.5.1969, Copy of a note by NZ High Co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Counsellor at the Indonesian Embassy, R. D. Clift, 4.6.1969.
- 18 Signed: J. D. Laughton, Office of the British Charge D’Affairs, Peking, 11.6.1969.

## 第 5 章

# 新兴的马来统治阶级

“毫无疑问，目前这个国家的民主已死亡。民主是死于反对党手下。他们引发暴力事件，导致混乱局面。在混乱局面中，民主不能操作。因此，这个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法律与秩序。”<sup>1</sup>

这是大马新上任的内政部长敦依斯迈，在1969年5月16日的留言。随着种族暴力事件爆发后的事态发展，显而易见，巫统党内和他们控制的国家机器内部的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已订下计划要中止民主，并重新修改东姑的“联盟方案”，以建立他们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体系，并以“马来中心主义”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外国与英联邦组织”（FCO）5月16日所发出的电报，表明了新政权的动向：

“外交大使贝尔（Ambassador Bell）所表达的看法，引起国务部门相当大的恐慌：

- A. 东姑本身在过去3天内，表现得不知所措，也无法掌控局势；
- B. 东姑及其政府似乎在推行一项完全扬弃多元民族主义的政策，明目张胆地走上“马来人至上”的路线，不再作出努力加强华人的信心以及跟华人合作。

外交大使馆顾问郭福利（Godfrey）始终认为，若有可能，必须遵循多元民族的政策。他希望，那些在吉隆坡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应尽量传达这个意见。他认

为，我们和澳洲人最有条件这么做。5月13日，李光耀也跟格林元帅（Marshall Green）这么说过，还提醒美国人不要从中干预其事。顾问说，他认为，这也正是我们最高专员署应给予的忠告。”<sup>2</sup>

## 国家行动理事会

延迟了两天后，5月17日夜晚，国家行动理事会宣布其成员名单。名单中有：敦拉萨、敦依斯迈、陈修信、敦山班旦、总警长、东姑·乌斯曼（武装部队参谋长）、阿都·卡迪尔、三苏丁、加查里、寒沙。

5月16日，以依布拉欣·寒沙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行政部，告诉记者，内阁纯粹是咨询性质的，因为国家行动理事会明显是决策和行政的最高层。因此，外国观察家看得出，我国已出现了专制政体：

“总而言之，一个已生效的政府正在形成。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一个非议会民主的专制政权。目前试图增添一些多元民族的色彩，那是不能持续很久的。”<sup>3</sup>

国家行动理事会的成立，不只是意味着，自从独立以来，拉萨第一次控制了整个国家行政，同时，军队在指挥着民事行政部门。下面的另一封“外国与英联邦组织”（FCO）电报显示，新的行政变更将继续进行一段时间；媒体审查也将跟着改变，而东姑已失去实权。电报透露，新政权正在考量，在新的变更计划中，民政党可能成为伙伴：

“国家行动理事会目前每天都在开会……过去几天，已进一步证明，敦拉萨和他身边的同僚准备把整个国家行政，掌握在手中。即使是东姑，他也在5月21日，告诉各报章：‘内阁已名存实亡，而从属于国家行动理事会。’

“5月20日，拉萨以行动理事会主任名义，授权国家行动理事会最高执行官依布拉欣将军，发出命令，指挥公共服务部门。虽然这是依斯迈上任以来顺理成章的结果，但是，这显然是军队指挥民事行政部门的首创例子。

“各州行动理事会（SOCs），除了东马以外，在5月21日《宪报》上正式公布了。每个州行动理事会有4名成员：负责掌管的首席部长、一名高级公务员、社会上层人士、军队代表……8个州行动理事会中，有7个州的名单已通知各报馆。他们都是马来人，只有檳城例外。在檳城，首席部长和州警长是华人。

“越来越深刻的印象是，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只是为了操作一个时期。除了正在建设起来的结构明显是具有持久性质以外，我们现在有一个全面的媒体审查机构，为加强大众媒体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5月22日，所有政党刊物都被查封。当我向敦依斯迈询问所施加的查封期限时，他提到，3个月后，才可能开始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况。

“5月20日宣布成立的政府内阁，有15名华人和2名印度人。马华公会坚持不接受内阁职位。不过，他们的4名重要领袖，最后同意被委为不管部长，在政府内部服务，担任的是紧急状态期间的特别任务。

“所有州行政理事会（即州内阁）也委任了。尽管反对党提出挑战，联盟又重新在霹雳州和雪兰莪州组织政府。

“东姑的处境以及他与敦拉萨的关系，还不明朗，不过，看来已经肯定的是，他的地位正逐步被削弱……也正因为他对政府还有利用价值，还可扮演“长者”的配角。非马来人可接受他，但是，他对马来人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以目前来说，东姑想要把政府的有效控制权，再次掌控在自己手中，看来是不可能的

了。”<sup>4</sup>

根据下面的英国内阁机密文件看来，显而易见，当时(即：5月19日)拉萨已全面掌控了政府，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据报道，大约有1万名避难者。暂停出版的本地报章，眼下已可以重新出版了，但必须经过审查。外国通讯记者的戒严通行证已被收回。这是因为据说他们的报道不公正。有证据显示，军队(而不是警察)，在执行戒严令时，偏袒马来人。据说，一些反对党领袖也被逮捕了。

“敦拉萨和东姑之间的真正关系还不明朗。在公开场合，敦拉萨说，他直接向东姑负责。但是，私下他澄清说，他已完全掌控了国家。这就意味着，东姑作为具有实权的首相，已开始经历淡出的过程。”<sup>5</sup>

万一新加坡发生种族暴乱，究竟拉萨和他巫统中的同伙，是否会派遣军队进驻新加坡？下面一份机密报道预测了这种可能性：

“我们从秘密消息来源(新加坡最高专员署，电报列号455第3段)得悉，敦拉萨和巫统资深党员，据说决定派遣部队进驻新加坡，以防万一新加坡发生反马来人暴力事件。我们已经要求驻吉隆坡代最高专员，要尽量阻止新加坡反马来人暴力的危言耸听的报道，使它不在吉隆坡流传，不让人对它信以为真。(FCO电报-列号342)”<sup>6</sup>

## 推行马来中心主义政策

新兴官僚资产阶级以“马来中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争取马来群众的支持。具有启发性的是，513暴乱发生后，加查里·沙菲很快就发表了关于有必要成立“国家文化政策”的意见。<sup>7</sup> 这个“国家文化政策”以马来语言和文化作为根基。这

点，可以从纽西兰最高专员署的文件，看得出来：

“我们从再纳·苏隆那里了解到，政府正进行一场灵魂深处的大检验，检验政治体系的宗旨和目标，以及达致这些宗旨和目标的最佳方案。再纳同意加查里的说法，即：大马社会应该以‘土著为根基’。

“在社会方面，这意味着，接受和广泛使用马来语，并发展一个统一的马来西亚文化。这种文化是取自于本土(不向中国、印度、或印度尼西亚吸取灵感)，基本上具有马来人的特性，尽管它是大马所有不同的种族社群的综合体。”<sup>8</sup>

不久，拉萨把财政部加入他掌控的权力范围内。他极其迅速和易如反掌地做到了这一点。联盟党原有的安排(即：财政部长由马华的华人掌管)，就此告一段落：

“敦拉萨，除了负责管理其它部门以外，也接管了财政部。其实，他对处理经济和财政问题，完全没有兴趣。我只能假设，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拥有绝对权力处理开支：(a)以应付迫切的紧急事态和救灾措施，(b)发展武装部队的计划。”<sup>9</sup>

下面的快讯详细报道了美国大使和敦依斯迈之间的谈话。后者清楚表明，将不会回到“西方式”的宪制政府的道路上去，而大马华人必须接受马来特权：

“敦依斯迈和美国大使谈话时，他预料，一旦迫切的保安问题解决以后，将会有一段稍长的时期，政府保留牢牢的控制权，严格控制反对党势力，但同时，设法争取更多华人的支持。最终，将恢复宪制政府。不过，它将和西方模式不同，或许，它至少是经过修饰的西方模式……

“敦依斯迈认为，一般的投票制度不一定是组成我国国会的最佳方案。他肯定会假设，华人一定要继续接受：马来人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这一点……

“如果政府的想法，正是我们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可能得面付一个非常严重的局势……”<sup>10</sup>

当时，外国观察家都能看出，共有3人在掌控着政权：

“或许我应该这么说：所有迹象都证实了我们的信念，即：目前，政权是有效地掌握这3人手中。他们是拉萨、伊斯迈、加查里。他们之中，最有时间的是伊斯迈，他专门负责思考未来的事态发展”。<sup>11</sup>

伊斯迈已开始思考要如何制定宪法、国会、教育制度、和一个崭新的马来西亚：

“5月29日，伊斯迈告诉英国代最高专员，他在改变自己的观点，认为现有的宪法和国会可能不足以应付未来的需要。教育制度必须统一，以马来文作为其主要语文——虽然政府在1956年和1959年的报告书中，已说明了这些目标。我们知道，巫统正在严肃思考将来的问题。

“5月24-25日周末，澳洲派遣一名官员到吉兰丹去。他发觉到，泛马回教党信心十足。尤其是，他们认为，他们已摸清了东姑和敦拉萨的底细，而他们在关注敦伊斯迈。

一般上说来，泛马回教党的目的似乎是在倾全力跟联盟合作，那就是说，回教党要使到马来人心中认为，他们和巫统没两样，从而阻遏巫统的自由行动。他们在霹雳州唯一的议员被通知，必须保持中立，不参与政府，也不参与反对党联盟。”<sup>12</sup>

新兴马来统治阶级显然在广泛传播新“马来议程”的“受保障的特权”，虽说他们后来所提出的“马来主导权”，当时还没出现：

“阿都·拉萨一直强调，有必要重申，无限期实施宪法中受保障的马来人的特殊权利。

“加查里则强调，有必要使所有族群都承认，宪法下的马来人权利是永久的，尽管他承认，马来人权利在实施方面，还有商量的余地。

“我问他关于巫统的极端派所施加的压力性质。他坚持所谓压力，不是要采取行动压制华人，而是为了给马来社群以广泛的实际援助。

“加查里说，成立新的武装部队，是为了在马来甘榜维持秩序。他说，可能要花上4个月的时间。显然，他预料在这些新部队完成训练之前，他预料不可能恢复民主。

“达夫先生指出，年轻受过教育的华人，可能会引起特定的政治问题。

“加查里承认，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但是，他坚持，一般上，华人并没有太多的抱怨。

“（大马政府）力图确保马来族群拥有优先权，同时又为了要争取华人的合作而努力，这种意愿是难以实现的。仍然令我难以信服的是，他们内心承认，有必要满足华人要获得真实的政治参与权的愿望。无论如何，强调‘马来人’的政策，特别需要谨慎小心地向公众讲解，尤其是面向世界舆论时，更是如此。”<sup>13</sup>

在同一份报道中，尽管英国对新政权的新“马来议程”有所保留，但是，他们还是宁愿采取商场上惯用的务实主义：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支持和表示同情。一味唱高调只能产生反效果。我们要尽量利用逗留在澳洲肯贝拉的机会（即：1969年6月19-21日的五强会议）。在那里，没有紧张的压力，拉萨或许比较能接受忠告。”<sup>14</sup>

到了1969年7月，从以下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巫统党内新兴统治阶级，准备推行一些果断的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新政策：

“与此同时，（政府）加强宣传说，他们准备以‘铁腕’手段治理国家。他们仍然相信，教育（以及推行国语政策）对他们力图重新争取到马来人的支持，以及为了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融合各族群，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其目的是为了要比上一任政府更加快速地努力，以便达致单一教育源流，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语文的最终目标。”

“轻微的变更已开始发生，但是，这项政策没公开宣布。其实，要协调政府内部一系列不同的意见，也不容易。这些意见涉及选择时机和如何处理这个敏感课题。令人感到颇为惊讶的是，这类变更是通过低调宣传新国民大学（即：马来源流大学）的设立而反映出来。这所大学在1970年5月开始招收第一批新生。”

“7月1日，拉萨宣布成立‘民族团结部’。它究竟有什么效应，还得拭目以待。外交部常任秘书加查里，在极力推广这个理念。他所预料到的是，一系列的专家咨询组，将充当政府和私人的一切活动的监督机构，以便维持各种族之间的某些行为准则。”

“究竟能不能通过立法，使民众互相亲善，那是令人怀疑的。他们将以政府的行事和军队受审查的程度，来评价这个措施。如果在委任各专家咨询组成员方面，具有创意，那么，公众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由于教育问题必须放慢脚步处理，政府转向经济政策，采取迅速行动。敦拉萨的未来经济蓝图，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减低失业率，尤其是离校者和大学生的失业率……在东海岸沿海一带，重点发展工业和农业，政治上是以马来人为考量对象。但是，拉萨强调工业化措施，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所有民族，而城市地区的发展工程应达致这个目的。”

“最近实施的一项法令规定，非公民必须申请工作准证。这至少可为大马公民保留某类职业。但是，显而易见，政府准备保存这个武器，作为锦囊妙计，以后可用来对新加坡公民，进行报复行动。”<sup>15</sup>

从这一份通讯记者的报道，我们留意到，巫统不愿意把联盟改变成一个多元民族的政党，而只要多个单元种族政党组织起来的联盟。各单元种族政党必须迎合各种族的利益。显然，他们最关心的是，动员马来人支持他们沙文主义的思想意识：

“某些圈子内的人士提出，要把联盟改变为一个多元民族的政党，以取代多个种族政党的联合体。但是，巫统不接受。马华一些党员则欣然同意这项计划。没有证据显示，巫统曾和民政党或泛马回教党进行过严肃的讨论。不过，民政党领袖，也是檳城首席部长林苍佑医生，一直获得报章的报道。6月初，民政党如果受邀，则准备和巫统一同组建政府。”

“上星期，美国大使馆在吉兰丹的一名官员报道，泛马回教党信心十足地等待巫统找他们进行谈商。他们已得到吉兰丹相当多的马来利益团体的认同。联盟政府可能会面对一定的风险，即：政府可能因开始失去马来人的支持而被孤立。”<sup>16</sup>

这个时候，东姑势力极其微弱。为了讨好报章，他得采取令人怜惜的态度：

“还在康复中的东姑，于7月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紧急状态将持续一个时候。但是，把国家行动理事会说成是比内阁有更强大的权势，那是错误的。他和拉萨两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意见分歧。”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如果人民不再需要我，我肯定不会一直呆下去，而令人看了生厌。”<sup>17</sup>

## 联盟拉拢反对党

紧急状态生效期间，新政权迫不及待地拉拢先前的反对党，加入一个较广泛的联合体。第一个行动就是，拉拢民政党加入联盟，成为一个支持政府的小伙伴，或者，成为某种形式的忠诚反对党。迄今为止，民政党刻意采取温和路线，只求协助联盟，而不反对联盟在霹雳州和雪兰莪州掌权：

“政府继续拒绝和反对党来往，并剥夺他们进行媒体宣传的权利。迹象显示，一旦局势稳定下来，政府准备采取严厉限制措施，对付以华人为主的民主行动党。他们也可能采取行动对付极端主义的泛马回教党。”

“但是，巫统领袖目前似乎相信，在恰当的时候，巫统能和民政党合作。民政党大部分党员是华人，不过，他们宣称自己是多元民族的政党。它将成为一个支持政府的小伙伴，或者，成为某种形式的效忠政府的反对党。到目前为止，民政党刻意采取温和路线。至于联盟在霹雳州和雪兰莪州执政的问题，民政党只想协助联盟掌政，而不跟联盟互相竞争。”

“短期的建议是，让一个坚定的专制主义政权无限期继续存在，目的是为了争取马来人的支持，暂时也可维持法律与秩序。”<sup>18</sup>

“政府领导人一旦获得了足够的马来人支持，才采取步骤争取足够的温和派华人支持，让政府无限期统治这个国家。看来他们相信，这么做，是不会太迟的。”<sup>18</sup>

暴乱发生不久，拉萨就和民政党的林苍佑进行密切联系，力图塑造一个新的执政党联盟，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反对党还没正式展开政治活动：

“5月22日，在敦拉萨要求下，美国大使接见了敦拉萨。拉萨表示，他关注的是，希望能阻止种族冲突再

次发生…拉萨说，他几乎每天都和民政党槟城首席部长林苍佑医生通电话…显然，目前的反对党领袖没有机会享有政治活动的充分自由。”<sup>19</sup>

拉萨在高层领导层中稳固的地位，以及巫统对民政党的态度，可以从另一篇通讯记者的报道中看出来：

“人们所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在紧急状态下，由拉萨领导的政府，其目的是为了能掌权一个时期。东姑的地位，毫无疑问，已削弱了。报章和宣传媒体受控制，而大部分的反对党则被剥夺了使用这些传播媒体的权利。政府和他们没有来往。不过，有迹象显示，巫统领袖相信，时机一到，他们会和宣称多元民族的民政党合作。”<sup>20</sup>

民政党和新政权进行的精明交易，可以从另一份文件看得一清二楚：

“民政党继续进行他们为了达致和解的行动。5月28日，党副主席林苍佑，秘书长陈志勤显然同意：如果巫统在一个星期内，召集反对党进行关于未来的讨论，他们可以接受政府强调成立具有马来人特性的政府。陈志勤向澳洲报道这件事时阐述道，如果民政党加入联盟，民政党将要求分配到3个内阁职位。那么一来，马华就不得不要退出联盟了。”<sup>21</sup>

## 拉萨和军队与警察的关系

新兴的官僚资本家，如果没得到军队和警察的合作，是不可能发动政变的。当时，外国记者不敢相信，拉萨能这么迅速地掌握专制统治权。他们怀疑，拉萨和军队与警察之间有交易：

“拉萨进行过于凶狠的镇压？”

“许多人感到非常震惊，那是因为，政府过于迅速地

诉诸于黑暗的紧急状态下的专制统治，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政府认为，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要对付所谓共产党接管政权的企图。其实，这是粗制滥造的说法。所以，很少人会相信……

“实际上，敦拉萨已中止了联邦制度。联邦制度的错综复杂令他恼怒。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管制。这种直接管制，由高至“国家行动理事会”，低至县级层次进行。

“头3天，国家瘫痪和几近崩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至今仍然是一个一目了然而又无法解释的空白。暴力事件爆发的那一天，敦拉萨和军队总参谋长与警察首长举行频繁的会议。但是，傍晚时分，执政党举行会议时，马来人引发暴力事件，保安部队却反应出奇缓慢。他们应该受到谴责。”<sup>22</sup>

### 国家意识形态应由谁决定？

所谓“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原则”，是暴乱事件发生后，紧急状态时期所产生的。它并没提呈国会供深入讨论，也没咨询过公众的意见。

1969年7月，“国民团结部”成立。加查里宣布制订“国家意识形态”。其基本条例规定，1969年后的新马来西亚，哪类课题可以提出，而又哪类课题不可以提出。国民团结部以国家行动理事会民事部主任，丹斯里·卡迪尔为首。这部门分成两个部分：研究部，以沙林医生为首（Dr Agoes Salim），他曾在国家与乡村部任职；行政部，则以税收咨询局前任主席，哈芝·苏加（Haji Sujak bin Rahiman）为首。政治人物（包括反对党成员）以及其它专业人士被邀提呈看法和意见。经过培训的研究职员，则将进行长期的调查工作。它引起《远东经济评论》波比·利斯（Bob Reece）的批评：

“虽说，从加查里的长篇演说看来，所要调查的究竟是什么问题都不清楚，但是，这一切都还可以接受。如果能找到经过培训的工作者，研究部门无疑能作些与种族关系有价值的工作。但是，制定国家意识形态，似乎是一个较为艰巨的任务。

“意识形态包含着一种制度。这是一种具有某种前瞻性的理想或原则的制度。然而，加查里是在向后看，这一点，很快就明朗化了。迄今为止，大马是一个极为安宁的多元民族发展中国家。他说，既然如此，问题出在哪里呢？

“几天前，敦拉萨自己承认，自从1957年开始，有太多问题被掩盖，继而被遗忘了。实际情况是：虽然宗教宽容所达致的程度给人很好的印象，但是，在马来半岛，从来就没有良好种族关系的黄金时代。

“早些时候，在一些记者招待会中，加查里曾经强调，5月13日暴乱事件的主要原因是：1957年所达致的“君子协定”（即：华人可获得公民权，马来人享有“特殊地位”的协定）被破坏了。他宣称，在大选活动期间，华基反对党挑战（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这就激怒了马来人，因为马来人仍旧把华人当作他们的宾客。自1957年以来，以马来人为主导的联盟党享有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票。除此以外，还有9个苏丹保证，不得触及马来人的权利。因此，挑战这些权利，甚至质疑这些权利不是永恒的，那等于是搞革命。

“或许，‘意识形态’这个词，照一般意思来说，不是适当的字眼。敦拉萨和加查里比较关心的是，用当时草拟宪法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即：提醒新一代的非马来人关于1957年的协议，及其派生的影响。

“对‘国家原则’一词，加查里似乎是指一些条规。这些条规一一列明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以防再爆



发另一次种族纷争。对他来说，这就像一场高尔夫球赛，所有的球员必须接受这些条规。但问题是：应由谁来为大马制订这些条规？政府已在Jalan Bluff设立了新的心理作战部。通讯记者渴望知道，国民团结部是不是设立在同样适合的地址。”<sup>23</sup>

## 1969年后的大马政治制度

1969年5月暴乱发生3年过后，《远东经济评论》德烈·戴卫斯（Derek Davies）对巫统新统治阶级的评价显示，1969年的政变如何定形下来：拉萨在牢牢控制着政权，加上敦依斯迈和加查里·沙菲共3人，形成了“三雄执政”的局面，在实践着“马来人议程”：

“很自然地，在平静的表面下，紧张局势仍存在。即使是一位居民，别说偶尔到访者，都很难猜测还有多严重的残余恐惧心理和愤怒心理。不过，在短短的3年里，大马得以解除其爆炸性的内部纷争，使到如今，首都的氛围轻松多了：用午餐时，慕沙·希旦，作为朋友，不但能开诚布公地讨论‘敏感问题’，同时，也在他谈话中穿插一些评语和笑话。3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慕沙·希旦是巫统激进派的政治人物。1969年暴乱过后，他和其它领导人吵架，因而离开大马，前往伦敦。他回马后，管理联邦土地发展局。这是一份需要谨慎小心处理的工作，但他的工作效率高。）

“拉萨培养起他在政治上的支持者。作为东姑的得力助手，他不懈地在全马到处走动，走访乡村和计划工程。巫统的一个弱点是：作为一个群众的政党，它在组织方面，基本上，走的是具有阶级意识的传统路线。党抛弃了许多人士。这些人在他们的州内具有很好的政治影响力，不过，他们的行政能力较为逊色。但是，这也是巫统最大强项的来源：它是一个群众性

的草根组织，长期不断和选民接触。选民（即：马来农民以及他在甘榜里的家庭成员）成了它的权力根基……

“大马的领导层，传统上，有如一个动作缓慢的芭蕾舞，由小心平衡的各种姿态所组成。首相所突出的是个四平八稳的多元民族形象。副首相所采取的则是稍微倾向亲马来人的态度。所以，自从拉萨接过领导权，他决心完成争取各阶层人民信心的任务。基本上，他的目的已达到了。

“副首相敦依斯迈，以自由主义见称，则负责安抚土著的任务。敦依斯迈给予拉萨全力支持，就好像他支持东姑那样。人们对他的健康比较不担心了。敦依斯迈，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国家焕然一新的轻松与信心，甚至轻松到出乎预料地酷爱‘流行’衬衫和领带。或许，这是他对国家青年的愿望，寄以同情的隐约流露……

“如果拉萨在不久的将来，失去对主要职权的兴趣，或者，如果敦依斯迈，即使健康情况有所改善，也决定不要这份崇高的工作，加查里目前看来可能成为接班人。但是，就因为加查里拥有西方人看来具有吸引力的品质，可能影响到他的机会。他个性外向，随时都会谈论政策倾向。如果拉萨仍然掌舵政权，其它可能存在的人选，如：慕沙·希旦和雪兰莪州的拿督·哈仑，就有机会获取经验，变得更成熟，以及使政治资历丰富起来，好抗拒加查里的诉求。”<sup>24</sup>

我们开始分析5月13日暴乱时，最先研究的是，国家独立时所提出的、具有内在矛盾的联盟方案。暴乱发生3年后，这个“邪恶的联盟”的根基又受到置疑。直到今天，它仍然受到置疑：

“政界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检验执政党，检验组成联盟党的整个种族根基。联盟的3个成员党都

宣称，他们代表各族群的利益。他们必须面对选民。这个立场的含意是，一名华人在一个巫统候选人当选的选区，不能祈望他的国会议员代表他的(益利)。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得出结论，当今的政党体系，在阻挠着各民族之间认同的健康发展，也在阻挠除去分隔族群的藩篱。大马可以向印度尼西亚学习，根据非种族主义的政治路线，组织国会中的代表制。执政党联盟的成员，可组成类似“超级的库尔加党”(注：库尔加党Golkar是印度尼西亚目前的执政党)。这种刚构想的理念正在流传。然而，能在全全国公开讨论这个理念的时日，显然还很遥远。”<sup>25</sup>

## 结语

显而易见，5月暴乱导致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接着，他们控制了“国家行动理事会”。以东姑为首的没落贵族阶级，跟拉萨所领导的新马来精英相比之下，其势力日渐式微。

新兴的马来统治阶级延续了“联盟方案”的大部分计划，并把它扩大，以容纳更多的反对党。显而易见，巫统在这扩大的联盟组织中占尽了优势。种族大屠杀和军事统治下的紧急状态，目的是为了避开1969年后巫统在大马政坛上的主导地位，受到任何挑战。

在制造恐怖和进行镇压的氛围中，新政权采用和推行具有种族歧视性的马来人中心主义的经济、教育、文化等政策。这些政策，对新兴的马来统治阶级争取马来群众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在累积资本方面，这些具种族歧视性的政策，对促进新兴的马来统治阶级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参考资料

- 1 Speech by Tun Dr Ismail (Radio Malaysia), 7.15 pm, 16.5.1969.
- 2 FCO Telegram, No. 1506, 16.5.1969.
- 3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484.
- 4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574, 24.5.1969; FCO 24/484: Malaysia – Civil Disturbance following the General Election.
- 5 Despatch by D. P. Aiers, SW Pacific Dept., 19.5.1969.
- 6 SECRET, CABINET, 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J. O. Moreton, 21.5.1969.
- 7 Kua Kia Soong, *Malaysian Cultural Policy & Democracy*, Kuala Lumpur: Huazi, 1990.
- 8 Mr Farrell, NZ High Commission, 23.5.1969.
- 9 FCO Telegram, No. 563, 23.5.1969.
- 10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575, 24.5.1969.
- 11 Duff, FCO Telegram, No. 607, 30.5.1969.
- 12 G. C. Duncan, British High Com, 30.5.1969.
- 13 Mr. Hainworth, Telegram No. 282, 9.6.1969.
- 14 同上。
- 15 Mr. Duff, Telegram No. 14, 4.7.1969.
- 16 同上。
- 17 Mr. Duff, Telegram No.728, 4.7.1969.
- 18 Mr. Duff, FCO Telegram, No. 574, 24.5.1969; FCO 24/484: Malaysia – Civil Disturbance following the General Election.
- 19 Mr. Duff, Telegram No. 576, 24.5.1969.
- 20 FCO Telegram, No. 378, 28.5.1969.
- 21 G. C. Duncan, British High Com, 30.5.1969.
- 22 Fred Emery, *Sunday Times*, London, 25.5.1969.
- 23 Bob Reece, “Malaysia: The Name of the Game” (大马：游戏的名字),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No. 31, 27.7/2.8.1969, p.278.
- 24 Derek Davies, “MALAYSIA: The Three-Year Recovery” (大马：3年后的复苏),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Cover Story, Vol. 76, No. 19, 6.5.1972, p.12.
- 25 同上。

## 第 6 章（完结篇）

### 朝向民族和谐

大马不幸发生“513事件”，至今已将近40年了。当局没尽力透露事情真相，也没为达致种族和谐而作出应有的努力。国家行动理事会并没对这个事件进行公开调查，也没对大选后发生骚乱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

联盟政府不接受外国通讯记者对大屠杀事件所作的报道。它把这些报道当作是毫无根据和含有恶意的。实际上，政府自己发表的、以种族分类的死亡和逮捕数据，大体上和这些报道互相吻合。

从那时候起，巫统领袖反复利用“513事件”，威吓那些为民权请愿的异议分子。他们甚至利用513事件，遏制选民投票支持反对党。

自1969年以来，我们也见证过几宗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巫统所指挥的暴民不顾法纪，干扰和威吓大马公民，只因他们质问当局为何剥夺他们的民权。

本书前言中所提起的1996年东帝汶太平洋会议事件，和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中，警察和保安部队对暴徒所采取的纵容态度，尤其免不了要受到置疑。

巫统领袖自此以后坚持，大马人必须同意，不再公开讨论“受宪法保障的课题”。这些被禁止讨论的课题包括：种族、宗教、语言、苏丹及其家属的地位等。

最近，在2006年11月召开的巫统大会也不例外地提起这些课题。以往的巫统大会都常发出隐喻的恫吓，如：把马来短刀拔出鞘等。在最近的巫统大会中，一名与会代表甚至怂恿巫统青年领袖（这名领袖还是一名政府部长呢！）道，他打算在什么时候使用已出鞘的马来短刀。这显然是在煽动使用暴力和行凶。

即使以往的种族骚乱不足以引起醒觉，“513事件”理应使大马政治领袖意识到，国家独立时所采用的种族方案，并不能很好发挥功能，保持大马不稳定的种族平衡状态。

### 国民阵线：一个扩大阵营的种族方案

国家行动理事会靠政令统治国家，是专制统治。除了敦拉萨当主席以外，还有其它8名成员，都是联盟的马来领袖、马来官僚分子、警官、军官等。马华和印度国大党在行动理事会中只享有代表权。

这就突显了，马来官僚资产阶级在执政党联盟中占据着超群的地位。国家行动理事会的存在，是为了向马来社群显示，政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马来人”手中。他们的领导层誓言，决心“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sup>1</sup>

不过，政府也必须表现自己是凝集各民族的因素，使人民得以回归正常生活。全国设立了“亲善委员会”，包括“民族团结部”。1970年，发表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称为《国家原则》。

《国家原则》呼吁“民族团结，公平民主，自由进步，相信上苍，效忠国家，宪法至上，尊崇法治，兼顾德行。”<sup>2</sup> 1970年1月成立的“全国咨询委员会”，也设法委任一些专业人士和反对党，如：砂拉越民族党（SNAP）和民政党。

执政党在1969年大选惨败后，国会操作被中止。执政党开始采取步骤，巩固政权，并恫言，只要联盟不能获取所需要的

三分之二多数票修宪权力，它将不重新召开国会。这恐吓手段起了预期的作用。一些反对党很快就屈服了，转而加入联盟，其中包括来自砂拉越的5名人民联合党成员（他们在1970年大选中中选为议员）。

由于发生513暴乱，东马大选被中止，直到1970年6月和7月才举行。在40个利害攸关的国会议席中，联盟必须获取至少30个议席，才能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票。

敦慕斯达化领导的沙巴联盟，赢得了州内所有的16席。但是，在砂拉越，联盟在24个席位总数中，只得到9席（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PESAKA）的两席，也算在内）。只有当5名人民联合党作出决定加入联盟党后，这个执政党联合体才获得了三分之二多数席位。

### “敏感课题”

1971年2月20日重新召开国会后，通过了《宪法（修正）法令》。在这修正法令下，某些课题，即：“可能引起种族情绪的国语（也就是马来语）、马来人和其它土著的特殊地位、公民权、以及马来统治者主权”，被宣布为“敏感”课题。公开提出这些课题，成了一种罪行。修正法令也规定，高等教育学府得保留固打给马来人和其它土著。

从那时候起，联盟开始“收编”更多反对党，加入其扩大的政治结构。1972年1月，民政党同意加入联盟成为伙伴，组成檳城州联合政府。人民进步党在霹靂州也和联盟党组成执政联盟。不过，进步党在联邦国会保持其独立性。1973年1月，敦拉萨成功吸收了回教党（前身为泛马回教党）加入联盟。回教党主席，吉兰丹州务大臣拿督阿斯里，被说服接受联邦内阁部长职，当上土地发展及特殊职务部长。

所以，到了1973年1月，原有的联盟（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扩大阵营，成为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简称BN），容纳了人民联合党、民政党、回教党、和人民进步党。

国会共有144个议席，国民阵线拥有122个议席。

当1974年8月，宣布举行513暴乱过后的第一次大选时，不加入国阵的民主行动党是主要的反对党。它率领一个脆弱的反对党联盟，其中包括砂拉越民族党（SNAP）和马来西亚社会正义党（PEKEMAS）。

与此同时，政府已重新划分选区，这自然对国阵有利。西马原有议席是104席，现在增加了10席。在国阵内部，巫统不容争议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巫统控制了国阵成员党选区分配的争议，并确保被选中的是“政府”候选人，而不是潜伏在党内的反对党成员。尽管回教党无疑是较为善变的国阵成员，但是，回教党的不满情绪，也都被巫统马来领袖抑制了。

马华在1969年大选中表现差劲。这就促使巫统把其它华基种族政党，如：民政党和人民联合党，引入国阵。1970年代初，人数众多的马华党员集体跳槽到民政党各支部去。

“513事件”的后果是，陈修信也遭受到像东姑一样的命运。他是当时的马华领袖。从殖民地时代开始，他就是主要的买办家庭成员之一。他无法使马华社会基层产生信心。但是，在接下来所发生的权力斗争中，马华领导权由他其中一名支持者李三春所操纵。马华党高层领导的内部纷争和派系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

1974年的大选成绩，是预料中的事。结果，民主行动党仍然能获得选民所投下的总票数的20%左右，而吉兰丹马来独立人士（大部分是回教党的异议分子），以及人民党（已改名为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党）在丁加奴，也各自赢得了20%和30%的选票。<sup>3</sup>

马华的胜利再次归功于巫统促使马来选票投给马华候选人。城市选区如：吉隆坡、怡保、芙蓉、马六甲、亚罗士打等，全都落入民主行动党手中。人民进步党加盟国阵后，失去了许多非马来人的城市选票。

西马的选举结果如下：国阵得104席（即：巫统62席，回教党13席，马华19席，民政党5席，国大党4席，人民进步党1席）；民主行动党赢得9席；社会正义党只得1席。<sup>4</sup>

在沙巴，如所预料那样，沙巴联盟囊括了所有的16席，其中15席不劳而获。这是因为敦慕斯达化采取与众不同的手段，百般阻挠反对党候选人（如：通过逮捕或其它说服的手段）呈上提名表格。<sup>5</sup>直到1975年，敦慕斯达化一向来都是通过他的政党，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简称“沙统”）进行腐败和独裁统治的。他也利用这个政党作为政治工具，控制沙巴各政府部门。

反对党砂拉越民族党（SNAP）在1974年的砂拉越选举中，保留了它在联邦国会的9个议席。它在州议会的代表，由12人增加到18人。<sup>6</sup>尽管其党领导人史蒂芬·卡隆·宁甘（Stephen Kalong Ningkan）落选，其副主席拿督占士·黄（Datuk James Wong）也被州政府逮捕和扣留。不过，国阵砂拉越支部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其余的席位。

人民联合党、砂拉越华人公会（Sarawak Chinese Association，简称SCA）和土著统一党（PBB）三党组成国阵砂拉越支部。PBB则是在1973年，由土著党和土著保守党（PESAKA）两党合并而成。PBB是Partai Pesaka Bumiputra Bersatu的简称。

扩大阵营的“国阵方案”，在1974年大选中，大施拳脚。国阵吸收了几个反对党，确保了国阵政府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席位。如果还是根据1969年大选那样，沿着联盟原有的宪制途径走下去的话，他们可能输掉了。这次大选的胜利，给政府提供机会贯彻“新经济政策”，以及在往后的岁月里，实施一系列的压制性法律。

## 新经济政策

1970年宣布的政府“新经济政策”，体现在1971年—1975年的第二个大马计划中，并在《第二个大马计划中期检

讨》内的《1971-1990远景计划概述》(Outline Perspective Plan, 简称OPP)加以详述。新经济计划公开宣称的目标是：<sup>7</sup>

- (i) 重组大马社会，纠正种族之间经济的不平衡。
- (ii) 消除贫穷。

为了“纠正经济不平衡”，政府建议采用的办法是：到了1990年，有限公司的马来股权，必须由1.5%增加到30%。在这方面，政府指明，国家必须扮演更重大的角色：30%股权目标的四分之三左右，必须由土著公共企业信托；剩下的四分之一则由个别马来人士所拥有。<sup>8</sup>

从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前题（使用的字眼是：纠正“种族不平衡”）可以看出统治阶级种族主义策略的最新表现。但是，由于国家直接参与资本积累，所以政府通过财政和控制货币供应等工具，以及通过引导国内外融资，转移了广大资源。这还包括了直接拥有私人资本。<sup>9</sup>

结果，在第二大马计划下，公共发展开支达马币98亿2千万，而私人投资的公共融资达33亿8千万。自从推行第二大马计划以来，国家开支，尤其是在工商业方面的开支，直线上升。<sup>10</sup> 1973年，设立了土地发展部，以协调各土地发展代理机构的活动。<sup>11</sup>

即使以“经济成本”来说，这些颇为昂贵的联邦土地发展计划，在上个世纪60年代遭到一些经济学家，如：费斯克（Fisk）等的抨击。<sup>12</sup>在1956-1976年间，联邦土地发展局只移殖了4万户人家。但是，每年有一万户人家失去土地。这是1974年，土地发展局总监自己所承认的事实。<sup>13</sup>

在第三个大马计划下，农村方面的公共发展开支又增加了。在政府合约、执照、拨款、土地、以及其他的供应方面，设立了更多政府代理机构，给马来人优先权与经济援助。到了1980年，在这3个大马计划中，公共领域发展总开支的四分之一左右，都用在农村领域，这还不包括基础设施的开支。

马来官僚资本家完全接受和私人资本主义共存的政策。一般上，他们也最先利用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新商机。国家在宣传，鼓励“马来人”从商，好“赶上华人的水平”。这些“马来人”包括：上至贵族大亨，下至甘榜的贫苦农民。除了规定在新企业中，马来人必须参与30%股权以外，国家还提供各方面，如：土地、执照、财政拨款等方面的奖励。<sup>14</sup>

毫无疑问，为数众多的马来中产阶级也从中得利。不过，除了他们公司的利益以外，马来官僚资本家也因控制了国家机器，而从优厚的薪金和其它“额外津贴”中得到利益。从庞大又臃肿的官僚体制内的贪污舞弊中，有很多机会获取利益。<sup>15</sup>

国家在农民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主要显示，马来官僚资本家力图在农村地区建立经济基础。在作出这方面的努力时，他们想介入参与非马来商人阶级下层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在官方宣传中，这些非马来商人通常被描绘成马来农民的主要剥削者。

政府代理机构，如：国家企业（Perbadanan Nasional (PERNAS)）的合作社运动以及其它活动，如：信贷、经销、运输、消费人产品等等，更为突显非马来商人作为剥削者的形象。国企甚至“闯入”大马与中国两国之间所进行的贸易。那是华人商业资本家的传统地盘。<sup>16</sup> 其实，政府在农业领域所增加的开支和活动，大部分是使富裕的农民受惠。富农是马来官僚资本家的主要群众根基。

尽管如此，富裕的非马来商业资本家仍然能够生存。这表明，他们能削价与政府代理机构抢生意。政府代理机构内部官僚主义泛滥，工作效率低；除此以外，他们可能跟官僚资本家达致某种谅解。

其它的国家代理机构包括：人民信托局（MARA）、城市发展局（UDA）、国家稻米局（LPN）、以及州经济发展局（SEDCs）。相比之下，国企（PERNAS）是最有魄力的。它几乎在工商界各领域都进行投资，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第4个大马计划目的是为了协助国家资助的土著信托代理机构，使

他们能大事收购公司股权。1981-1985年间，至少有35%新投入的资本，被国家代理机构所收购。<sup>17</sup>

### 应立即结束种族歧视

最近，各族群因公司资本股权分配问题而引起争论，最终又导致另一名非马来学术专才，辞去他在大马政策集团里的职位。这最新的例子足以说明，巫统妄想永远为自己不择手段所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辩解。

近年来，越来越明显的是，种族平衡状态的主要根据（或者，在特定案件中，该如何应用这些主要根据），迫切需要改变。但是，看来这是当前的巫统统治阶级所不能接受的。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两名重要的前巫统强人，即：前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和前国家投资公司（PNB）的主要负责人卡立·依布拉欣，公开反对延续“新经济政策”。理由是，“新经济政策”具有种族歧视性。这项政策是1969年“513事件”发生过后才实施的。他们两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巫统统治阶级用来积累财富和收取佣金的工具。<sup>18</sup>

到了目前为止，都没还弄清楚，什么是马来特权加入宪法的最初根据。国家独立的时候，制定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是为了让社会中经济落后的一方，能赶上较为先进的一方，好让它们能够进行公平竞争。然而，1969年“513事件”发生过后，巫统领袖在谈话时，其目的好像是为了制造另类特殊公民，也就是——土著。这类特殊公民享有非马来人所不能拥有的某些权利。

目前，他们甚至在玩弄一种新概念，即：“马来主导权”（马来人的主导地位或“霸主地位”）。1986年，一名巫统领袖阿都拉·阿末，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语。当时，引起了大马社会的质问或非议。<sup>19</sup>

某一个“种族”应具有“特殊权利”的论调，有人试图以美国红印地安人和黑人作为比喻，来使它合理化。这种论调，

在一个时期被驳倒了。理由是，马来人已掌握了国家政权，同时，控制了大马的全副国家机器；另外一点，在大马社会中，马来人口占多数。正因为他们真正控制了政府的一切工具，并且占据了大马经济中居高临下的地位，所以，迫切需要弄清楚当前大马应优先处理的事务。

只要政府依然故我地拒绝承认大马所有公民的合法愿望和民主权利，我们的国家是不能取得进步的。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必须首先宣判：种族主义政客的法西斯作风是非法的，同时，必须彻底驱除“513”这个幽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寻获真理，达致民族和谐。

### 参考资料

- 1 新经济政策公开宣称的目标, *Second Malaysia Plan*, 第42-5页。
- 2 “Rukunegara”（国家原则），Federal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Malaysia.
- 3 J. Funston, *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Heinemann, 1980, p.234. 人民党在1975年4月吉打州议席补选中，有进一步的良好表现。当时，人民党候选人只以136票败北。
- 4 Ismail Kassim, *Race, Politics and Moderation: A Study of the Malaysian Electoral Proces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79, p.91.
- 5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5.10.1973.
- 6 1970年，砂拉越民族联盟（SNAP）无法和人民联合党（SUPP）以及 PESAKA 组成反对党统一阵线。大马首相威吓人民联合党，除非建议中的联盟组织能取得政权，不然，就不解除砂拉越的紧急状态，不恢复国会民主。国阵也收买一名人民联合党领袖，赐予内阁部长的职位。见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7.1970.
- 7 *Second Malaysia Plan*, pp.42-5.
- 8 从1980年开始，政府开始把公司财富分配给私人领域的个别马来人。所有能营利的公司股权，如：国企（PERNAS）、土著银行、大马锡矿公司（Malaysia Mining Corporation），等

等的股权，都转入土著的“国家信托基金”。国家投资公司（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 (PNB)）负责管理国家信托基金（Amanah Saham Nasional (ASN)）。见*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2.8.1980。

- 9 *Second Malaysia Plan*, p.7.
- 10 Hua Wu Yin,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Table 7.1.
- 11 除了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以外，还有青年土地计划（Youth Land Schemes）、森林边缘土地分配与搬迁计划（Fringe Alien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Schemes）、集体翻种计划（Group Replanting Schemes）、公共公司、公私合营、私人园丘等。
- 12 See Fisk, in E. K. Fisk and T. H. Silcoc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ependent Malaya*, London: Angus & Robertson, 1963, p.178.
- 13 *New Straits Times*, 22.6.1974, quoted in Hua Wu Yin,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p.155.
- 14 这经常被过分热忱的雇主解释为：一切现有的企业。例如：有人说，1978年，华裔工人被锚标啤酒厂开除。
- 15 甚至当“人民银行丑闻”还刚成为报章新闻的时候，1979年又揭露了另一项涉及树胶翻种局（RISDA）更大的丑闻（*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4.8.1979）。1981年，大马在国际“贪污指数”榜上，排名“高高在上”。“贪污指数”是美国《时代》杂志所设计的（*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0.4.1981, p.71.）。政府高层官员的贪污舞弊现象，是大马人民所周知的，尽管只有一两条“大鱼”被揭露，如：当时的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贪污案。拿督哈仑贪污案是因巫统党内派系斗争而被揭露的。1981年，有人指责檳城、霹靂、雪兰莪、柔佛州等的土地与矿物局有贪污舞弊现象，涉及高级公务员和高层政治人物（*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6.6.1981）。
- 16 1979年，大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合约。合约规定中国产品必须直接由国企（PERNAS）处理。
- 17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0.4.1981.
- 18 *Malaysiakini*, 20.11.2006.
- 19 K. Das, *Malay Dominance? The Abdullah Rubric*, Kuala Lumpur: K. Das Ink, 1987.

## 附言

### 更完整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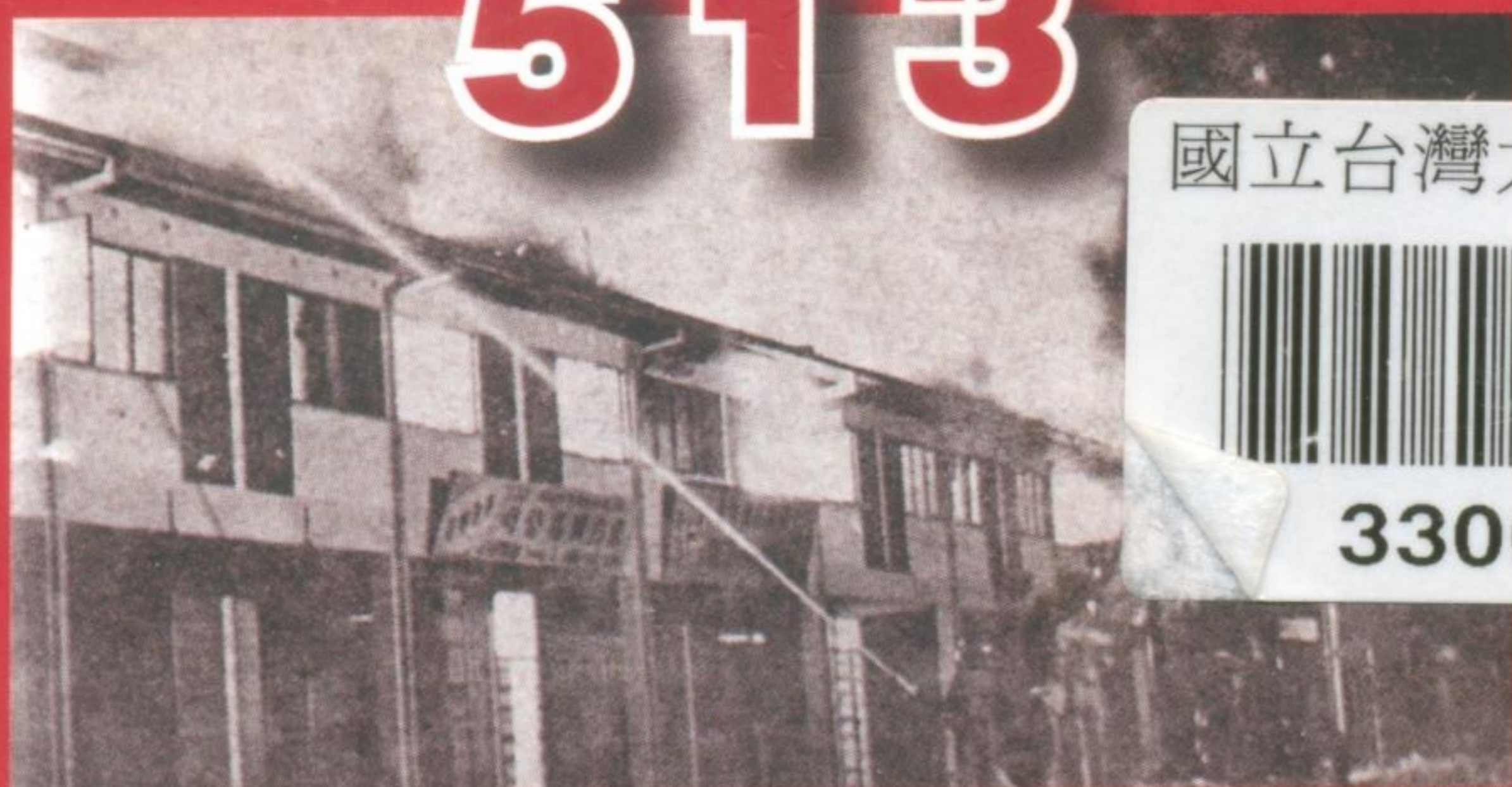
为了对1969年发生的事件，具有更完整和更真实的印象，我们不只要为那些失去生命者或受伤者作好记录，也要为那些事件目击者作下记录。军队和警察部队成员、各医院里的公务员、红十字人员、记者等人，或许有什么特殊经历要告诉我们。

如果你对我国这段历史确实有任何信息，请把这些信息(包括相关文件) 寄到下面的地址。同时，也请你留下联络号码，因为一切信息都得加以佐证：

Dr Kua Kia Soong  
Centre for Ethnic Studies  
New Era College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 E.  
Tel: 603-87392770  
Fax: 603-87336799  
Email: nec@newera.edu.my



# 513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300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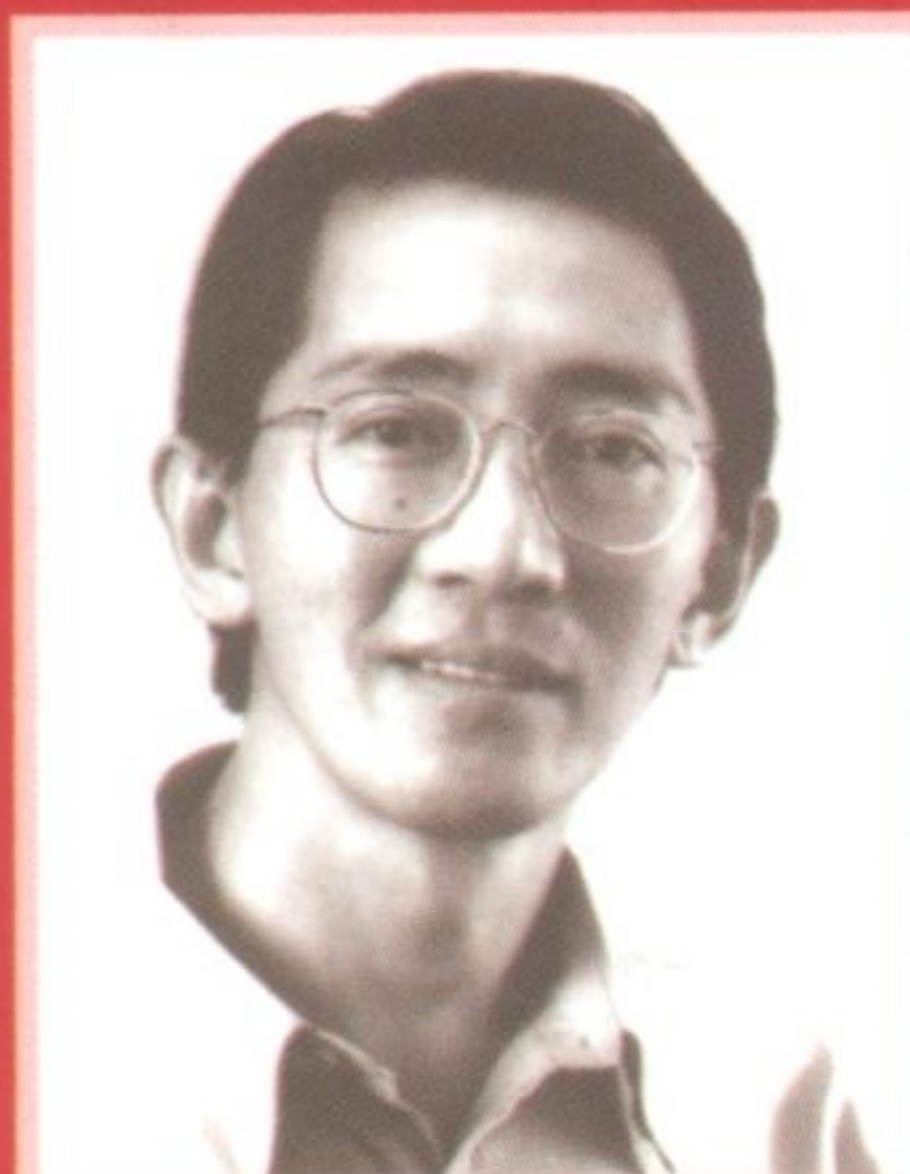
这是马来西亚1969年“513种族暴乱事件”的第一份可靠的叙述。所采用的资料是伦敦国家档案馆最近才解密的文件，都是保留了超过30年的机密文件。

这些文件就是英国和其它外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才能得到的机密评论和备忘录。这些文件的依据是：我国官员和政治人物所提供的情报，以及他们接触这些人物才能得到的情报，其中包括了通讯记者的新闻报道。当时，这些新闻报道是被大马查禁的。本地媒体不准予报道，而本地文件仍然是《官方机密法令》下的保密文件。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柯嘉逊博士对这起“513事件”提供了崭新的政治分析。他的看法是：这个种族骚乱事件，绝对不是华人与马来人两族之间发生的自发暴乱事件，而是推翻以东姑为首的贵族统治的一场政变，而这场政变是新兴官僚资产阶级所精心策划的。

柯博士论述了我国独立后，联盟政府所推行的种族方案所产生的矛盾。他也追溯我国马来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这个阶级从1969年起，开始主导我国的政治。

这些文件清楚表明，谁该对所发生的暴力事件负起责任，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保安部队允许暴力事件继续发生？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他希望国阵政府三番四次提起的“513幽灵”将永远消失。



柯嘉逊博士是人权组织“人民之声”的董事，也是新纪元学院院长。他是1990-1995年八打灵反对党国会议员，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主任（1985-1990），《内安法令》下的政扣者（1987-1989）。他曾在曼澈斯特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当过讲师（1978-1979）。柯博士毕业于英国曼澈斯特大学。1975年，考获经济系文学士；1976年，经济系硕士；1981年，社会学博士学位。

**人民之声出版**

人民之声是一个维护人权及保护的  
的非营利和非官方的组织。

0130400170  
天特書行  
RM 20.00

ISBN 983413678-1



9 789834 136789